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外名人的评说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1945年柳六文著文介绍 韶山人谈论毛泽东

柳六文，毛泽东的同乡。本文摘编自1945年9月8日《新华副刊》。

毛泽东先生为了国际未来的安全，为了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来到了重庆，这消息对我这小小的公务员真是有说不尽的兴奋和快乐。如果有人要问我平生最感觉快乐的是什么事，我毫无疑问地要答复就是这回毛先生来重庆对我的感触了。同时从重庆市民热烈而欢慰的谈论中，更相信和我有一样感触的人，实在是千千万万不可数计！今天因为恰好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馆的门前，看见在一幅欢迎毛先生的红布联上挂着他本人的玉照，毛先生的像片，不是没有看过，但是用油画的放大到几尺的像片，这还算是初次，我不觉往返地在门前瞻仰了多次。的确，这个中国抗战人民真实的代表，东方弱小民族解放的领导者，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只觉得是肃穆、慈祥和无畏的综合。当我走上回家的道路的时候，忽然想把我自己知道毛先生的三两件细事告诉大家听。

毛先生的老家在湖南湘潭清溪乡的韶山地方，我们两人的家相隔只有12里，可是因为我年纪太轻了，并不认识毛先生本人，关于他的几项细事，还是自己的堂叔、哥哥和认识他的朋友们口述给我听的。有一桩事是这样：当赵恒惕做湖南省长的时候，毛先生做过我们乡下雪耻会的发起人，一班加入雪耻会的分子，是小学教员和优秀的农家青年；所谓雪耻会，就是要图雪去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于我国不平等条约的耻辱而组织的人民团体，曾记得乡下人受了宣传的影响，一时都知道有一个东方的倭奴国，是我们的敌人。那时我正在小学时代，清楚地记得老师们告诉过倭奴的残忍，并每天要我们写“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等类文字，有什么说到朝鲜、台湾、琉球等地亡国奴的悲惨生活，竟使我们哭泣和激昂的愤慨。今天抗日人民领袖的毛先生，亲身尝到了多年以前便决心抗日雪耻的胜利之果，应该是何等开怀！可是他绝无半点骄傲和自满，更进一步地竭诚来和执政党的领袖以及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来商讨和平、民主、团结，非要使中国达到富强安乐的境界不止，这种崇高的人格，伟大的精神，我想不是文字和言语可以表达得了。只能让它永恒地存在人民的心底吧！记功碑一类的东西有什么用途，那不过是呆子的行为！

另外一件事就是毛先生对人家的痛苦和不幸，是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同情的人，在乡里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发生过：毛先生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不过是有饭吃的农家，还够不上小地主的资格，我们家乡的经济情况，是家家都靠养猪养鸡来维持油盐零用，有一年旧历年底，毛先生的父亲要他去接收一笔猪银，回家好度年关，银钱到年底照例是紧张得不得了，一角一分，在一个家庭都作过预算的，乡间那时很不清平，三五块大洋肇了杀身之祸的并非没有。闻说先生接到了猪钱，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几个衣服褴褛的可怜人，他便把手中的现钱通通散给那些贫民，忘记了自己家里早有的预算。这件事虽也平常，可是谁知道他是根据爱的出发的表露，又谁知道他这种崇高的同情继续不断的发展，高度的发展，今天不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享有他这种爱的同情，就连全世界弱小民族也感觉到他这种爱的光辉而自豪呢！

还有我所知道的是毛先生爱护青年的事实。我们乡下有一个小地方叫做

花园冲，那里有一个彭氏祠堂开办了一个小学，我的一个堂叔在这里读书，年龄小但是很聪明而且好学，可是家里很穷，因此纸笔之类都难常常购买。有一大毛先生来会那小学堂的老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聪明而肯努力的小学生，便力劝老师助他求学，并从自己的荷包内拿出一千二百文铜元，送给这小学生作为成绩优良的奖金，又鼓励其他的小学生作成绩的竞赛。这些事在毛先生本身只能算点看不见的细微末节，不足道的事了，可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些有大批存款在外国银行的人们，可为人民做过一毫纤尘大的事吗？

最后我所知道的是毛先生是一个不嗜多言但和蔼可亲的人，这里是我的哥哥告诉我的一段事实。我哥哥在本乡一个小学教书，有次人家介绍一个陌生的人给他，说这人将要在他那里过夜，原来这人就是毛先生，毛先生在乡下的名字又叫做“润之”二字，那次润之先生穿一领蓝布长褂，少说笑，但非常和气，和我哥哥抵足同睡了一夜，大概毛先生怕耽搁主人的睡眠，一夜侧卧一旁，彼此反觉卧榻宽广。这事本是最小了，但可见毛先生的为人处处为人着想。像他这样的一位好人，可是不记得是十九年还是二十年间，竟还有人派遣特种人物去掘过他的祖坟，这事在毛先生心里也许是仅以一苦笑置之，但是我们乡下人的心里，到今还是替毛家的祖坟抱不平，事过也不去多加追述，不过我不懂有些人为什么只许自家拜扫祖坟，却不准许人家有祖坟存在呢？

我虽然听说毛先生是不大说话的人，但究竟是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归纳的专家，同时也是医治中同现社会的病理和生理的能手，今天在重庆的地位，是全国抗战人民发言的代表人，我谨祝他在和中央蒋主席的实现民主、团结、统一的商讨过程中，能够获得最理想的收获！这段文字当作我致毛先生的革命敬礼！

1938年铮铮著文介绍毛泽东

铮铮，身份不详。本文写在当时的日军占领区上海。摘编自1939年出版的《国际时人传》一书。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年龄已逾40，中等身材，头脑甚大，故智力十分充足。头发常数月不剪一次。穿一件布长衫，说一口湖南土话。与人谈话时，两眼常望着自己鼻尖，故思索力极集中。对于任何小事，均甚留心。如见有地上纸角碎片，必捡起细看，一如大侦探之欲在这些东西上发现大秘密一样。平日极爱读报，不论什么地方的报纸，一到他手，从评论、新闻起到副刊广告一字不遗的完全阅读。他不但读报，且读杂志，不论何种刊物有无销路，他都像报纸一样阅读。故他自己说，他的学问不是在书本上得来，是在报章刊物上得来的。他这种阅读报章刊物的精神，在求学时代就如此了。

他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本甚平静，自他一入学校，因其宣传与组织之能力特强，故立即波动，以后每有行动，各校均以第一师范之马首是瞻，即在长沙之大学中学校，亦均受第一师范之指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先生之能力确是超人。

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他当选了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山先生本留他在广州工作，但他到了上海，在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任秘书。当时组织部长由叶楚傖兼任，他与叶楚傖发生了冲突，愤然辞职回湖南湘潭。民国14年10月到广州，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事忙不能兼顾，乃由先生代理，于是他做了中央宣传部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仍由他代理，并用沈雁冰为秘书，萧楚女、顾谷宜等为干事。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以共产党不得兼中央部长，因而辞职，由顾孟余继任。

他在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时，本兼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之职。因其热心农民运动，故于民国15年秋秘密赴北方各省考察农民运动，后又回湖南考察。16年春到武汉，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同时又任共产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当时总政治部有一农民问题讨论会，他即为委员之一。此外，他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农民问题的教员。清党以后，他即在湖南江西组织农民、训练农民，成立共产政府，以后便由江西、湖南、贵州、四川而北到陕西，带领中国红军作二万五千里之长征，更在陕西倡办陆军大学，训练红军军事人才。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接着“八一三”上海亦发生战事，中国即掀起对日全面抗战。共产党本在西安事变中曾与中央订立条件，大家团结一致，实行御侮，收复失地。此时中国红军就改编为“八路军”，本来过去谈到共产党，大家有些谈虎色变，以为共产党是可怕的，毛泽东也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但自八路军之游击战迭与敌人以惨败，同时对敌人的俘虏十分优待，且将俘虏加以训练而放还日本，于是大家思想一新，觉得共产党不可怕，毛泽东是一个了不得的伟人。

1939年阎雄在《共产国际》杂志上 评介毛泽东

阎雄（Yan Xiong），作者身份不详。本文原载1939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第6期，首次由卢岗同志翻译过来。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热诚而无所畏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出色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这就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毛泽东的形象。

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韶山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少年时代就经历了许多困苦和不幸。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让他干活。白天，毛泽东上学堂，早晨和晚上帮助父亲记账，常常得干到深夜。即使这样，父亲仍责备他“懒惰，不是做儿子的行为。”毛泽东在自传中写道：

“……我13岁从学堂结业了，开始与大人一起下田劳动。此外，每天晚上还要替父亲记账（毛的父亲那时开始搞贩运和买卖粮食——著者），但我还是挤时间学习：每天夜里，我把自己房间的窗子堵严，以免让父亲看到灯光。我就这样读了不少书。读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持批判态度。我想继续自己的学业。田间劳动令我厌烦，和父亲吵架后，便离家出走了。”

残酷、没有人性的剥削制度，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沉重的压迫使毛泽东对剥削者深恶痛绝。他忍受了侮辱和机械式的教育。对知识的无限渴望扩展了他的视野，使他充实，并飞快地发展了他的智慧，增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意志。

在长沙的工人区，无家可归的贫民群中新来了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消瘦疲惫的他经常在街巷里奔走，贪婪地阅读着到手的书籍。他醉心于读书，读得非常刻苦。考上师范学校后，他眼前展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无法解释和神秘的东西变得清楚明白了。毛泽东自身的发展大大加快了。沉重而广泛的生活经历在这方面帮助了他，他在短时间内成了一名师范学校的优秀生。搞到一些革命小册子后，他便开始埋头阅读起来。

毛泽东非常想建立起小手工业作坊工人小组。他自己挨饿，还要组织救济自己的同志、学生、朋友和工农兄弟。他经常去参加工人集会、群众大会，用群众易懂的语言揭露剥削者。他筹备了第一次工人罢工，制定出基本要求：缩减工作日，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毛泽东，这个无家可归的学生成了长沙市的知名人物。城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在他的周围。

1919年，毛泽东开办了“文化书社”。警方盯住了这个活跃的、但并非商业活动的“文化书社”。这里经常举行革命学生的集会、工人宣传员小组上课等活动。那时，长沙又爆发了由毛泽东领导的新罢工。

1920年冬，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下”在长沙建立了工人的政治组织，很快他又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1921年10月，毛泽东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组织出版了《新时代》周报。在这份报纸上，毛泽东及其同志们起初是小心翼翼地，随后越来越公开和尖锐地抨击造成社会不平等、暴虐和专治的封建制度。

1924年冬，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来到了湖南。在这里，他成了农民运动的组织者。

1925年至1927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毛泽东一直处在事件发展的中心。到处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在工业城市的工人区，在湖北、江西、湖南最边远的村落，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们爱戴他，认为他是一个唤起人民斗争的积极勇敢的宣传家。警察在跟踪他，但毛泽东受到了工人和农民的掩护，没有被抓。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了，国共合作分裂后，反动势力在全国开始蔓延。共产党转入了地下。毛泽东勇敢地领导着工农地下革命组织，支持和发展着与军队士兵的秘密联盟。1927年8月1日，南昌卫戍部队在共产党员朱德、贺龙等人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开始向南方、向广东进军，与此同时，毛泽东正在江西北部，他在地方共产党员的协助下组织了工农武装。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他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将这支革命队伍带到了宁冈县。在这里，著名的井冈山上，他与另一位久经考验的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朱德会合了。毛泽东和朱德并肩建立了战斗中享誉盛名的中国红军第四军。

毛泽东与红四军一起穿田野、过峡谷、走山路，转战江西、湖南、湖北、福建。这个军所到之处都建立了苏维埃根据地。毛泽东，这个不知疲倦的宣传家和组织者，发动起千百万民众投入到为解放自己的斗争之中。这些群众满怀极大的热忱追随着他。

在井冈山上，他教战士学文化和射击、用革命理想和手榴弹武装他们。

1931年，在中央苏区首都瑞金，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中国人民代表们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当选为中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在这个新的岗位上显示了自己作为卓越的国务活动家的独特天才。他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和一系列其它基本法。他清楚地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和渴望，在中华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著名决议中他表达出了他们所有的愿望。

毛泽东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斗士，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人民的真诚朋友。毛泽东的朋友们这样谈他：

他每天工作20小时，只睡4个小时。他总是不停地从这个城到那个城，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到处都像迎接父亲、兄弟、儿子一样地迎接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生活得轻松和幸福。

在前线，毛泽东总是在前沿阵地。他以自己的英雄行为鼓舞着战士们。中国军队的许多指战员都认识他。下面就是一位中国红军战士谈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主要领导者。他领导着政府党和军队。毛泽东是一个普通而热心的人。他的话就连闭塞的人也能理解。他的威望和声誉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一贯关心他人而全然不顾自己。他非常朴素，行军时与红军战士们一起睡在地上，吃得也和大家一样。

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惊人的勇敢、博学和无穷的天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同志的品质。

同毛泽东一起度过一段日子的一位美国记者写道：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完美的学者。他精通哲学与历史，是优秀的演说家，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特殊的凝神思索的能力。文章写得很好。他对个人生活有些漫不经心，但完成党和社会赋予的职责却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最有才智的战略家，这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事。

毛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一次，在我们夜间交谈的时候，我给他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他要

求我改期再谈，读这些书一直读到清晨。毛不只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还读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甚至还钻研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

上学的时候，毛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建立了类似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组织。为了锻炼，他们进行了饥饿训练，在华南山林中作长途跋涉。在冰冷的水中游泳，光着脊梁雨里行、雪里走。他们凭直觉知道，未来中国需要他们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毛在作坊做工，自食其力。为了锻炼，曾经一连几天只靠豆子和水充饥。

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开始，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成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斗争”（毛泽东语）。1932 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议国民党军队同中国红军缔结和约，投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1935 年 8 月，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人民、所有的党派和政治团体发出号召，“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抗日军队和共同抗日的全国国防政府。”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要求停止内战，联合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为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斗争。“当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毛泽东说：“就是共同抗日。”

1936 年，日本军阀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利用汉奸，挑起了新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再次向中国所有团体、首先是国民党发出呼吁，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要结束人民力量的分裂。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全力以赴地为建立起中国两大基本政治力量——国共的友好关系而努力。共产党用巧妙、灵活的策略和和平方式解决了西安事变，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里程碑，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卢沟桥事件前夕，1937 年 5 月，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全世界所有为和平而奋斗的力量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国共合作开始实现了。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的敌人——日本军阀主义及其代理人——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中国人民的叛徒，制造了无数的障碍。但是，有毛泽东这样的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善于动员人民的警惕性，反对敌人的阴谋，反对一切汉奸和投降派，不倦地加强抗日斗争统一战线中所有党派的合作。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使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感到侵略战争中的困难越来越大，战争成了持久战。中国人民的抵抗势力日益增长，游击队使日本侵略者得不到安宁。

中国人民在进行自卫战争中建设着自己的新国家——中华民国。数以百万计的大众参加了它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进行着抗日斗争，同时，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设着新国家。

毛泽东在自己的讲话和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强调：

武装抵抗需要动员人民，但没有民主自由就无法进行这种动员。在中国，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完成建立真正的、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用事实证明了自己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忠诚和与国民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团体合作的真诚。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后胜利和建设民主中国而争取同国民党进长期的合作。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统一战线的概念包含的国共合作不仅是在战争期间，而且还有战后，不是那种战后就分裂，就重新开始内战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赢得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一直战斗在最前列。毛泽东说：

为人民的利益而生存，与他们共患难，为他们的幸福而奋斗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的胜利进行着英勇的斗争。领导它的是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像毛泽东一样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征服中国共产党——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先锋。

毛泽东经受了艰难的生活磨炼，走过了一个人民的儿子所走的艰难困苦的道路。漫长的岁月，饱含着艰难困苦。为获取知识的顽强拼搏，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锤炼了这个大无畏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锻造出一位真正的，属于人民的、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

1935年赫在《共产国际》杂志 介绍毛泽东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上海，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进行。发言热烈激昂。小会议室里聚集了十几个人。有工人、农民、劳工、知识分子。他们强烈呼吁在城市、工厂、军队和乡村中进行斗争，并建立起共产党组织。一个瘦高个年青人发言了。从外表看，他是个典型的学生或者是谦虚的乡村教师。一副平静而严厉的面孔，深沉的大眼睛中带着令人费解的笑意。苍白似病的面容使他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人。他先举过手，要求发言，然后站起来说。

“同志们，我是湖南代表。我在湖南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我们联合了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我们每日都坚持开展我们的工作……”

这个人小心地坐到椅子上，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用一支带着铁帽的小铅笔在上面做着记号。代表们都面向他，其中有老卫人和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陈独秀。陈独秀等正在向湖南代表提问题，他来回答。工人们友好地跟他握手，时而还拍拍他的肩膀。教授有点冷淡地跟他握了握手，说道：

“很有意思！你们在湖南的经验我们要加以注意，毫无疑问，还要研究。”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意思，”湖南代表说，“问题在于群众开始斗争了。这些群众需要地下革命组织。党现在就应该到群众中去，去组织他们。这才是现在的基本问题。”

“对，湖南代表说得对，”工人代表很赞同。

这位湖南代表被一致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回到了长沙（湖南的重要城市）。在那里领导着共产党省委，编辑革命组织的周报《新湖南》。

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在党组织会议上的发言中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激昂的演说家，天才地指出下一步斗争中所必需的路线和方法。他的发言能唤起听众，鼓舞他们。他用强有力的手结成了党的集体。他找到了了解人们心理的道路，能及时、勇敢地纠正错误，培养出了地下共产党员——真正的革命战士。

论及作为一个党员，他对一个同志说：

“这不仅意味着处在一个政党之中。我们不是政客，我们是劳动人民的、被压迫者的党。我们要从这个地球上消灭一切压迫的革命的党。死亡——这只不过是肉体离开了生命。如果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产党人，可以用自己的死，自己的智慧、勇敢带来益处，那他就应毫不犹豫。他应该勇敢地、自豪地完成党和人民的要求。这样的为人民利益而生存，与人民一起努力，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党是不会覆灭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共产党——这个劳动人民的先锋队。”

从这些明确、普通和布尔什维克铁一般的誓言中，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中国人民的传奇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形象。

毛泽东同志出生在湖南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沉重、挨饿的童年留下了不可消失的后遗症：它一生都破坏着毛泽东同志的健康。在乡下，他做过地主和商人的雇工。在这种苦役般的生活中，他深入地研究了残酷而毫无人性的地主的压迫使人们遭受沉重剥削的整个体制。这种苦役般的生活培养了他对剥削阶级寄生虫不可遏制的仇恨。为逃脱奴役地位，他投入了招兵的军阀部队，经受了机械式的练兵和嘲弄。他的坚强意志、造反精神也无力战

胜野蛮的刽子手。他以巨大的努力克服了复杂难懂的东西——文字，摆在他面前的一些观点、概念都得了一定的理解。无限贪婪地渴望知识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和极大地发展了他的智慧。就像从前逃脱奴役生活一样，他又逃出了监牢般的军营。

生活没有体谅过他，总想使他驯服，把他甩到后头——甩到地主的奴役中去，甩到毫无自由的军阀中去压制他，压制他身上日益增长的对产生野蛮、奴役、压迫和饥饿的社会体制的不满。

在这种不可思议，几乎没有先例的斗争中，他取得了胜利——没有被压倒。他不请求怜悯，他保持了巨大的毅力，没有屈服。

在长沙，过路的人群中，工人区，无家可归者聚集的地方新出现了一个人。消瘦、疲倦不堪的毛泽东在各条路上奔波，与工人交谈，完成着自己艰巨的工作，珍惜地收集着路上的破报纸。他贪婪地读着所有弄到手的书报，直到头痛脑涨。新朋友帮他学习。他以不可思议的努力做出的长足的进步，成了一名师范学生，他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解释不通和猜不透的变得清楚明白了。他飞快地向前突进。沉重、丰富的生活经验在各方面帮助了他。他在短时间内成了师范学校的优秀生。在他手中出现了革命的小册子，并开始埋头研究“造反者”的文字。

他热心于建立各种小组、手工业作坊。他引以自豪的是组织了对自己的同学——师范生，自己的朋友——工人，自己的兄弟——农民的救济。他去参加工人的会议、集会，（用极其普通易懂的语言）揭露剥削者。姓毛的“穷学生”成了城里的“著名人物”。警察开始“注意”这个无家的学生。毛是工人区里最好的客人和朋友。在毛周围聚集了城里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所有的革命分子。他可以很容易地把最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理出头绪。他筹备了第一次工人罢工，提出了基本要求“减少工作日，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

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革命运动飞速发展。在毛泽东创立的“文化小屋”里聚集了革命学生和工人的组织者。毛泽东在这里组建了第一个工人宣传组。警方对“小屋”有所警觉，这里热闹非常，但决非商业活动。那时，城里又爆发了新的罢工。事实上，罢工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他还加入了使省长谭延闿不得不出来接见的工人代表团。殷勤的警察将“穷学生案子”递给省长，省长便下令逮捕他。但在一次私下交谈中，毛泽东设法让人确信他不是“危险人物”。他诱使这位将军省长给“文化小屋”题了牌，造成了新的影响。

很快，毛泽东有组织地办理了共产党省委所在地的手续，组织了周报《新时代》。这张报纸起初尚小心谨慎，随后越来越公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开始抨击国内整个封建社会体系。警察接到了逮捕“革命头目”的命令。毛泽东从长沙跑到华北。他在北平被捕了，但没被认出来就释放了。他又回到了华中，先在汉口，后又去了武昌。

1925年至1927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毛泽东一直处在事件发展的中心。到处可以见到他：在工业城的工人区，在湖北、江西、湖南最边远的村落。他的名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人们爱戴他，知道他是一个唤起人民斗争的勇敢而积极的宣传家。警察在跟踪他，但毛泽东受到了工人和农民的掩护，幸免于难。

在广州，孙中山组成了向帝国中义和军阀反动势力宣战的民族政府。共

产党员加入以改组同盟党。毛泽东——这个工农大众的普遍推崇者——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和时间都与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了解农民阶级的作用和所展开的事件的巨大意义。他建立并领导着群众性农民组织。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中的临时盟友——叛变了革命，转向了反动阵营。工人运动遭到了血腥镇压，对付农民的讨伐队大量派出。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领导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未能阻止军阀对付革命工农的反革命征讨。

毛泽东是最先看出陈独秀的出卖政策将导致灭亡的人之一，并公开地揭露他的立场。他渐渐地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领导反对军阀的斗争。在他专门所写的小册子中，他再次强调了陈独秀之流不以为然的农民的巨大作用。

“今天农民运动的高潮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它应该在整个落后的中国几万万农民中唤起一场运动……农民会打碎一切束缚他们的枷锁，奔向解放的道路。所有的革命的党和革命者都将在这类民众面前经受考验。”

毛泽东的这个早在 1927 年就已做出的对未来事件整个过程的深刻、杰出、正确的预言成了对所有陈独秀之流的领导人的批判。现在，陈独秀，这个可怜的叛变者，挂上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招牌。

1925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变成了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世界上最残暴的军阀的放肆、血腥的恐怖在全国蔓延。共产党转入了地下。毛泽东勇敢地继续斗争。他领导转入地下的农民革命组织支持并开展着同军阀部队中士兵秘密的联盟。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警备区的部分队伍在共产党员叶挺和贺龙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开始向南方，向广东进军。同时，毛泽东在江西北部行动了。他在士兵共产党员的协助下成功地说服了整整一个团，并亲自率领。一路上，农民队伍和矿工朋友纷纷投奔毛泽东。在江西，经过长时间艰苦的战斗他带着这个革命团队到了宁冈县。在这有名的井冈山下，他遇到了另一位有经验的中国革命布尔什维克——朱德。毛泽东与朱德一起携手建立了在激烈的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的中国红军第四军。

毛泽东经受了严酷的生活磨炼。他高昂着头，走过了一个人民儿子所走的沉重道路。不幸的命运、漫长的岁月，为获取知识而进行的顽强拼搏，饱含艰难困苦。革命的烈火锤炼了这个大无畏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创造了一个强劲的人民领袖。在与垂死之敌的血的战斗中，不仅培养了一个勇敢的革命统帅和天才的战略家，而且培养了一个卓越的国务活动家。

毛泽东为建立江西第一个苏区付出了巨大而细致的努力。他动员起党的一切力量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他和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就是他重要的战地指挥部。毛泽东同军队一起穿田野、过峡谷，走山路，转战江西、湖南、湖北、福建。这个军所到之处都建立了苏维埃根据地。毛泽东，这个不知疲倦的组织者和宣传者，唤起了千百万大众，群众到处追随着他。他亲自领导了土改斗争。这个瘦弱、一副病容的人工作起来就像是一台捣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机器。他把长年聚集的所有仇恨都倾注在中国人民的寄生虫和吸血鬼身上。他带给人民新的理想。他用饱含真情实感的亲身战斗经历给他们作出色的演讲。一群群来自上海、广东、汉口的劳工和工人，湖南、福建江西的矿工、雇工和农民、学生、教师不断地投奔他，所有受压迫、被奴役，所有觉悟了的勇敢的人们都向往他。他亲手创建了英勇的中国红军骨干队伍。他亲自在井冈山上教战士学文化和练射击。他用理想和手榴弹武装他们。

1931年，在苏维埃中国的首都——瑞金，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人民代表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表现出了自己卓越国务活动家的突出天才。从他的笔下，写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和新的共和国的一系列其他基本法。在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著名法令中，熟知人民群众的希望和理想的毛泽东表达出了他们的愿望。

毛泽东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人民的真诚朋友。毛泽东的朋友这样谈他：

“他每天工作20小时，睡4小时。他总是不停地从苏区的这个城到那个城，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所到之处，人们就像迎接父亲、兄弟儿子一样迎接他。他在做一切能使人民生活轻松而幸福的事情。”

毛泽东从人民中来，也是深知民众心理的行家，他出色地将党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付诸实施。人民了解毛泽东经历过怎样沉重的生活，给予了他无限的热爱和信任。在前线，毛泽东总是在前沿阵地。与红军战士并肩战斗，用自己的英雄行为鼓舞他们。许多红军官兵都认识他。他参加了红军所有决定性的战斗。他培养了军官中的基本干部。毛泽东是中国红军第一位指挥员。

国民党大报《大公报》不久前刊登了关于审讯一名被捕中国红军战士的消息：

“这个士兵”，报纸写道，“看上去有35岁左右。他是在江西红区中部被捕的。在审讯中，他保持着非常的镇静和自信。长官让他谈谈红军的实力情况。士兵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诱劝他也不起作用。他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多得很”，而所有其他问题，他都回答：“不知道。”

唯一他乐意回答的是关于红军指挥员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是的，我既知道毛泽东也知道来德，还知道彭德怀。毛泽东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他领导着政府、党和军队。他是个非常普通而热心的人。他总是用最闭塞的人们也能懂的语言讲演。他的威望和声誉很难用语言转述。在他的号召下，人民愿意跟着他，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关心别人而全然不顾自己。他病得很厉害，不停地咳嗽，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但行军时仍和红军战士一起睡在地上，吃同大家一样的伙食。

从库房领来服装和鞋子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分给红军战士或者别人，在宁都附近打仗时，我亲眼见过他；他在伏地射击，然后站起来率先冲锋。其他人紧随其后。我们那次打胜了。仗后，他还和卫生员一起救护伤员。俘虏带来了，他同他们谈了几个小时。然后命令将俘虏全部放掉，当官的除外。那次俘虏了六百多人，但走的人超不过一百，剩下的都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审问者对这位被俘的红军战士又提出了问题，让他讲讲关于红军的处境、部署和实力。他又一次拒绝了。有个当官的扬言要枪毙他。这位战士回答：“那好吧！我听过我们领袖的话。他说害怕为人民事业奋斗而死的人就是卑鄙的胆小鬼。而我是共产党员。

这份材料将做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中国红军的史册。这位不知名的战士在死面前没有被吓破胆，没有投降，没有后退。毛泽东培养的就是许许多多这样无所畏惧的战士。

毛泽东在1934年1月第1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中华苏维埃富有成效的建议时，对胜利的条件下了这样的定义：

“取得的胜利绝不是偶然”，他说：它们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依靠苏维埃政府的集中领导，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依靠红军的英勇和胆魄，依靠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自觉支持。此外，它们还依靠了白区工农大众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日益发展的斗争运动。它们还依靠了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的帮助与同情。所有这些都是与敌人斗争取得胜

利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从江西向西北进军之前，毛泽东与朱德一起在红军总部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研究长征的战略计划。毛泽东以丰富的战斗和政治经验及对国家知识的了解，大大缩减了要制定的计划。中国红军的主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在江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带病的领袖走在前面，指引着苏维埃革命铁流的道路。

这个被苦役、军阀兵营、饥饿与困苦的年月毁坏了健康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者鼓起了勇气，无所畏惧地带领中华苏维埃的军队突出重围，翻山越岭，涉溪过河，奔向新的革命根据地。

具有铁一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精神、卓越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惊人勇敢、博学和无穷的天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优秀品质。

编者的话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虽然已经不在人间，但他的业绩永载史册，他的英名万世流芳。

历史造就了巨人，同时巨人的影响博大而深远。人们时常谈论起毛泽东非凡的一生，铭记着他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毛泽东的历史活动和理论思想支配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道路，也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他的思想和事业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也根植在世界各国朋友的心里。甚至，他的政敌和对手以及分歧者也无法否认他的魅力和气魄。

中外人士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的文章、书籍很多，有的国家甚至成立了有关毛泽东研究的专门机构。为使读者能够在更广大的空间范围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了解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加深对毛泽东的研究，我们编辑了这本书。

本书所选的文章中，既有从大处着眼纵论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也有从小处入手叙述一时一事的；既有记述青年毛泽东的个性魅力的，也有描画领袖毛泽东的运筹帷幄的；既有反映政治风云中、外交舞台上毛泽东的文韬武略的，也有披露日常生活中毛泽东的喜怒哀乐的。作者的身份和地位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各抒己见。编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在丰富的文字材料中，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挑选了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稿摘编成册，力求使它既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又富于可读性。可以说，本书在众多有关毛泽东的书刊中颇具特色。

全书共选编文稿 86 篇，其中国内 43 篇，国外 39 篇，另有附录 4 篇。所编文稿长短不一，视内容而定。一般重新拟写了标题，同时在不损害原意的基础上作了少数必要的文字处理，订正了个别事实。每篇文章通常加题注，简要注明作者的身份以及摘编所依据的稿本。文中有些地方也作了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

本书目录次序，中国人名按姓氏笔画排列，外国人名按惯例简称亦以笔画为序。

须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书有些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意见。为了能够多方面多层次地反映中外名人对毛泽东的观察和认识，我们将这类文章一并编入，仅供读者参考。此外，由于资料浩繁，可能会有一些名人的文章缺漏，有待以后进一步发掘补充。

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不免有错讹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0 年 5 月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节选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第一编 中国名人的评说

毛泽东与延安文艺

丁 玲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方，我被任命为这个团的主任。我曾到凤凰山下毛主席住处，请示工作。毛主席说：“宣传要大众化，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我记住了，在团里传达了这些讲话。西战团出发前赶排了一些话剧、歌剧、大鼓、相声，还把秧歌改成《打倒日本升平舞》，搬上了舞台。毛主席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来看了汇报演出。在南门外戏台上一次为群众演出后，朱光同志跳上台来兴奋地连声说道：“成功了！成功了！”毛主席看完演出，极有兴趣笑着对我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从1937年到次年的10月，我在西战团工作的一年内，大抵是坚持了这一方向的。

但在这以前，我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却还有另一个印象。

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他，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毛主席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丁玲，著名女作家。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本文摘编自198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作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他把《娄山关》那首词抄给我时，还问我印象怎么样？我虽觉写得雄伟有力，却一下说不清，只说：“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呵！他当时的秘书周小舟同志也是喜欢旧诗的，常常从对面窑洞里跑过来参加谈话。有一次，周小舟同我在徐梦秋那里，为了庆祝徐特立同志的六十寿辰，我们买了一块红缎子，准备写一首诗贺他。我们三个人在那里凑句子，毛主席来了，知道我们在作“诗”，高兴得大笑。我们把凑成的几句念给他听，他说：“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其实，这诗有点打油，没有什么好。毛主席之所以有兴趣不在诗，而是因为我们在凑着写“诗”。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但他在文艺工作上，却再三要我们搞大众化。无论在保安文协和在西战团，我都是按照这一指示进行工作的。在山西前线，在国统区西安，在我们自己的部队，到友军部队，都是这样作的。1938年春天，西战团在西安时，由我主编出版了一套战地丛书，包括有《西线生活》、《一年》、《战地歌声》、《杂耍》、《突击》、《呈在大风沙里的人们》、《河内一郎》等八、九本集子。夏天在西安最后一次公演的节目是两个旧瓶新酒的戏曲，是田汉和老舍写的《忠烈图》、《烈妇殉国》。这年7月底，西战团回到延安，庆祝八一建军节时作了汇报演出，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肯定和赞扬。

1939年11月底，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了一个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这个节目演出时我不知道，没有去看。过了几天，陈明来看我，他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他一进窑洞就笑，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约侣朋和我去谈话，并在那里吃饭。”原来陈明当时是宣传大队的大队长，侣朋是大队的戏剧教员和导演，《庆祝十月革命节》活报剧便是他排演的。毛主席看了演出，又从萧劲光同志（留守兵团司令员）那里知道，演出花钱很少，很多布景是向鲁艺借用的。毛主席及时找了他们两个人去，同他们谈话，留他们吃饭，临走还开一张二百元的支票奖给大队。这件事给宣传大队以及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们极大的喜悦和鼓励。

现在提到这段往事，我并不以为这一歌舞活报剧当时是十全十美的好节目，很可能会有简陋粗俗之处，但毛主席却给了这样大的鼓励，这是不是表明了毛主席的一贯的文艺思想，也表明了在新形势下，从革命需要出发，从群众需要出发，毛主席对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究竟肯定什么、提倡什么和表扬什么。

延安平剧院的演出是很精彩的，很多同志都爱看，我喜欢京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时听说有阿甲、陶德康等同志的戏，我总是去看的。我的印象中，毛主席也是常去的观众之一。我也曾听说，有时他还在窑洞里听听京戏唱片。我以为这是很平常的，每个人可以有各自的爱好和兴趣。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旧戏有过什么赞誉之词，好像他只说过要“推陈出新”。但是在文艺座谈会之后的1943年，中央党校业余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集体编剧的执笔人齐燕铭、杨绍营（都是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的研究员）两同志，大意是说：《逼上梁山》的演出将是京剧演出的里程碑，剧本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下了舞台，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登上了舞台。这封信在当时的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当众宣读过。（这封信在六十年代被说成是写给平剧院的，与事实不符。）从这封信里，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毛主席对于应该提倡什么样的京剧也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我以为，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自然，凡是能留传下来的艺术精品都会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但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很自然地要把一切事务、一切工作都纳入革命的政治轨道。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他一定会提倡一些什么，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但他必须提倡它。

整风学习开始，中宣部指定我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刘白羽、郑文等同志。胡乔木同志领导我们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空前的文艺座谈会，表明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的一贯关心，对文艺战线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召开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决不是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座谈会以及毛主席的讲话，很明显都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个人个别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的“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

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1941年10月23日《文艺》第二十六期发表了 my 《我们需要杂文》一稿。写文章的起意，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检查文章的内容，都不像后来有人指责的那样，说这是我在号召暴露黑暗，甚至把我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

文艺座谈会以后，整风学习以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新的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报告文学、小说等真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振动。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二十多年里，《讲话》给了我最大的力量和信心。我能够活过来，活到今天，我还能用一支破笔为人民写作，是同这一段时间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形势变化很大，发展很快，在新形势下，我们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全盘否定《讲话》。我们也不要因为文艺战线上出现过或“左”或右的倾向而忽视自己取得的成绩。我们，特别是我们一些左联时代的老兵，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战士们，都有责任重新学习《讲话》，研究《讲话》，在新形势下，正确地理解、宣传、实践，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肃清“左”倾流毒，为人民文艺的繁荣和纯洁而奋斗。

滚烫的回忆

毛岸青 邵华

毛泽东，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位对革命创建了丰功伟绩的领袖。在我们的心里，他还是一位慈父，一位严师，一位最可亲近的人。

我们深知，爸爸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心中装的是亿万人民的大事情，但我们也深知，爸爸也是血肉之躯，他对家人同样充满着革命的情谊，对子女倾注着慈爱。

1949年8月5日，湖南长沙解放了，从家乡传来了我们的外婆健在的喜讯。爸爸立即拍电报向外婆表示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当年9月11日，爸爸托人给外婆捎去一件皮衣料，要她做成皮袄，抵御风寒。1950年，爸爸要岸英哥哥回湖南看望外婆，并带去两棵人参，要外祖母补养身体。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爸爸按月给外婆寄去生活费，从未间断过。为了消除外婆的晚年寂寞，爸爸先后要岸英哥哥和岸青回湖南看望她老人家，叮嘱他们为妈妈扫墓，问候那里的乡亲们。

1962年春天，我们结婚后回到了北京。父亲见到我们含着微笑，风趣地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当时，我们的组织关系在总参，父亲叫我们去向罗瑞卿叔叔毛岸青，毛泽东的二儿子；邵华，毛泽东的二儿媳。本文摘自《难忘的回忆》一书。请假，一同回湖南探亲。

我们带着父亲的嘱托，先到板仓祭扫妈妈的陵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我俩双双回到长沙，可乐煞了九十高龄的外婆。她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了欣喜的笑容，眼睛里射出慈祥的光。在阵阵的笑声中，半天合不拢嘴。她一手拉着岸青，一手拉着邵华，端详来，端详去，总是舍不得松手，眼里渐渐盈满了泪花。开智舅舅和崇德舅妈也向我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我们也转达了爸爸对家人的美好祝愿和问候，大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欢聚中。

1962年11月，从家乡传来了外婆谢世的噩耗。爸爸十分悲痛，当即挥毫书写了吊唁信，寄去了五百元的安葬费。在信上，他嘱咐舅舅和舅妈将外婆与“杨开慧同志我的夫人同穴”合葬在一起。外婆生前常叨念爸爸，说他虽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也有赤子之心。

爸爸的日历上是工作，工作，工作，从来没有节假日。在难得的工作间隙中，他还惦念着、关心着我们的成长进步、志向情趣。他为我们开列过学习书目，细心查看过我们的学习成绩单的评语。不管我们提出多少个“为什么”，都可以在爸爸那里得到最满意的回答。我们有了喜事，他脸上会露出笑容。我们碰到难题，他能为我们排忧解难。我们被烦恼所缠扰，他几句开导，就能驱散我们心头的抑郁。只要看到他那慈祥的面容，我们就如沐春风，就会向他倾尽心里话，期望得到他的亲切教诲。

我们走到天涯海角，爸爸的慈爱也会送到我们的心窝。1960年，岸青在大连疗养，爸爸捎信说：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休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有信交思齐（即松林）、邵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愉快！

父亲

爸爸特别喜爱的岸英哥哥，也是斯大林十分赏识的苏联红军中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爸爸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将这不幸的消息瞒住了松林姐姐，以便让她能安心学习。这期间，爸爸几次扳着指头，向姐姐讲述先烈的事迹，讲述家中五位亲人壮烈牺牲的情景，当时姐姐尚蒙在鼓里，不能完全悟到爸爸的深意。后来，姐姐惊悉噩耗，悲痛万分。她与岸英哥哥结婚刚满一年便突然永诀。为了不引起爸爸的悲痛，她只好躲在屋里饮泣。可是在饭桌上，她那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却被爸爸看见了。他提筷沉思，长叹一声，放下筷子，水米未进，起身慢慢地离开了饭厅。从此，松林姐姐把悲伤硬是压在心头，把眼泪硬是咽到肚子里。然而，爸爸深知她的心情，看着她日渐消瘦憔悴，常常劝慰她，说：“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消息公开后，爸爸对松林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从那时起，爸爸格外疼爱姐姐，时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她为“我的大女儿。”

姐姐曾请求将岸英哥哥的遗体迁回国来，爸爸却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爸爸的胸怀像那坦荡无垠的大海。他的爱与憎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美帝国主义者夺去了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其中包括他心爱的年轻的儿子的生命，但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又是他不以旧怨为念，亲手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

爸爸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领袖，又是慈父。作为慈父，他在悲痛面前也是一个罕见的强者。他深知姐姐骤然失去丈夫而造成的精神创伤。1959年，在姐姐的请求下，爸爸自己出路费，安排邵华陪同姐姐到朝鲜为岸英哥哥扫墓，以尽妻子之情。为了不惊动朝鲜政府，松林、邵华在任荣同志的带领下，作为普通的工作人员赴朝，住在我们的大使馆中，往返只用了几天时间。

朝鲜的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坐落在山丘之中，陵园四周环绕着参天的苍松翠柏，山间清溪缓流，显得分外庄严肃穆。踏上高高的台阶，步入墓地，只见一座座圆形坟冢排列得整整齐齐。每座墓前的石碑上都雕刻着烈士的英名。一百多位中华优秀儿女安息在这里。他们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在友好邻邦的国土上，树起了一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丰碑。岸英哥哥的墓在最前排的正中间。墓前石碑上刻着：

“毛岸英同志之墓。”

墓碑的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朝鲜人民都知道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为了他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朝鲜人民每年两次到这里扫墓。亲眼看到岸英哥哥和所有志愿军烈士的墓被朝鲜人民精心保护着，哪一位亲人也会感到安慰。松林和邵华在烈士陵园拍了照片，回国后向爸爸作了汇报。

岸英哥哥牺牲后，爸爸经常回忆起他，怀念着他，说他是能独立思考、

松林，即刘松林，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夫人。邵华同母异父的姐姐。

有主见的好孩子，多次要求我们向哥哥学习，不要忘记他。时至今日，爸爸的这些深情话语，仍谨记在我们心间。

爸爸时刻怀念着每个为革命牺牲的死者。1930年，妈妈英勇就义后，爸爸曾派人收敛了尸骨，以三个孩子的名义为妈妈立了碑。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他称颂妈妈是“骄杨”，寄托了一片深情。他多次向我们谈起妈妈，敬佩她的忠贞和英勇，说妈妈毅然抛下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这是常人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啊！

有一次，我们求爸爸把《蝶恋花·答李淑一》写给我们，以作永久的纪念。爸爸坐到桌前，一边慢慢地蘸着毛笔，一边凝神思索。我们默默地站在桌旁，屏声静气，唯恐扰乱他的思路。良久，只见爸爸轻轻地铺开了宣纸，缓缓地用手抚平，悬起手腕，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四个字。当时，我们认为爸爸笔下有误，忍不住问道：

“爸爸，不是‘骄杨’吗？”

爸爸停住了笔，思索了一下，我们赶紧递过一张空白的宣纸，以为爸爸要重写。但爸爸并没有把纸接过去，却缓缓地说道：

“称‘杨花’也很贴切。”一语表露出了爸爸对妈妈的怀念之情，爱慕之心。听到这样的回答，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深深体会到：称“骄杨”，表达了爸爸对妈妈的赞美；称“杨花”，又表达出爸爸对妈妈的亲近之情。爸爸一气呵成写完了这首词，双手拿起它，郑重地交给了我们。我们激动地把它接过来，轮流地捧在手中看着。没曾想到，这道劲滞洒的墨迹，今天已成为双重的珍贵纪念品。

是的，“骄杨”，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是的，“杨花”，女子革命而捐其春，安不称花？

在中国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亿万人民在思念着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也在思念着其他已故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的思念之情却如滚滚不尽的长江。思不尽爸爸的深情，思不尽爸爸的厚意。这深情厚意正是爸爸与我们的心息息相通的桥梁。

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着他系统内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60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邓小平说：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谈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也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准备还要搞点材料，再发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使用降低了。”

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说：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

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

子的作用的。他在 1975 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又比如说，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1980 年 3 月至 1981 年 6 月，邓小平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的起草和修改，多次提出过他的意见和看法，其中论及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980 年 3 月 19 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论及决议稿起草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其中第一是：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巨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1980 年 4 月 1 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总起来说，1957 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1961年到1966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不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1980年6月27日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1980年10月25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

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 AB 团，打 AB 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 AB 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始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们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81年5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以上是邓小平对决议稿中如何写好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的部分论述。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对如何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谈了很多见解。我们辑录如下：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

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奥：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

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他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奥：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奥：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1974年、1975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拚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奥：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奥：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苏扬整理）

对毛泽东的三点感受

邓颖超

西安事变高瞻远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大家简直是欣喜若狂，都跑到房子外面，又跳又唱，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大仇人进攻了我们十年，杀了我们千百万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以及爱国人士。把这个大仇人抓到了，还能不杀了他报仇呀！那时，在全国尚存的根据地和军民也是一致主张杀蒋的，我们估计党中央也会同意杀蒋介石的。可是，过了三天，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同志去西安，说要和平解决，不杀蒋介石。这个弯子当时是非常难转的，在党内、在军队内都转不过来。大家都问为什么要放他？

后来认识到，这一招是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他的战略思想，他的勇敢、智慧过人，确实是个战略家。在西安事变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是最大的爱国者，同时，也警惕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如果，西安事变不是和平解决，而是把蒋介石杀了，首先，国民党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就会上台，他们恨不得我们杀了蒋介石。我们讲和平谈判，他们最害怕，他们积极准备轰炸西安，企图把蒋介石炸死。蒋一死，何就可以乘机夺权，重开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成大举入侵的机会，更容易灭亡我们中国。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国民党里边的开明人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使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说服了张、杨释放蒋介石。所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震动了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尽管出乎意料，但是他们还是赞成这样解决的。不赞成的是国民党的亲日派、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反共分子。

重庆谈判气魄伟大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了。“那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多少年的战争结束了！中国人民遭受了多么长期的战争灾难，人们是多么渴望和平啊！一听说日本投降，战争停止了，全国人民狂欢啊！那几天到处放鞭炮，敲锣打鼓，喝酒庆祝，我们根据地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不久，蒋介石即开始作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内战的阴影又笼罩在中国大地上。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和欺骗人民，一连发了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进行会谈。

蒋介石以为毛泽东同志不会去，他不了解我们共产党人有多么伟大的气魄，是多么为人民着想啊，是怎样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的。人民渴望和平，要求民主。共产党只能遵照人民的意愿，不能考虑个人安危。毛泽东同志居然去了，这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老实讲，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我们是不放心的，在党中央开会讨论之前，我们是一致反对的。会上毛泽东同志说了应该去的许多道理，我们都非常相信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应邀飞往重庆。

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和平，团结建国，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包办选举的伪国大，重新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要保持军队的独立；解放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独立的行政区等。他们不同意，要我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所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到10月10日谈判告一段落，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同志回到了延安。这时，我们大家的心才放下了。

评价毛泽东，功劳第一位

我们党在这三十二年中又经历了几个阶段，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前十七年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也犯过错误，但错误行动延续的时间都不长，比如说1957年反右派的扩大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都是党中央自己较快地发现并在以后逐步纠正了这些错误。

最严重的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党的事业在三十二年中遭受损失最大，时间持续最长，各方面受到破坏最厉害的就是这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对当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没有搞清楚。结果证明，他的考虑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运用这种革命方式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当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文化大革命”，推行极左路线，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关于怎样评价毛泽东同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老一辈跟随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人来说，几十年来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在他的思想培育下，我们是有亲身的感受的。不仅是我们，大概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毛泽东同志的恩情也都是铭记在心的。邓小平同志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谈的和在党内讲的对毛泽东同志评价的意见，我们是都同意的。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主要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所犯的错误。过去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不能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啊！当时是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我们这些人也不能不负责任啊！谁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在老一辈中是通不过的，老百姓、工人、农民，他们也不能同意呀！

毛泽东关心丁玲

甘露

1948年5月，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那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前夜。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彻夜不眠，计划、部署和指挥三大战役。七、八月炎夏的一天下午三点钟后，毛主席的警卫班长李树槐来我家通知说：天气太热，主席日夜工作太累，大伙要他到室外散步，他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同志同去，还要我带孩子一同去。萧三和我赶紧带着一岁的萧平来到毛主席门前，和乔木、思奇同志以及三个孩子会合。毛主席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去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二十余里，到一个树林边下车。我们把椅子、板凳搬下来，陪着主席走进树林。毛主席坐下一会儿，却见乔木、萧三、思奇同志没有坐而走到一边，只剩毛主席同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毛主席摇着大蒲扇，一边给孩子们赶蚊子，一边问我：“他们几个在干什么呀！”我忙走过去问他们：“主席问你们干什么呢！怎么不来陪主席呀？”他们说：“我们在谈对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见。”我把他们的话对主席说了，并补充说：“最近丁玲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写张家口附近农村土改的。丁玲请他们几个同志看看，提提意见。”前些日子，萧三曾告我，他们几个把丁玲的稿子都看完了，甘露，萧三的夫人。本文摘自1986年《新文学史料》。要找个机会讨论一下，却找到了今天这个机会。主席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过了约半个小时，胡、萧、艾三个人来到主席身边，主席问他们讨论得怎么样，乔木同志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主席这时把刚才说的关于丁玲的话又说了一遍。

树林里闷热得很，主席手中的大蒲扇不停地扇着；林地上的草有半尺高，蚊子、小虫、蚂蚁很多。呆了约一小时，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我是个没有自由的人，散步也得到这树林里来。闷热得很，还是回去吧。”这样，我们就随主席乘车回到村上。

不久，丁玲到了西柏坡，我们见了一面。我把那天毛主席讲的关于她的话讲给她听。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后来我知道，丁玲这次到西柏坡，看望了毛主席、周副主席、邓颖超大姐等领导同志，她也陪主席散步，主席和她谈了很多。

195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着孩子去颐和园，探望住在颐和园云松巢的丁玲、陈明同志。下午三时左右，一位警卫员同志跑上山来问丁玲是否住在这里，“有一位首长要来看丁玲同志”。我们都想不出是哪位首长要来。正好那天丁玲他们收拾好了行装，准备回城。过了一会，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沿着山坡拾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陈明赶紧跑下山去，扶着他慢步上来。丁玲迎上去拉着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了下来。随主席来的人不少，陈明同志让勤务员赶紧去买两个大西瓜来给大家解渴。我帮着切西瓜，毛主席、罗瑞卿等同志和丁玲同志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谈到了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真像家人团叙，轻松欢快。休息了一会，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送别毛主席去昆明湖划船去了。毛主席平时工作忙，很少出来游玩休息，这天是星期天，他来昆明湖散散心，还抽时间爬山看望丁玲，可见他对

知识分子、文化工作的重视了。

1980年后，社会上一度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引起了混乱，少数人对毛主席功大于过的论断表示怀疑，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生动摇。丁玲挺身而出，她在答外国驻北京记者提问时，有记者问：“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三十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丁玲回答说：“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文革’十年动荡，不能说毛主席没有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以教育后代。”这就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女儿丁玲同志对毛主席一生功过的看法。

党的“一大”时对毛泽东的印象

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得有今日，是得力于伟大的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的功业，从井冈山、十年内战、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统一全中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事实中说明了，他的学养从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名著及他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明了。

他的突出的天才，优越的智慧，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的毅力，艰苦卓绝奋斗到底的精神，把三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推翻了，把国际帝国主义的蹂躏榨取到半生不死、残破不全的中国拯救出来，复兴起来了！他是有史以来历史上有数的人物，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我是一个庸人，同毛泽东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除此之外，我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了解。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回到长沙负党包惠僧，1921年曾以陈独秀指定的代表身份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49年从澳门回到北京，曾任国务院参事。本文写于1953年，摘编自《包惠僧回忆录》一书。的责任，我回到武汉负党的责任，我们为了工作也常有信札来往。在1922年春，长沙黄庞惨案发生，我党发动长沙的学生罢课示威。毛泽东因反动统治当局压迫避居武汉，就住在武昌黄土坡我们的机关部内。我们同住了十余日，朝夕在一起，工作余暇我同他还游逛了几次街，有一次在柏寿巷对过一个小馆子里吃了一顿，像这样的接近，我对他也没有深刻的了解。在1924年初夏，我由武汉调广州工作，路过上海，中央发给我五十元路费，由毛泽东发给，我见他气色不太好，身体很瘦弱，有一次我同陈独秀谈及，陈独秀说：“润之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我倒常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他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在省议会附近的一个弄堂里遇见一次，我见他的身体还是不够健康。从此以后，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岁月，我总以为他的健康不够好。后1949年我到北京看了他挂在天安门的照片，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观礼，看见他站在天安门上主席台中间的神采，才了解毛泽东的健康，也就看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明前途，感觉到愉快！

毛泽东访苏的日日夜夜

师 哲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毛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中央政治局对毛主席此行的决定是：给斯大林祝寿之后，毛主席就在苏联休息，条约的谈判则由周总理随后去办。

毛主席的随行人员很少，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和我。我的名义是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12月6日，毛主席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罗瑞卿下去调查处理。李克农、毛岸英继续送到边境。

12月9日到达满洲里，换乘苏联的宽轨火车。所乘火车是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配备了专为毛主席配餐的大夫，车厢内有浴室。到边境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有仪仗队迎接。

沿途毛主席大多时间是自己看书，有时我也陪毛主席聊天，师哲，1940年起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建国后曾任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和外文出版社社长。本文摘编自《陪同毛主席访苏》一文。给毛主席介绍沿线的景致、史迹和乡土人情。当火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苏方预先将电话挂在车站上，苏联外交部一位司长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一路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我们回答一切都好。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时，毛主席感到身体不适。火车停下来，我陪毛主席到站台散步。天气十分寒冷。毛主席感到头晕，接着冷汗淋漓。我赶紧扶他进车厢休息，用凉毛巾敷头。过了一会，毛主席身体复原。火车行至雅罗斯拉夫时，我驻苏大使王稼祥登车迎接，陪同至莫斯科。

12月16日火车正点开进莫斯科北站（也叫雅罗斯拉夫车站），大钟正打12点，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到站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由于天气寒冷，怕毛主席吃不消，欢迎仪式进行得很快，匆匆检阅了仪仗队，便乘车前往下榻之处——莫斯科郊外斯大林战时的住所。

罗申把我们送到住处，只说“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莫洛托夫招呼毛主席休息，并告诉我们下午6时斯大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我们休息以后，警卫人员按时将毛主席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会客室，比约定时间早到了3分钟。斯大林的秘书请毛主席到他的房间坐一下，他去通报。苏联其他领导人到斯大林那里集中是一分钟也不能差的。6时整，斯大林的门开了，请客人进去。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字行列。斯大林双手紧握毛主席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回过头来，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主席。大家在大厅站成一圈，相互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

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尽，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然后开始了会谈。一边是苏联人，坐了一长串；一边是毛主席和我。斯大林坐在中间。斯大林还是关心并询问毛主席的健康，希望毛主席多加注意。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中加重了砝码，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接着，斯大林问：“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毛主席是这样表达他的意思的：“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如果我直接译出，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然而苏联同志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贝利亚竟笑出声来。斯大林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主席说他打算邀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还是不能明白毛主席的意思，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的愿望是：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应由他代表二亿人民的苏联和毛泽东代表五亿人民的中国来签署。至于签订什么样的条约和协定，斯大林也不愿意先提出，以避“强加于人”之嫌，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表现得尤其谨慎小心。然而毛主席却不了解斯大林的愿望，或者根本就不想由自己签约。所以尽管斯大林一再询问，他却不做更明确的回答。

斯大林为了摸清毛主席的想法和愿望，这次会谈后，在休息的当中，又两次打电话给毛主席，仍是问他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要求？毛主席总不说。

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我在毛主席身边翻译。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

大会以后。宴请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在给斯大林祝寿之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对毛主席的行止很少报道，英国一家报纸造谣说“毛主席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于是苏方安排毛主席参观列宁格勒，同时等候周总理的到来。列宁格勒当地领导隆重迎接，并安排毛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连在一起分不出界线了，

冰层在 1—1.5 米的厚度。这里可以看到十月革命时工人暴动的地方——喀琅施塔特要塞。毛主席下车后在冰上踱步，举目眺望，激情地说：“这真是千里冰封啊！”又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威——太平洋的西岸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苏联同志顿时活跃起来，欢腾，鼓掌，被毛主席的激情和广阔胸怀所感动。

估计周总理快到莫斯科了，毛主席返回莫斯科。在乌拉尔山的斯维德洛夫斯克，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里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

周总理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住到毛主席楼上的一间屋子，便于同毛主席商量问题。

斯大林直接给毛主席打电话共三次。前两次是我接的，第三次是我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总理工作之时，孙维世接的。因意思表达不够明白，斯大林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毛主席，还是问毛主席的打算和愿望。此时，条约虽在拟定，但是斯大林对谁来签约，仍不知毛主席的想法，所以又来一次试探。毛主席的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我把原话译给了斯大林。

在工作人员拟订条约和协定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毛主席说他也有此意。毛主席还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立即答应派尤金来华。后来尤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由我随时译成俄文，邮寄斯大林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单独抽出提前编译的。斯大林阅后指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签字仪式于 2 月 14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联，周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签字。维辛斯基和周总理都发表了讲话。

斯大林原打算在签约的同时，签订贸易协定。可是到了举行签字仪式时，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耽误了时间，所以没能将贸易协定按时拿出来。斯大林问及，他的下属竟说“中文没有准备好。”斯大林让我把这话译给毛主席，我译了。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斯大林感觉到了，再三追问我毛主席说了什么。我说：“是我们私下的话。”他就不便再问了。

在签字仪式上灯光很亮，眼睛很难受。斯大林和毛主席站在一起，比毛主席矮些，照相时，他向前移动了一下。在照片上就显得和毛主席一样高了。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宴会时间很短，中午 12 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住处，王稼祥立即着手告别宴会的准备工作。

位于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2 月 14 日这天，全部由中国大使馆租用。

下午 6 时半，来宾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约五百人。他们都不知道斯大林今天会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门口迎接。一会儿，在严密的保卫下，斯大林率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许多苏联高级干部都没有这么近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直到毛主席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之后才停息。

宴会厅是用玻璃板壁隔成的一大一小两厅。毛主席、周总理、斯大林及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在小厅，其他来宾均在大厅。到祝酒讲话时，因玻璃板壁隔音，大厅里的人听不清讲话，都拥向小厅。眼看玻璃快要挤碎了，周总理见势不妙，忙叫人把活动板壁拆去，两厅成一厅，才使大家安定下来。

席间，毛主席曾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2月17日离开莫斯科。

临上汽车时，为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服务的斯大林身边的和克里姆林宫的服务人员都哭了。除了个别人尚能到车前握手送别外，全都哭得出不了门，给毛主席端饭的就是平时给斯大林端饭的二十多岁的姑娘瓦丽雅哭得尤其厉害。我同一位送行的上校说起此情，他说那些服务人员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理解他们，关心他们，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他们感动得不得了，所以有感情。

莫洛托夫到毛主席住处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于毛主席赶到火车站，在那里迎接毛主席并送上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中苏双方的保卫人员，莫洛托夫想同毛主席说几句话，我好不容易才挤过去。莫洛托夫对毛主席说的是：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这是斯大林再三让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说完握手告别下车。

1950年3月4日晚毛主席一行回到北京。

在延安给毛泽东治病

朱仲丽

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很少生病。如果说他有时生病的话，那就是神经衰弱失眠症，经常要吃些安眠药。

有一阵子，毛泽东同志的右肩发痛，时而痛得不能入睡。医生们要给他会诊，他却怕多花大家的时间，只是叫我去看看。我认真地向毛泽东同志建议说：“这是应该认真治疗的，免得将来抬不起肩膀。”

毛泽东同志故意开玩笑说：“我又不是从事体力劳动，怕什么抬不起肩膀，能用脑子就行。”说完他就笑起来了。我却十分认真地说：“不彻底治好，将来右手活动也会受阻碍的！”

“看，你们当医生的总欢喜吓唬人。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八分；其中一、二分是言过其实。你说是不是？”

我笑着说：“主席，我真不是骗你。假如不及时治疗，以后写字、拿筷子、睡觉、咳嗽，连握手都会痛！”为了提醒他的注意，我故意说得严重一点。

“啊呀，你想要吓死人呀！照你说的，饭摆在桌上不能吃，文件不能批，想写文章不能握笔，瞌睡时不能躺下睡，感冒了不能咳嗽。听不得，听不得！病人要是听你们的，会急得神经衰弱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曾任中央机关所在地医务所所长。本文摘编自《灿灿红叶》一书。了！”毛泽东同志打趣地说。

“唔！我说的话都是真的！”我生怕他不相信，倒有些着急。

“好，我来问你，这叫做什么病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看来，毛泽东同志是要考考我的业务水平了。我正经地回答：

“这在医学上叫做肩胛关节周围肌腱炎，人到五十岁左右就容易患这种病。”

他又取笑说：“看样子，你又想要我上你的当了。这么说，人到了50岁，就要来一个不能吃，不能写，不能睡，还不能咳嗽的大灾大难罗！”毛泽东同志看了我一下，又风趣地说：“握手是洋人的礼节，不能握手倒不要紧，可以来一个中国式的点点头、拱拱手。”我忍不住笑了，告诉毛泽东同志，拱手也会痛的。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这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考问我。

我想了一想，就说：“是不是睡觉时没有盖好被子？或者是被哪里来的冷风吹着了？”

已是初秋时节，窑洞里不很暖和，我环顾窑洞，发现朝阳的一面有个小窗开着，朝北的那一面依着山，有一个约两米高、一米宽的洞。“对了，对了！就是从这个防空洞口吹进来的过堂风害人。”

毛泽东同志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好，这个原因寻着了。看起来不正之风是可以使人生病的哇！今天我从你这里学到了学问。我看，凡是从防空洞里吹出来的风，总是逆风和歪风，那就非堵住它不可。要不然，真会像你讲的那样，害死人的！我们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一定得提防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的歪风，不能有半点大意啊！”毛泽东同志很幽默地说着，显得十分高兴。

当勤务员来送水时，毛泽东同志指着“防空洞”的洞口说：“你告诉秘书，做一个棉帘子，把这个防空洞盖住。是这位高明的医生说的。”他一边说一边对我笑着。

医生还是给毛主席会诊了。大家一致认为慢性肩关节炎，必须每天热敷、按摩。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当天就为毛泽东同志的肩膀和手臂按摩了几十分钟。

“啊！是舒服些，这证明是要服从你这个年轻医生的命令。”毛泽东同志耸了两下肩头，似乎感到轻松多了。

一天，我照例按时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给他治疗。他正埋头写文章，一发现我，马上放下笔，坐到另一把椅子上。我连忙走过去，站在他的背后，开始给他按摩。

“真要感谢你，治病救人，消灾除难，阿弥陀佛！我这里的防空洞已加上帘子，堵住歪风了。”毛泽东同志像往常一样谈笑着。我说：“这很好。不过，还有事哪。”他笑着问：“还有什么事？”我说：“按摩只是别人帮助你使肌肉活动，更重要的还是要靠你自己加强锻炼，促进肌体功能的恢复。我要请您自己一天活动两次，把发痛的右手抬高，从右边头顶上绕过去，摸左边的耳朵根。”说完，我就走到他面前，慢慢地给他示范了一遍。

“噢？又出新名堂了！治关节病要一天摸两次耳朵根子，只怕又是你的新花样。”

我一边用心给毛泽东同志按摩，一边肯定说：“嗯！您的右手什么时候能自如地从头顶上弯过去，摸到了左耳朵根，就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啦！”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的话，又幽默地说：“本人的耳朵根子，自己早已摸过，是很硬的，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口蜜腹剑、流言蜚语、哗众取宠等等，这一类的话，我一概听不进，就是因为我的耳朵根子硬！”主席说完后笑起来了。我想了想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又大胆地说：“主席，您的话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早几天，您说的从防空洞里吹出来的歪风、逆风，是指资产阶级的坏风气，使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一些人思想上产生了毛病；方才您说的耳朵根子硬，是叫我遇事要有冷静的头脑，多作客观分析，并且懂得兼听则明的道理。”

“好嘛，看来，你的耳朵根子也不软呢。”毛泽东同志好像称赞我，我心里很高兴。

毛泽东同志整日在窑洞里写文章，批阅文件，坐的时间很长。他的肩关节炎由急性变为慢性，很长时间没有治好，就是因为他的手臂活动太少，影响了功能的恢复。为这件事，卫生处处长傅连障和几位医生动了不少脑筋，各自出了不少的主意，最后大家觉得请毛泽东同志打打麻将牌，跳跳舞，或者打打乒乓球，是积极的治疗办法。医务处长分配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服毛泽东同志打麻将牌。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到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去了。

毛泽东同志这天的心情非常好。因为近一个时期，根据地一天天扩大，队伍和武器不断增加，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抗日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他见我来了，就要我坐下。他说：“我猜猜看，你是来陪我打麻将的吧？”毛泽东同志似乎已经知道我的来意，看来早已有人动员过他了。我说：“是呀，这是为了使您活动活动肩臂关节。”

“又来做好事了。不过，打麻将牌是很浪费时间的咧！”毛泽东同志很不情愿地说。其实，我也不喜欢打牌。我们年轻人喜欢动、性子急，觉得打

牌没劲头。可是，为了使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得到一点休息，大家都乐意抢着干。我不住地苦苦劝说。

毛泽东同志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唉，你们的嘴就是厉害。好嘛，医院开来的处方一个，打麻将四圈，目的是帮助肩关节的功能恢复。”他还说：“麻将牌是打过的，那是在青年时代。十几年没有搬这些砖块了。好，难得今日有缘。”

窑洞里，顿时响起了哗哗啦啦洗麻将牌的声音。我们围坐在一张小方桌的四周，有说有笑，笑声中夹着“中”、“发”、“白”和噼噼啪啪的放牌声，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平添了不少情趣。

我和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叶子龙同志，同毛泽东同志打牌的次数最多。四个人也要争个输赢。我常常故意出一张好牌给毛泽东同志，他笑呵呵地连“和”了两盘，面前的筹码棍子，红红绿绿地擦了一大堆。他笑着说：“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位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不，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我假意他说。毛泽东同志取笑说：“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进当铺！”惹得满桌子的人大笑。

每次打过一阵麻将之后，毛泽东同志就说：“好啦，今天又听了你们的话，搬了花砖，摸进一块，又打出一块，运动了肩胛关节，服从了医生的命令，到此为止吧。”说完他就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继续批阅文件。

为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健康，我们常在一起研究怎样使他们的生活多样化，搞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动。除了劝他们散步，打打乒乓球和麻将之外，我们还动员毛泽东同志学跳交际舞。

那时候延安的生活极其艰苦，没有电影，舞台文艺又很简单，没有像样的乐队，也没有较大的礼堂。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大家很想松弛一下脑神经。于是，有关的领导同志就利用既作食堂又作小会议室的平房，每星期六的晚上组织一次跳舞晚会。可是，当初会跳舞的同志很少，后来经过一段互教互学，跳舞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

为了请毛泽东同志学跳舞，我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起初他对跳舞毫无兴趣。我们就以锻炼身体为理由请他参加。后来他又说没有时间，我们就注意挤他的时间，多半在晚饭过后不久就去请他。

一天，毛泽东同志终于被我们说服，走出他的窑洞，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学跳舞了。窑洞外面，有个不大的土坪，这就是我们临时的舞池。太阳快要落山了，金色的晚霞抹在杨家岭的窑洞顶上。一张方形凳子摆在土坪的一角，凳子上放着从前方缴获来的胜利品——一架手摇式留声机和几张旧唱片。我们使劲摇着留声机的摇把，上紧发条，留声机发出了不大动听的西洋乐曲声。大家争着教毛泽东同志怎样摆好脚式和手式，怎样端正脊背和腰身，一遍又一遍，反复地摆样子给他看。开始，毛泽东同志心不在焉，走起舞步来，简直和士兵操练没有多大区别。“一、二、三、四”，我们喊着，打着拍子教他，让他向前走几步，又向后退几步。毛泽东同志诙谐地说：“你们几个都来支配我，让我向前我就得向前，让我退后我就得退后，向左就得左，向右就得右，你们好厉害呀！”

每次请毛泽东同志跳舞，他都是只给我们片刻时间，而且是应付式的，勉强走几步就没有兴趣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正在执笔写《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稿。不过，那时经过一番练习，毛泽东同志打下了跳交际舞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后，我也和毛泽东同志跳过舞，这时，他已经会跳好几种舞，舞步纯熟，能很好地掌握节律，就连典雅的探戈也跳得很有姿态了。

在中南海的春藕斋、怀仁堂、勤政殿的大会议室内，组织过许多次跳舞晚会，有时有很好的大型乐队伴奏，还有舞蹈、清唱、相声等演出，毛泽东同志偶尔也来活动一会儿。他曾经和我说过，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场所，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不便和别人谈话了。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杰出代表

刘少奇

1945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循着这条道路，在1927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

刘少奇还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这里指社会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新，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苏扬整理）

毛泽东博学多才，魄力过人 纪登奎

(一)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主要功劳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新中国。

毛泽东博学多才，魄力过人，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从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前，这20多年是他老人家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带领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50年代末，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同我们共同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毛泽东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跟赫鲁晓夫翻了脸。后来，才有苏联撤走专家以及中苏大论战。

当然，他是一把手，要是能出去多访问一些国家，长长见识就好了。

毛泽东多才多艺，“九评”是毛泽东同志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纪登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本文是1988年1月纪登奎接受记者王灵书采访时谈话的一部分，摘编自《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一文。他老人家生前对“九评”是十分满意的。

很可惜，“九评”文字虽好，但经不住历史检验。现在看这九篇文章，大部分观点都不大站得住脚。如南斯拉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同志逝世前，身体已不行了。起不来床，脑子也有点糊涂了。

他接见的贵宾都是友好国家的，人家回去也不说。贵宾到来前，先把技术最好的摄影师找来，做好摄影的一切准备。贵宾到了后，由人家把他老人家搀扶起来，托着他的手和贵宾握一下，摄影师把这一瞬间摄下来。实际上已谈不了什么话了。

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政治运动，特别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毛泽东文章写得不错，话也说得对，但到了晚年，他自己往往违背自己的思想。几乎谁也不相信了。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让毛远新当联络员。另外，见他时，说话也不随便，只怕哪句话错了，跟五六十年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

(二)

那是在50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他又让我去搞搞工厂。说搞搞工厂有好处。派我组建洛阳矿山机械厂，让我到苏联去学习。在建厂过程中，他又一次来河南时，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缺少文化技术知识，对办工业也缺乏经验。他问我知不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关于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段很有名的论述。我

说了。他又问我记不记得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一段话，我把关于我们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的话复述了一遍，他高兴地点点头。然后指示我要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学点文化知识，同时还说，回北京后，建议中宣部发这样一个通知，让全党干部都补习文化。

毛泽东回北京不久，这个通知就发下来了。我则从工厂请了大学生给我上课，学初高中的课程，还有机械制图以及管理工厂的有关技术知识。那段时间，我可学了不少东西，对日后工作帮助很大。可惜后来大跃进开始，中断了，要不，大学课程里的微积分都要学的。

再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批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他们没敢说我被关着还没有人身自由呢。省军区领导人匆匆赶来告诉我，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话”。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样一宣传，我的作用就不那么好了。老干部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气，都让向我学习，他们吃苦更多了。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所以，他老人家犯错误，我也跟着犯。

（三）

关于“九·一三”事件，国内出的书刊也报道过不少。有一套书《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叙述的“九·一三”事件基本上是真实的。

当林彪的飞机出境后，周恩来总理请示毛泽东：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毛泽东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就这样，眼看飞机出去了。毛泽东当时就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

至于飞机到底是怎么掉下来的，分析过多种可能，但都是“可能”，准确的原因，谁也说不清了。

那架直升飞机，倒是毛泽东亲自命令拦截回来的。那上面有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大小舰队名单。这对后来处理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些罪证拿来后，送给毛泽东看。他指着“舰队名单”等材料问：究竟哪个是其骨干名单？经过研究，才确定“舰队名单”是他们的骨干分子。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将“舰队名单”上的93人全部抓起来。这个任务是我接受的。没几天，93个人全部抓到。

心中的毛泽东

杨开慧

杨开慧这个名字、在毛泽东的言谈中提及似乎不多：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时，他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及自己的生活经历时说，1918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在那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从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他写信给杨开智，提出让老太太与其女儿、他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人们知道更多的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深切爱恋渗透在他的诗词里。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这一曲《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众所熟悉的。人们被词中的怀念之情深深感动。

1923年，毛泽东赴上海时，行前为杨开慧曾作《贺新郎》词一首，表达他剪不断理还乱，依依不舍的离愁别绪。“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一句，便勾画了他与开慧的相知、相亲、相爱。

鲜为人知的还有，1921年热恋中的毛泽东给杨开慧写过一首《虞美人》的词。杨开慧接到词后曾为此激动不已，她忍不住悄悄把它读给自己的好友李淑一，并对好友说，毛泽东非常喜欢她。的确，这首词写得十分缠绵动人，词曰：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感情如此，那么在杨开慧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呢？

杨开慧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聪慧好学，且一身傲骨，独具超凡脱俗的个性。她对生活对爱情都有自己非同寻常的见解。

在杨开慧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不平常的男子”，有着非凡的才干和魅力。自从她读了毛泽东的日记和文章，就为毛泽东所倾倒。为了毛泽东，她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关于这些情况，杨开慧曾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我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结婚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得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部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

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运命！

杨开慧还说，他们共经历了两年的恋爱生活，其中也曾有一点小小的波折，那是因为她常常把对毛泽东的爱藏在心底，惟恐毛泽东看见她爱他的心。然而波折过后却令杨开慧倍感欣喜。她说：“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1920年冬，这对年轻人终于携手，率先向封建旧礼教提出挑战，实行了自由恋爱结婚。

新的生活中，杨开慧把自己的感情紧紧融合在对丈夫革命事业的支持中。每一次短暂离别的相思总等来重逢的喜悦。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匆匆告别杨开慧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上了井冈山，这一次谁也未曾料到竟是永诀。

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开慧担忧着毛泽东的安全，心情惆怅。1928年她写作《偶感》一词，心中的怀恋之情跃然纸上：

“天阴起朔〔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1930年杨开慧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而杨开慧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她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表达了她对革命事业的热爱和对毛泽东的忠贞。她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爱情的诺言。

（苏扬编写）

西柏坡毛泽东运筹帷幄

杨成武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的重要时刻。我们华北军区所属的晋察冀野战军的一部，正在保定以北地区顺利进行保北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旅，占领定兴、高碑店、北河店一线的胜利。7月31日，我接到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电报，要部队立即收兵到易县、涞源、狼牙山地区进行集训，准备接受新的作战任务；并要我马上赶到军区，随同聂荣臻司令员去中央接受任务。

8月2日，我赶到了华北军区所在地平山县烟堡村，见到了聂司令员。

聂司令员对我说：“主席找你去，一起谈。任务是准备配合东北作战。东北部队准备攻锦州，打锦西、沈阳增援的敌人。主席考虑，要华北野战军配合东北作战，把华北的敌人拉住，不让它出关，否则东北作战会受影响。你指挥的部队组成第三兵团。具体情况到那里去谈。”

听了聂司令员的话，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从1946年7月，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以来，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在广大人民群众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二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本文摘自1988年发表的《西柏坡受命》一文。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两年来，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不仅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到了1947年底，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现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将东北敌人全歼在东北境内，迅速解放全东北。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形势啊！

8月3日上午，我随聂司令员骑马沿滹沱河北上，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西柏坡，这个载入中国人民革命史册的地方，在河北省平山县境内，太行山东麓柏树岭下，距石家庄市90余公里，背枕高山，面对平原，有上百户人家，是个风景秀丽的山村。1947年春天，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首先来到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两个月前，毛主席、周副主席以及中央直属机关，从陕北出发，经晋绥、晋察冀，辗转千里，最后在这里安下了大本营，指挥全国战略决战。

我们先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说：“下午3点，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跟你们一起谈。”

下午3点，聂司令员带着我准时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个住处是一间房子外加接出去的一个棚屋。那棚屋几乎跟瓜棚一样简陋，两侧各树起3根立柱，架着横梁，上覆苇席。左边的立柱砌在墙里，靠有的立柱还暴露在墙外。

我们走进棚屋，只见正中放着一张高脚旧八仙桌，四面摆着四条长凳。毛主席坐在对面的一边，左首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右首是刘少奇和任弼时同志。主席招呼我们在他的对面坐下。毛主席非常客气，用瓷盘装了一盘子糖果，放在八仙桌的中间，请大家吃；又给每人倒了一搪瓷缸子茶水，这才拿起一份电报，说：“你们先看看。”

聂司令员接过电报，看完后递给我。这是中央军委1948年7月22日23

时发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告东北局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转到南面作战，指出南面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也预料到这一行动会遇到的困难，特别是粮食问题，要求东北野战军研究克服困难的方法，加紧政治动员和粮食等项的准备工作，制订出具体作战计划，要在8月间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并命令东北野战军机关先期南下，加强冀热察辽区域的工作。这份电报的核心是命令东北野战军8月份开始南线作战。正是这份电报的精神，导出后来名垂战争青史的辽沈战役。

我看完电报，把电报放在桌子上。

毛主席喝了口茶水，对聂司令员和我说：有没有问题？同意不同意？他见我们完全同意，就又递给我们一份电报。

这第二份电报是中央1948年7月30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央军委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军集中锦、唐，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东北野战军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这一份电报使前一份电报进一步具体化，特别是把锦州战役明确地提到作战日程上。

读完这两份电报，我明白了，今天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召我们来，赋予我们的使命，同东北我军的一次重大战役——锦州战役，密切地关联着。东北、华北唇齿相依，支援开发与建设东北解放区以来，我们曾多次牵制关内敌人，支援东北我军作战。如1947年东北我军实施夏季攻势，中央军委电报指示我们：“配合东北作战，不使敌人向东北增援。”我们出兵青（县）、沧（州）津浦线北段，威胁天津，拖住了关内敌人的主力，为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今，由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集体面授机宜，如此庄严郑重，要交代的任务自然非同一般了。

我们看完了两份电报，毛主席问我们有没有意见？

聂司令员和我都说：没有意见，坚决执行！

接着，毛主席站起来，伸出两个指头，操着浓重有力的湖南口音说，晋察冀野战军六个纵队，现在改组为华北野战军二、三两个兵团。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二纵队一个旅，组成第二兵团，并统一指挥冀热察的地方部队，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员；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两个旅、第六纵队组成第三兵团，并统一指挥晋绥的第八纵队、内蒙的两个骑兵师以及晋西地区的地方部队，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天焕同志任副政委。毛主席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你们第三兵团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作战。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你们把傅部的主力拉往在平绥线，调动他们向归绥转移，使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与此同时，第二兵团则出击冀东，以一部在承德、北平线配合东北作战；另一部在北平、张家口行动，配合你们三兵团在绥远作战；徐向前、周士第的一兵团仍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这样，就可以保证东北我军作战的胜利。毛主席说到这里，看了看我们，问道：“你们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什么要求？”

我脱口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毛主席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指出：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在那里经营了20来年。国民党搞了很多欺骗宣传，那里的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还不太了解，特别是那里的粮食

相当紧张，征粮不是一般的困难。傅作义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搞坚壁清野。过去，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分部队两次出击绥东，都没站住脚，主要原因就是吃不上饭。第二个困难是供给支前困难，供给到前线很不容易。第三个困难呢，可能战斗很不顺手。这些困难都摆在你的面前。这些困难中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的问题。毛主席指出这些困难后，问我：“你看怎么样？”

“没有问题，都可以克服！”我回答说。

毛主席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不是当年在毛尔盖我授予你北上过草地任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带一个团，不过 2000 人。现在是个兵团，四个纵队，还有骑兵部队，那么些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十多人，都要吃饭呀，能说什么困难也没有？”

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他向部下既交代任务，更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使我深受感动。

我断然他说：“主席，没有问题，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毛主席说，现在我问你，能不能站住脚？

我坚决他说：“能！”

毛主席又说，过去一纵队、六纵队被人家赶出来了，你们会不会被赶出来？

我肯定他说：“我们去，不会被赶出来！”

毛主席问为什么？

我说：“我们有四个纵队，两个骑兵师。”

毛主席语重心长他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两个兵团：孙兰峰兵团、董其武兵团。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你要消灭他，他要拼命地和你干。你要消灭他的命根子，端他的老窝，触犯了他的根本利益，他非和你干不可。成武啊，困难就在这里，要估计透。第二，傅一辈子经营绥远，采取了许多欺骗手法，还搞了些小恩小惠，群众对他有幻想。他进行连保法，一人“通敌”，株连全村。他又在群众中进行像我们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坚壁清野。你搞不到粮食，就站不住脚。成武啊，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

这时，少奇同志接着说：“要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

毛主席又说道：不行！我刚才讲出了这不是过草地那个时候。现在部队多了，如果你没能站住脚，怎么行呢？察南战役时你们派两个纵队进入绥远怎么没有站住脚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这个教训你们必须记住。如果要保证站住脚的话，你们必须做到：一、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就是思想准备。要把困难想够，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够想透，充其量最大的困难有多大。根据存在的困难，想出如何对付这些困难。你们必须依靠群众，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把困难统统摆出来，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你讲困难可以讲 10 条，讲有利条件只讲 5 条。而且把这些困难，可能的困难，一条一条地向干部讲清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你们要开一个整个兵团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请聂荣臻同志作一次讲话，作一次指示，告诉全体指战员，害怕困难的可以不去，明确地告诉，可以报名。告诉他们，去了以后，到了傅作义统治的地区，如果跑回来那就不好了，有生命危险，也失密。聂讲完了杨成武再讲。再开誓师大会，然后，每一个军，每一个师，看你们住的地区，以纵队为单位，或者一个旅两个旅一起，开一个全体指战员誓师大会。如果准备了对付充其量的困难，准备了对付十分的困难，它只来了七、八分，克服它就有把握，

更主动了么。进军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抄傅作义的“老家”，到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辽沈战役，保证把关内傅部的主力两个兵团拉住。能拉住这两个兵团，也就把华北的中央军拖住了。傅作义虽然当了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但他舍不得老本钱，不会丢下他的两个兵团，把中央军派到关外去支援卫立煌。抓住他的这个特点，做到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东北的部队就可以完成锦榆线上的作战，完成辽沈战役。这就是东北在那里打，华北在这里牵。你们不是直接参加辽沈战役，而是间接地参加了辽沈战役，这是第一点你们要做到的，这叫精神准备、思想准备。第二点要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武器弹药该补充的能补充的就赶紧补充。刚才成武同志讲没有问题，过去进去是两个纵队，现在是一个兵团。比过去人多，力量大了，是个优点；但人多了，吃饭更是个大问题，要把吃饭问题当作站住站不住的最大的困难。绥远那个地方只要有银元，就能搞到粮食。

毛主席说到这里，稍有思忖，转向周恩来副主席：你交代薄一波同志，给他们10万现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大洋在绥远是很管用的。

周副主席点了点头，说：好！我立即通知一波同志，叫他们着手筹划这笔款子。

听到要拨给我们这么一大笔现洋，我忙说道：“10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呀，我怎么带得动啊！”

朱总司令听我这一诉说，笑了笑说：“你们可以用红军时期那个办法嘛，连长、排长和各级干部都可以分着背几十块，没有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听了朱总司令的话，我连连点头。

毛主席接着说道，克服困难的另一个办法是，晋西北、晋察冀组织强有力的支前部队，支援你们，组织一个强大的工作团，到绥远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也可以带一批支前的民工、担架队呀，把这些组织好，包括民工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都要做充分。

毛主席稍作停顿，往放凉了的茶水里加了点热水，润了润嗓子，接着说下去：第三个准备，首战必胜。第一仗必须打胜。第一仗把集宁那个师消灭了，消灭一个师可以用两个纵队，六比一，占领集宁城。然后由集宁，由东向西，各个纵队以归绥为总目标，向西进军。把东面的集宁占领了，把西面的包头占领了，把凉城、丰镇都占领了，就留下一个归绥，那你们就站住脚了。首战必胜，这一仗必须打好。这是你们要注意的第三点。

周恩来副主席说道：包头是个工业区，占领了以后，可以堵击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向东增援，堵住口子。

少奇同志说：占领包头很重要。包头以西就是宁夏的马家骑兵，卡住包头这个口子，“二马”就不敢东进。

等少奇同志说完，毛主席说：第四条准备呀，是全体指战员都要做群众工作，人人做群众工作，必须把群众工作做好。做群众工作，就是宣传我军的政策，我军的主张。因为傅作义搞了许多欺骗宣传，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从行动上做出样子来，让群众知道我们是解放他们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主要的是秋毫无犯。严格执行工商业政策，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买卖公平，军民一家，帮助群众治病，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用实际行动做群众工作，让群众不害怕我们，知道我们是解放他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地方工作团要组织大一点，可以组织几百人的地方工作团，占领了地

区呀县呀区呀，组织群众，组织人民政府，组织人民团体，做宣传工作，帮助解放军的前线作战。这一条非常重要！

朱总司令说：还有一条你们要严格注意，就是要严格执行俘虏政策。敌人欺骗他的部下说，共产党的部队，俘虏一个杀一个。你们必须做到缴枪不杀，不搜俘虏的腰包，不收俘虏的一件东西。经过教育，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叫他参加；不愿参加的，发几块钱叫他回家。我军建军以来行之有效的俘虏政策，你们必须严格执行。

毛主席接着说：第四点就是严格执行党的各种政策：群众政策，俘虏政策，工商业政策。出发以前就叫全体指战员明白，人人开口，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是胜利的保证之一。

毛主席讲完了这些以后，看了看表，说：你们今天就不要走了。你们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要解决的。荣臻同志，成武同志，你们就住在这里，可以和恩来同志再谈一谈。只要你们把今天谈的在全体指战员那里都落实了，或者基本上落实了，我看就没什么问题了，你们就能在绥远站住脚。再说一遍，你们进军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把关内的敌人拉住，不仅要在军事上打胜仗，占领绥远后，还要在工作团的配合下，经营绥远，把绥远变成解放区。

毛主席说完后，中央首长又你一言，他一语，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指示。小小的棚屋，气氛庄重而又活跃。我一边听，一边注意记录。被问到“怎么样”时，我每每回答“有把握”“没问题”“一定完成任务”。周副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弼时同志，都有重要指示。我没有想到的，各位首长都讲到了，毛主席连行军走路的鞋子问题都想到了，指出每人多带一双，到了绥远有钱也买不到。还说，棉衣都带上。一到那里就冷了，绥远比河北省冷得多。毛主席还指出，行军要分若干路，没有打响以前要注意隐蔽，越是接近绥远，越要尽可能夜行昼宿。

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围着一张大八仙桌，一边说，一边喝茶，一边抽烟，也有的慢慢品尝着毛主席请大家吃的糖果，气氛十分热烈融洽。听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使我们对完成进军绥远的任务充满了信心。这天晚上，我们就在西柏坡住下了。聂司令员和我同住一间房子。我们两人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作的指示回忆了一遍，并逐一作了研究。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这许多重要的指示，都是他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我们必须严格遵循。这天晚上，聂司令员也对我作了许多具体指点。我想到这项任务重大，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最好由两人分担。我考虑李井泉同志是晋西北的书记，有根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政治工作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地方工作团和繁重的支前工作也都得靠他。于是，我向聂司令员建议由李井泉同志来当政委，我不要兼，他表示同意。

西柏坡的夜，一片静谧，偶尔传来几声“王刚哥”鸟的啼叫，间或响一阵哨兵换岗的脚步声。这时部队和老乡们都已酣然入梦，但毛主席那间平房还闪着灯光。深夜，中央军委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二兵团领导人发出了通报：“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八个旅）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得志、罗瑞卿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涿源附近以20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之作战。”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聂司令员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头天晚上我们研究的贯彻意见，并说，成武建议，请李井泉同志担任兵团政治委员，我认为很好。

周副主席欣然同意。于是，他带我们又到了主席办公的那间棚屋。周副主席、聂司令员向主席作了汇报，并向主席谈了要李井泉同志担任政治委员的理由。主席问：“是谁提的建议？”周副主席回答说：“是成武同志建议的。”主席当即表示赞同：“就这么办，马上下命令，要李井泉同志在朔县等三兵团部队。”

临走前，毛主席又加拨给我们一批布匹，以备饿肚子的时候换粮食吃。

8月5日，我们回到了华北军区。聂司令员叫我向军区其他领导汇报了到中央接受任务的情况。聂司令员、薄一波政委、滕代远副司令员等军区领导同志又给我作了具体指示。第二天，我带着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托和军区首长的期望，回到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狼牙山东麓的易县远台村，立即着手进行各项具体准备工作。4天以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来到远台。我们召开了全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请聂司令员在会上作了报告。聂司令员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详细地给大家讲了国内外形势，讲了毛主席亲自决定的这一战役行动对东北我军作战的重要意义，讲了作战部署，提出了对部队的要求。聂司令员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到会同志的斗志，大家都异常兴奋，情绪激昂。回去以后，各纵队都开了誓师大会，进行了思想动员。随之，进军绥远的战斗准备和战前练兵，就紧张而有秩序地在各部队全面地展开了。

秋季，狼牙山红叶烂漫，层层梯田上，高粱谷子熟了，一派丰收景象。8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三兵团各部队从易县、涞源地区分路出发向雁北开进。经过一周的行军，到了朔县地区，与李井泉政委带领的工作团和晋绥八纵队的姚喆等领导同志会合了。南北两路行军队伍，也都按期赶到，在预定的朔县、山阴、代县地区集结。兵团前委在朔县的西马庄召开了有晋绥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

9月4日，部队继续向绥远进发。各部队分别向集宁、归绥展开。为了隐蔽行动，部队昼宿夜行。虽然是中秋时节，塞外已是北风呼呼，寒气袭人。指战员们负重七八十斤，长途行军跋涉，不少同志脚上打起了泡，肩上磨出了血。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鼓舞着同志们战胜各种困难，勇往直前。绥远地区村落稀少，宿营困难，为了不惊动群众，部队多在屋檐下、门洞内、矮墙边、草堆里，甚至街头过夜。连队还利用行军间隙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打扫院子，挑水推磨，宣传我党政策，使沿途群众打消了疑惧。共产党的好政策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像春风一样吹拂着寒冷的塞北大地，温暖了广大群众的心。

在进军中，各部队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想了很多办法解决粮食困难。毛主席批给我们的银元、布匹，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部队都是用它换取小米、土豆和一些蔬菜、牛羊肉。一路上，李井泉同志带领的工作团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踊跃支前，本着买卖公平的原则，做到有粮给粮，有土豆给土豆，保证了部队基本上能吃饱。

按照毛主席首战必胜的指示，我们用一、八两个纵队包围了集宁城。集宁是绥东重镇，是连接张家口、大同的要地，城围8里，城高2丈5尺，宽1丈余，外有6尺宽的护城河。城东有老虎山，城西是卧龙山。敌人在这两

个制高点构筑有钢筋水泥工事。面对坚城，我军将士勇猛顽强，机动灵活，不到一天就攻下了集宁，歼敌一个旅，俘虏敌旅长，传出了进军绥远的第一个捷报。与攻打集宁的同时，我军以破竹之势，用4天时间解放了绥南、绥东的广大地区，又歼敌6500余人，控制了从丰镇到归绥以东的平绥铁路全段。就在这时，我二纵队攻占了包头城，并向西迫击逃敌200余里，歼敌大部。我骑兵部队沿大青山向绥北发动进攻，接着解放了绥西和绥北的广大地区。这时候，天空飞起鹅毛大雪，夜间气温降到零下20℃。同志们的眉毛都结上了冰霜，戴着口罩呵出的气很快变为“冰须”。部队忍饥耐寒，顽强拼搏，横扫塞外，乘胜包围了孤城归绥，直逼傅作义的老窝。

三兵团的这一行动，使傅作义大为震恐。他看到后院起火，便慌慌忙忙令他驻扎北平、张家口的嫡系部队步、骑兵约十个师旅星夜西援。情报传来，我们便留下一个纵队和地方部队监视归绥，控制包头。主力立即挥师东进，集结在丰镇、集宁、凉城地区，准备打击西援归绥之敌。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向北平、承德、张家口地区进逼，策应三兵团的作战。这时，傅作义又不得不命令援绥的十师之众，掉头东返，疲于应付。这样，中央军委、毛主席关于拉住傅部主力，不使其出关的战略意图终于实现了，保证了东北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并为随后取得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资质俊秀，殊为难得

杨昌济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著名教育家。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毛泽东的老师。后来是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还曾致信章士钊说：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是海内的人才，前程远大，请兄务必尽其可能帮助”。“君不言救国则己，救国必先重二子”。本文摘自《达化斋日记》一书。

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即梁启超。

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杨尚昆

1986年9月5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我总是想，毛主席确实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带领军队上山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他是最早的。他领导我们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毛主席逝世十周年快到了，我想到了几个问题，在这里谈一谈。

第一，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中国革命用什么方法才能取得胜利？长期以来，我们党包括党中央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时，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宣布胜利这样一种观念，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立三路线是把这种观念付诸行动了，定出了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当时有些反对立三路线的人，在观念上也是主张夺取中心城市，然后走向全国胜利的。立三路线之后，又搞了一个‘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还是搞中心城市暴动，像武汉、南昌这些大城市。毛主席最大的贡献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提出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这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遵义会议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才真正解决了怎么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那时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说不到一起呢？就是因为对革命的途径、方法认识不一致。毛主席关于依靠农民，搞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我觉得在他大革命时代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搞农村调查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毛主席为什么没办一个工人运动训练班，而是去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呢？就是因为他确实是注意农民问题的。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当时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主要是在城市，不在农村，毛主席说服了许多知识分子注意农民问题。毛主席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如果可以类比一下的话，那就是像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是：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至少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列宁把这个原理发展了，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在一个或者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列宁如果没有提出这条路线，如果他不用这个思想去武装布尔什维克党，那俄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同样，如果毛主席不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武装中国共产党人，那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哪条道路？现在证明，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其他道路是走不通的。搞盲动主义，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都没有把中国革命搞成功，而且越搞越糟。把中国革命引上正确的成功之路，这是毛主席最伟大的功勋。

第二，长征。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如果不是由毛主席来指挥，打着圈子四渡赤水，调动敌人跟我们走，然后进云南，巧渡金沙江，那么红军也没有出路，可能要被打散，最少一方面军要被打散了。当时我们四面都被敌人包围，没有办法。长征的关键是遵义会议，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实际上是毛主席在指挥，使得红军在最危难的时候有了对付敌人的正确的方针和办法。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

骂得很厉害。那时不像现在，有个什么行动要先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军事紧急，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人说要问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现在有同志问，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转移的时候是不是开了干部会，有哪些人参加？我记得，并没有开什么干部会，就是以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上写了一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就是中央的意见，然后就准备走。毛主席经常讲，没什么可说的，走就是了，哪里要说清楚才走呀。当然，长征一开始是跟我们说过，要去湘西。长征中有个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地区单独北上的事。那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南下，反对北上。为了坚持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危害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毛主席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如果没有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主席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那时我们只有八千多人出来，并不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贾拓夫在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作为代表到了中央苏区，他曾说过陕北有个刘志丹在那里打游击，部队还是用的团防的名义。我们走到甘肃，看到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告示，说什么“刘匪志丹”在活动等等。我们把告示给毛主席看，他很高兴，天天行军都把贾拓夫带着一路谈，向他了解陕北和刘志丹的情况。如果没有北上这一着，一、二、四方面军统统集中在藏民区的贫瘠地方，慢慢地就会被消灭了。因为那里既没有条件扩大军队，更没有条件搞生产，那是草原和不毛之地，敌人把几个山口一封，你就没有办法了。而且那时红军已经走了快一年，精疲力尽，好在大家还比较年轻。

第三，转战陕北。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情况，前面我已讲了一些。1947年3月蒋介石对我们发动重点进攻，一个山东、一个陕北，两翼进攻。毛主席这时很有决心，他无论如何不离开陕北，这就使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和群众有了主心骨。当时有人主张毛主席离开陕北，毛主席说中央是坨臭肉，走到哪里，那些绿头苍蝇就跟到哪里，也就是说，中央走到哪个区域，敌人就要集中兵力到哪个区域去。当时胡宗南等的军队大约是我们的十倍。陕北能坚持下来很不简单，毛主席有这样的决心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四，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光辉旗帜。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被关到1975年，确实确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始终认为他还是想挽救这个局面的。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地估价毛主席。毛主席在历史上是反‘左’的，后来他自己又‘左’得厉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小平同志在同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谈话中说的那一段话非常好，小平同志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讲了好多次话，他说，写这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

泽东思想。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一条是不能动摇的。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什么议论都有、有的要全盘否定毛主席，说毛主席一点可取的地方都没有。小平同志顶住了这些怪论，那是十分正确的。”

杨尚昆还说：“毛主席有许多事情、许多优点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比如毛主席提倡学习，不是说说而已，他买了很多书来读，还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有一次他外出的时候，李烛尘陪着他，他就跟李烛尘学化学，谈起硫酸是什么成分，他还能写出硫酸的分子式，当时我在旁边，看见毛主席记得很多的化学分子式。他拼命地读书，像二十四史，他至少通读了一遍，其中有些部分读了不止一遍。他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光讲开玩笑的话。比如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他就讲，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后来我看到笔记小说上有这样说的，毛主席大概也是从这种书里看来的。像这类的掌故，毛主席知道得很多。他谈这些掌故有什么道理呢？他对我说，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他一是求知欲强，特别爱学习；再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有的时候记起什么诗、什么词，让别人去查找，他能背出来，而巨说的出处也大致不错。国内有些有名的对联他一口气就能背下来，比如昆明大观楼那个一百八十个字的长对联，他就能背下来。《红楼梦》中的很多诗词，他也能背。

毛主席在生活上和平等待人的。他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有时教他们认字，甚至关心他们的恋爱问题，给他们出主意，连情书都帮他们写过。”

（苏扬整理）

脑子里总有毛泽东

李又然

从没见过心力这么集中的人

1938年元旦后一天，到延安，住第一招待所。在外面，被认为赤色分子，到家里，受最高的待遇，心中十分不安，更急于上前方；或者，先在延安工作一个时候再说。于是决定找毛主席。先去一封信，要求谈一次话。立即得到一封亲笔回信：“可以一谈”。时间要我和他的秘书李六如联系。去之前，两三个夜睡不着，竭力压缩见面时要谈的话，最后只剩十来句。

去信之前，已经听过毛主席一次讲话。以为是激昂慷慨的，却原来是个书生，非常文静，而且十分有风趣，时常插句笑话，使听的人更轻松。那是一次动员文化人去前方的讲话，末了一句说：“也不是谁都去，我就不去。”台下哄堂大笑。

更早，陕北公学举行一个纪念会，我站在门外一条长桌的前面，毛主席从屋里出来，见我站在那里，走到我面前，两手撑在长桌上，正要说话的时候，何思敬教授走来，远远就喊道：“毛主席，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是不是辩证法李又然，著名散文作家，曾任哈尔滨大学文艺学院院长。本文摘编自1982年《新文学史料》。的？”毛主席没有回答。“进去吧”，对我说，“吃饭去。”

在餐桌上，毛主席给大家斟酒，夹菜，分馒头；自己只吃一点点菜，只喝一点点酒。不是不能多喝，怕喝多了人会困倦，不能回去工作。——毛主席总工作到深夜。

最早，边区政府招待文化人，毛主席立在大门旁边迎接。周扬介绍：“这是李又然同志。”主席握手，如此亲切，所以决定找他去。

宴会将要开始的时候，聂绀弩提议：“请毛主席讲话！”主席缓缓站起来：“同志们请吧，没有什么好吃的！”说了坐下。——这样的时侯，主席如果非讲话不可，决不多讲一句话。

我进去的时候，主席坐在藤椅上，很庄严。看我有点紧张，立即从藤椅上缩下些，坐得低一些，露出笑容。我刚坐下，有位秘书同志进来说：“洛甫同志打电话来，请你去开会。”洛甫同志就是张闻天，当时的总书记。我立即站起，准备就走。可是主席却亲切地、缓缓他说：“和同志谈话，不去了！”“我这么重要么？”我心里说，“因为和同志谈话，连中央的会都不去开了？”就算只是普通的会吧，也是中央的会呀！我很感动，于是坐在主席身旁，说：“毛主席……”我刚开始，喊了一声，只是声音有点激动，可是主席，立即把全部心力集中起来，这时候好像只有坐在他身旁的一个我，听我讲话是唯一重要的事了。于是我兴奋他讲下去，本来不预备讲的话也讲了，本来不想讲的话也讲了，本来没有想到的话也讲了……倘若毛主席有一点点分心，或者向窗外看一下、听一下。我会立即停下来不再讲下去，但是主席始终全神贯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心力能一下子这么集中，又一直集中下去的人，这是惊人的！终于我发现已经足足讲了两个钟头了，于是说：“毛主席，我讲得太多了，该走了！”这时候，毛主席说：“你两个问题，一个上前方，一个工作。前方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还是先在延安工作吧。”于是我进了边区政府的文化协会，主席叫丁玲介绍的。后来“文抗”

成立，我就转入“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回到招待所，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感到舒畅极了。只是，总觉得太浪费主席的时间了，感到过意不去。

以后，与主席面对面单独长时间谈话还有五六次。

除了头一两次而外，每次去，不用到传达室说一下，传达室的同志老远就喊道：“请上来，请上来，在里头，在里头！”

严厉申斥官僚主义者

何思敬教授的儿子在保安养育儿院，因为奔跑，摔了一交，膝盖上有一点点跌破。孩子病了，保育院不照顾他。几个小同学，用门板抬他到几十里外的医院，半路上滑下来，摔在地下。医生看了一下，说：“没有什么，抬回去！”于是几十里地抬回来。保育院还是不照顾他！过几天，孩子夭折！小小的棺材都已运回延安，凄清地放在路旁，保育院告诉孩子夭折的信还没有到！何教授久久地低着头坐在一只矮凳上，写了一首诗，痛哭儿子的夭折。何师母呢？眼泪干了，只会“噙、噙”大声地干号，几乎疯了！我万分气愤，立即写信给毛主席。立即得到回信，要我先慰问何思敬教授夫妇，说他马上就会找他们。第二天，毛主席特地起早，找他们去，劝解他们，安慰他们，整整一天。刚好艾青在那里，说毛主席非常忧虑，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心上不断划着划着，走来走去，背越来越弓。我们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我们，我们没有治败血症的特效药。那做父亲的说：“打盐水针可以救急。”“呵！”毛主席的背立刻挺直，“盐我们有的是！”他们不想吃饭，毛主席劝他们为了更小的孩子，勉强吃一点。

第二天，毛主席把保育院院长和那个医生找来，严厉地申斥他们，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是官僚主义者，以孩子的生命为儿戏，随它夭折，是严重的罪犯。

那孩子叫伯仁。“‘我虽不杀伯仁’，”林老说，“‘伯仁由我而死’！”虽只引用一句古文，也可见我们的老一辈的革命家，把不是自己的责任也都引到自己身上来。

我们保护心脏，不使它受伤，永远健康，为什么？我们赞美好的，不得已而惩罚犯罪的，为什么？都是为了孩子——子孙后代。

主席总在关心人

陕甘宁边区开第一次文代会，一天，请王明讲话。他表扬鲁艺音乐系，把音乐系的教员一个个都提了，独独漏掉向隅，也是音乐系教员。刚好好多中央同志都在，音乐系的学员们也都在旁听。这是一个荣誉问题，提了不算什么，漏掉是耻辱。趁休息的机会，向隅跑到一个暗角落里，低头坐着，无地自容，也半死了！他的妻子唐咏梅紧跟在他背后，流着泪。好多同志也都跟过去围着他，想安慰他，但是能说什么呢？能说王明错吗？只能心里同情着。

第二天，请毛主席讲话。他一点也不知道头天发生这么一件事，但是当引用“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句成语之后，立即就问：“我们的向隅同志来了没有？”还离开讲桌，走到台沿，俯下身来，手搭凉棚，向全场前

后左右仔细寻找。大家齐声说：“来了！来了！”有人还大声高喊：“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主席这才宽慰地走向讲桌，继续讲下去。

主席思虑的问题是多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多的，他不可能总在念着某一个人。但是一到必要的时候，他立即想起即使还不熟悉的人来。当时毛主席还不熟悉向隅。这是一个优秀的救亡青年，并没有人向毛主席介绍过。主席只听报幕的女孩子说是向隅……听过他手风琴独奏，留下了印象。而因为一句成语，就立即想起他来，像一个老朋友，多年不见，总在心里念着似的。

这样，主席纠正了一个疏忽，医治了一对心受创伤的夫妻，使大家多么快乐啊！这是偶然的。但分析到最后，又是必然的。必然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像干燥的地面冒出水来，因为地下深处本来有水。主席记忆力特别强，联想力又特别丰富而迅速，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主席总在关心人！

谢老觉哉在一篇随笔中，偶然无意识地、完全无心地提起一点点生活难这样的意思，读的人都疏忽，因为只轻轻一笔带过，毛主席一发觉，立刻去照顾！

没有透露什么，一点也没有提起生活的呢？也深深关切。一天，写信来，说：“又然同志你身体不好，生活又苦，有什么事，我替你办……”我回信都没有写。怎样写呢？说毛主席，谢谢你么？这是普通的客套。说我要这要那？革命是给不是拿。但在心里，一直感动着感激着。真是难忘呀！

一位年轻战士，住在医院里，渴望死之前能见一次毛主席就好了。毛主席一知道，立即推开工作，骑马远远去看他，竭力安慰他，要他安心养伤，会好的。这位战士，是带着毛主席的安慰而死的。

“鸡不要杀”

有人讲课完全照他的文章讲，这文章早已发表，听讲的人也早已读过。那又何苦还要讲呢？众多听讲的人还不如去下棋、钓鱼、看闲书好呢！可能针对这讲法，一天，毛主席温和他说：“教书，讲义上写得多的少讲，写得少的多讲。”他自己讲话总恰到好处，该长就长，该短就短，该不讲的什么都不讲，该重复的重复，而每次重复，总有新的意境、新的讲法……不是简单的重复。在“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越讲越有神采。

有一次散会的时候，白朗提议：“请毛主席讲时事！”毛主席只简短他讲了几句：“鸡不要杀，会还是开，搬到山沟沟里也去开。这就是时事！”那时胡宗南要进攻边区，毛主席早已说过雷声大、雨点小。有的孩子的母亲养鸡下蛋喂孩子吃，这时却杀鸡，所以毛主席说：“鸡不要杀。”——敌人总不违反毛主席的心意：“一切行动听指挥”。

“要去鼓励鼓励！”

有人问主席，看过的戏为什么还去看。

“哪里这样喜欢看戏！同志们辛辛苦苦演出，要去鼓励鼓励！”

每有晚会，主席总先到，坐在木头上，吸着烟，沉思着什么。——毛主席总是在沉思的。

有一次，戏散了，人走完了，毛主席还留在那里。装汽灯的同志从梯子

上往下说：“同志请你把汽灯接一下！”一看是毛主席。他也许又因为思索着什么，忘记回去了；或者因为见还有同志留着，就也留着。

冼星海问：“毛主席，《黄河大合唱》怎样？”

“百听不厌！”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脑子里不管想什么总有毛主席！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太深了！

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

李思安

1918年4月17日，新民学会在周家台子蔡和森家里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张昆弟、萧子暲、罗学瓚、陈书农等13人。

我是第二批参加新民学会的，即1919年11月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开会那次。这次会议讨论了新民学会章程，选举何叔衡和我做正副执行委员长，毛泽东等为评议员。

新民学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许多革命活动，如五四运动时，新民学会请徐特立介绍巴黎和会。1919年11月，长沙发生赵女士自杀事件，毛泽东立即要我们调查，他还亲自写了好几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在当时长沙的报纸上发表，影响很大。我看了，就愈加不满我父亲对于母亲的虐待。

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湖南人民的痛恨和反对。毛泽东早在1919年春夏就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积极组织驱张运动，为使湖南驱张运动在全国造成声势，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决定派驱张代表团分途前往北京、上海等地活动，他亲赴北京。

出发之前，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较为隐蔽的小学（正在修建，可能是楚怡）开会，毛泽东亲自规定以“人格”为口号，与会者要李思安，新民学会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南总工会妇女部长。建国后曾任湖南文史馆员。本文摘编自《回忆驱张运动》一文。回答口号才准入会场。毛泽东之所以拟定以“人格”作口号，是因为1919年12月2日在教育坪烧日货时，张敬尧骂学生作“土匪”，伤了我们的“人格”，意思是激励大家到会，积极从事驱张运动。当时，驱张代表团思想不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人很坚决，主张立即罢课，直到张敬尧滚出湖南为止。也有少数人摇摆不定，怕误功课，不同意罢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鼓励大家满怀信心，勇敢战斗，不要中途而废。

我们1919年12月7日（可能是17，只记得有个“7”字）分途去武汉。毛泽东提议路上看到熟人不要打招呼，到汉口再集合，这样，免被张敬尧的走狗发觉。记得我和徐瑛在长沙上车，到霞岭（注：可能是霞泥）见到蒋竹如上车。出发之前，毛泽东就同既是长沙明德中学校长，又是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胡子静联系好了，我们到汉口就住明德大学。在汉口，毛泽东布置我们分途做宣传发动工作，动员旅鄂湖南学生同我们一道驱张，并串联湖北学生支持我们的驱张运动。这样做，不仅使湖南驱张运动声势浩大，而且也促进了湖北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在汉口大概停留十天左右，我们便一同上北京，记得是严寒天，我们在北京过春节，男生住在北大三院附近的马神庙，我们女生开始住在同学的亲戚家里，后也搬到马神庙。北京是五四运动策源地，学生觉悟都较高，他们对我们驱张代表团热烈欢迎并积极支持。到京之初，我们到新华门当时的徐世昌总统府请愿。我记得，大雪天，我们从一个安了很多电灯的大桥经过，来到总统府前，哨兵的枪都上了刺刀。我们一点也不怕，向他们讲述张敬尧的罪行，争取他们的同情。总统府不接见，我们一连去了好几天。路上，我们议论纷蓬，毛泽东也时而插两句中肯的话，时而讲两句诙谐的话。经过几天的斗争，内阁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才不得已答应公民、教职员、学生各派代表二人谈判。毛泽东是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是杨遇夫，我和柳敏为学生代表。记得杨遇夫声色俱厉，拍桌打椅质问秘书长：湖南学生离乡背井，来

这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凶，你们为什么不解决？秘书长被骂得哑口无言。直到 1951 年毛泽东接见我们时，还问我：“你还记得那次到新华门坐冷板凳吗？”

请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得靠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在毛泽东的布置下，我们在湖南会馆召开在京湖南学生大会，还把躲在北京的 13 个湖南议员拖到会场，要他们签名同意我们驱张。记得毛泽东当时身穿黄呢子大衣，揭露了张敬尧的罪恶，讲了湖南人民的痛苦，并表示坚决跟张敬尧斗争到底，直到张滚出湖南。彭璜接着发言，我第三个讲话，本要我讲张敬尧烧株洲的罪行，因我讲话不喜欢别人限制，要求不出题目。毛泽东说，那好吧，就随便讲。我上台发了一通议论，台下好多人还流了泪。1951 年毛泽东接见我时，还谈及此事：“你还记得那次在湖南会馆讲话时，慷慨激昂，义愤陈辞吗？”

在北京，我们举行了驱张示威游行，参加的人很多，队伍前列有许多揭露张敬尧罪行的大牌子，记得有“祸国害民的张敬尧”、“贩卖鸦片的张敬尧”等，还把在武汉车站拍摄的张敬尧贩卖鸦片的照片拿出示众，使张声名狼藉。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宣传驱张运动，以此大造舆论，使张敬尧在全国比狗屎还臭，真成了过街老鼠。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新民学会广泛的活动，湖南各界人民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1920 年 6 月张敬尧滚出湖南。

1935年以前的毛泽东

李维汉

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于是认识了毛泽东。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其实这种评价也并不确切。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次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决果敢，势不可当的气概。对于革命理论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学会初成立时，我们一班年轻人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认识上还很朦胧，很空泛。是毛泽东引导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共同方法的。我自己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我的入党介绍人便是蔡和森和毛泽东。

在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就依靠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勤工俭学运动、驱张运动以及省自治运动等，都取得一定的成绩。

对于学会会务，毛泽东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注重“打基李维汉，又名罗迈，新民学会会员。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文摘编自《回忆与研究》一书。础”，“不张扬”，“不标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他这种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埋头实干的好作风，对学会很有影响。在会员中形成了“言必及义”，不标榜不浮夸的好风气。后来，新民学会会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有许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

1922年底或1923年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央决定我到湖南去接替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将调至中央工作。

我在长沙自修大学找到毛泽东，他见我回来，十分高兴，要我先回乡省亲，春节后再交接工作。在交接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注意利用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二是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

毛泽东调中央工作以后，参加了“三大”。此后，还曾让袁达时带话给我，他认为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在会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有可能来湖南活动，要我注意。后来张并未来湘，湖南的产业工人也没有全体加入国民党。

1926年12月，毛泽东应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邀请，自汉口至长沙参加大会，工、农两个大会举行了欢迎会。

1927年1月，毛泽东到湖南农村视察，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前夕，也就是马日事变以后，农民武装的处境十分不利，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农民游击战争就已有一定的认识，他说农民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在当时只有他提出了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具体结合的远见卓识。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党的湖南省委，建立工农武装，领导湘赣边界

的秋收起义。天才的领导者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说服干部，率部上了井冈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应该将起义的部队带往井冈山，而应该在长沙坚持暴动，在长沙周围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说他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将他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事后证明这种指责是主观主义的，是没有道理的。

毛泽东到井冈山后，一直坚持农村的斗争。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李立三认为：“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时的需要的”，“游击战争的秘诀”就是：“逃、跑、走”，是“乘虚进攻敌人”。李强调现在的红军“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

1930年12月中旬，米夫来到中国，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于是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四中全会上我也受了批评，会后组织上批准我去苏联学习。

1932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当时，上海的临时中央已于同年一月迁到瑞金。4月我奉命到达苏区。这时党中央的书记是博古，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那时，我对毛泽东于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我在莫斯科学习时，也没有听王明等说过。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邬）、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2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军最早的战略战术。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

“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毛泽东在1931年、1932年被撤销了党的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后，只有一个实际上被架空了的政府主席的职务。1934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他也没有参加。毛泽东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犯了所谓“富农路线”的错误，但他服从党的决议。他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时，仍争取在党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如查田运动，他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等八县的区以上政府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等，这些都是根据中央局作的决定去做的。他到兴国作调查，写了长冈乡调查报告。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模范乡、模范村建设，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为中央苏区的巩固打下了基础。他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路线和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失败了，还是请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他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他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他写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那时，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各方面工作都是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周恩来说，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后来博古等没有让毛泽东出来再担负红军领导工作。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原则，所以取得了胜利。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后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转变了态度，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一直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负伤，不能行走，也只好坐担架。在长征路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交换意见。那时毛泽东不管事，管事的是博古、洛甫、恩来。蒋介石害怕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阻截，同时命令广西军阀配合堵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

情况下，如果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是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我认为长征改道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

长征改道后，部队就主动多了。1935年初，红军打败了沿途的贵州敌军，强渡乌江天险，1月7日占领了遵义。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自此以后，行军作战虽仍异常艰苦，但摆脱了被动局面，部队情绪一天天振奋起来。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我们党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把蒋介石集结的军队全部甩在了乌江以北。

红军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天才表现。当时谁能想得到四渡赤水后，过了金沙江，就把尾追的敌人甩掉了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发展到如此高峰的，毛泽东是第一人。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

何长工

何长工，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本文摘编自《在秋收起义的日子里》一文。

毛泽东同志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醴、浏、铜之间，在从安源去铜鼓途中，曾在浏阳县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军扣留。在押送县城的路上，毛泽东同志假装腿疼，落在后边，又给跟在身边的团防军一点钱，借机逃跑，隐蔽在一个水沟里，后来遇到一位农民，从谈话中知道他是农协会员，请他帮助买了一双草鞋和一点食物，并带路走到江西地界，于1927年9月10日到达铜鼓。

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在铜鼓起义。11日，在县城桥头沙洲上，毛泽东同志检阅了起义的部队，然后率领三团向白沙镇挺进。白沙镇三面高山环抱，中间是一片洼地，另一面是一人多深的茅草水坑地，靠山脚只有一条人行路，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就同敌遭遇。三团一连冒着弹雨，迅速地抢占了镇右侧的一个小山包。团部命令一连掩护二连，从镇的左翼迂回到敌人后面，包围敌人。随即，三团发起攻击，直插敌阵，一下冲垮敌人，乘势抢占白沙镇，毛泽东同志高兴他说：真是旗开得胜，马到功成。12日，三团直扑浏阳东门市，在离东门市不远的十二墩与敌相遇，便厮杀击溃敌人，毙敌排长1名，乘胜夺取东门市。由于我们一团在长寿街失利，右路失去配合。敌新八军两个团迅速向三团迂回过来。14日上午，敌人由东门市反动团总和地主带路，从东门过金钟桥，分两路包围三团：一路由唐家冲占领羊牯脑制高点；一路越过左河，走杨家湾插施家塘、上车，企图夺取马鞍山制高点，与羊牯脑相呼应，夹击我军。三团在正面受敌火力压制，侧翼又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全体官兵与敌人激战6小时之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最后从马鞍山脚下向上坪撤退。

在这紧急关头，9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上坪，召集一师三个团的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他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

文家市是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群众对我们很热情，9月19日我们一到立即开展群众工作，不少干部亲自提着白灰桶，到处刷写标语。下午，听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喊：“长工，你来。润之同志来了，他找你。”在里仁学校里，我向他作了汇报。他问得很详细，如官兵的思想动向怎么样；士兵都有哪些想法，战斗情绪如何，生病的多不多？等等。最后，他和我讲，今晚要召开前敌委员会，你和立三同志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晚上，毛泽东同志在部队宿营就绪之后，就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我由于做会务工作，对会议情况了解得比较具体。会议意义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是个“定向”的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转入低潮，起义部队遭到挫折，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要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才能保存我们的力量，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那么，到什么地方比较适宜呢？

毛泽东同志拿着一份从学校借来的晕瀚式地图，指着湘赣边界山形最宽的部分，用生动形象的譬喻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最适合作我们的落脚点，我们要到那里去当“山大王”。

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中段地势险要，崇山峻岭，峭壁林立，林丰树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离大城市较远，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而革命一举一动又可以影响到湘赣两省的南部，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井冈山地区，是积草屯粮，养兵集众，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

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了，这叫什么革命呢？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深刻的真理。我们卢德铭总指挥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和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之险。

经过工作，前委大多数同志都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却遭到师长余洒度的竭力反对。他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变化，看不到向农村转移的重要意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幻想在城市一举取得成功，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实质是军事冒险主义。对余洒度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据理力争。在卢德铭同志投了赞成票之后，大多数同志仰慕卢总指挥的才干和为人，纷纷举手赞同。他的支持，对向罗霄山脉进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会后，毛泽东同志由杨立三同志请到里仁学校新斋第二间房子里休息。睡觉的地方，仅有一张门板床。杨立三同志见毛委员脚趾溃烂，便问他是怎么溃烂的呢？他说，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杨立三同志十分受感动，并说：“我早就在报上看过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过去他们总说我们‘过火’，实在呕气得要命。您那篇报告，对我们湖南做农民运动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第二天清早，天气晴朗，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沐浴着一片金色的光辉。工农革命军 1500 多人集合在这里，以十分激动和急切的心情，等待着毛泽东同志的来临。

不一会儿，身穿老蓝布农民衣服，脚穿草鞋的毛委员在师团长的陪同下，满面笑容地走进了会场。

值班干部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并大声宣布：“现在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

毛泽东同志向大家挥手，亲切地说：“同志们，请坐下吧！”接着，他根据前敌委员会会议精神，向大家讲了话。他说，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再没有第二条活路。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因此，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还满怀信心地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现今我们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

最后，毛泽东同志就打长沙问题又做了说明，他指出：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的地方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到罗霄山脉中段去找一个好的落脚点。

毛委员的话通俗易懂，使大家在困难之中受到极大的鼓舞。记得后来我曾在江西《红色中华》上写文章说秋收起义我们打败了。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对我说：“长工，虽然我们打了几个败仗，但我们还有千把人，这就是革命的本钱，胜利的本钱。”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领导我们进行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从这以后，中国革命虽然又经过了千难万险才取得了胜利，但正是这次战略转移才奠定了使革命踏上坦途的基础。

1917年同毛泽东的交往

张昆弟

9月16日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遂止。晚饭后，三人同张昆弟，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本文摘自张昆弟日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亦然之。彭君以清夜之感，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9月23日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个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

十一点钟矣。

毛泽东在重庆

张治中

张治中，著名爱国将领，当时任国共谈判国民党方面代表。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本文摘编自《我与共产党》一书。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经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是。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因此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8月28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了我们四个人。

从这两个文件看，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政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师。……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达成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者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在10月8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

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致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谈，一共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心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谈商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需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政治要民主化，怎样才能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各党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样才能平等合作？……这些问题的研讨，始终在极度和谐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的方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

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四十大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最后我们大家举杯恭祝毛先生健康！

毛先生当时也有一篇简短的讲话（是记录稿，未经毛先生核定）：

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谢。尤其今晚承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

从191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三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战争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这种胜利把世界和中国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正在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

刚才张先生说，中国需要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我们也同样相信。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

10月11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先生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重复在重庆时的话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特别要提起1946年我第三次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出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

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里曾被 C . C . 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的；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未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延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

陈 云

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58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应该说，解放以后，也有帮倒忙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有盲目性，缺少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同志在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12月10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我们党大有希望。”

1981年3月，陈云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力群谈话时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这是第一点。

第二，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第三，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

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苏扬整理）

白纸铺桌露天设宴

陈嘉庚

下午四点钟，余与侯君乘车赴毛主席之约，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低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具，盖甚简单也。毛君形容相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据言多病，已两月未剪去，或系住洞内寒冷所致。余言“何不另建住屋，敌机如来可进洞内。”答“亦有此打算。”又言他办公事多在夜时，鸡鸣后始睡，故日间须下午乃起床。余云“何不改日工作，身体或可健康。”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余致慰劳毕。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少顷集美学生陈必达来亦如是。余乃知平等无阶级制度。近晚朱德陈绍禹夫妇亦到，诸人安然坐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诸男女学生相辞回去，唯陈必达留作伴。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中，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同席十余人，毛夫人亦参加。

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摘编自《南侨回忆录》一书。文中所述时间为1940年。

定王台约见二十八画生

罗章龙

罗章龙，新民学会会员。建国后任湖南大学等校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本文摘编自《椿园载记》一书。

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校址为南宋时辛弃疾练飞虎营遗址）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驻足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是日，适逢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同往。

定王台表里湖山，风物开廓可观。上午九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但见阅览者熙攘杂遝，人数众多。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气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乃其名字的笔画数。略谈数语后，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润之建议到院内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得院内，寂静无哗，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

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于新评价。

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我归后翌日，适一师同学彭道良来访，谈话中提到定王台事，彭乃询其详，我以实告。彭笑道：“昨日之事可称三奇会。”我问何故？彭云：“圣皋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时黄昆吾同学在侧，因问毛奇之名何自来？彭从容解说道：“我与二十八画生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男子要为天下奇（此乃宋王庭珪送胡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他本人近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后发表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毛奇（Molkt）系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著名将领，在普法战争中功绩卓著。）

后我又以彭所语往询同乡陈赞周（圣皋之弟，亦在一师肄业）。赞周道：“润之的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概。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我闻赞周语后，心益释然！

自定王台谈话后，每遇周末，我们两人经常约定到天心阁、城南书院、

长郡中学、韩公墓、板仓杨寓等处晤谈。或到郊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溁湾市、猴子石、东南渡等处远足游览。

一次，我与润之一起步行去韶山，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三、四十里路，甚为乏累，就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润之就与他一起攀谈家常，边谈边帮他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草鞋锤平。我见润之对打草鞋的工序很熟练，便问，你会打草鞋？他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

在长沙，我陪润之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面不入。”润之对他颇有兴趣，认为禹王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辛弃疾将军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我们都同去访问过。

毛泽东的话帮助了我

周扬

周扬，著名文艺理论家。1937年到延安后任边区教育厅厅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本文是他在1977年4月接受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采访时谈话的一部分。摘编自1979年《新文学史料》。

我参加文艺工作的时间很长，从三十年代，延安，一直到解放后，前后四十年，而且我和毛主席接触的时间很多。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有两条

我们谈鲁迅的功劳，一个是对社会的了解确实深刻，一个是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条是很厉害的。主席的伟大也是这两条，其他的许多革命家就不如他。主席、鲁迅，对社会、历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彻。因为这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教条主义者，像我们这些人和年轻的人吧，也许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比方说“创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读了很多书，王明这些人也读了些书，但是读了不能用，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主席和鲁迅对社会有丰富的了解，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大多社会、历史知识，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成教条。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思想背景

在江西时期，我们红军里面的文化工作比较少，到了延安以后才开始搞文化工作。当时有陕公（陕北公学）、抗大（抗日军政大学）这些学校，还有鲁艺，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协会。除了鲁艺的那些人以外，大部分的人也都是上海去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过去的左翼，或者是党员。当然也有很多北方去的。从上海去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在鲁艺。此外还有一个“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总会还在重庆。“文抗”有些作家，像丁玲、艾青、萧军、欧阳山……一大批。这样延安就开始有了文艺活动。有了文艺活动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思想了好久而没有什么准备，就是这些从上海来的，就是所谓亭子间来的吧、到延安以后，对朱（德）、毛（泽东）都充满了感情。搞文艺工作的人，这种感情更丰富。这些人尽管是左翼，尽管是共产党员，甚至还不是一天两天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这些人过去都信仰革命，同志中甚至有人牺牲了，现在他们活着到了延安，大家都很高兴。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不是搞文艺的，是学生，他们到延安一过边界，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热情得很。

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人怎么能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在上海是很抽象的。我们在上海，兵，是国民党的兵，根本不能接近；农民也很少。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也说要拥护红军，就是杀头都不怕；但是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是抽象的，也没有见过。到了延安，就发生了怎么跟工农兵，跟你所理想的，你所为之奋斗的，

甚至于不惜为之牺牲的这个对象相结合，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是理想，你不认识工是个什么样子，农是个什么样子，红军是个什么样子，干部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现实，怎么同工农兵结合。上海来的这些革命者都很热情，但是不认识对象。所以到延安去的那些女孩子对我们老干部有一个说法，就是“老干部可敬，不可爱”。格格不入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延安不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地区，从自然条件来讲，这个地区很落后；更重要的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工农兵当权的时代，这不是重庆，尽管条件没重庆好，没有那么多的出版物，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但这里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

所以，跟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结合，成了根本问题。后来不是美国请我去吗？由于蒋介石不发护照，我没有去，我到了上海。在上海有个老朋友问我，他说你在延安，经历延安的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讲点经验吧。我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一下子也讲不清楚。他又问我有什么心得。我想了一下，我说心得只有一条，就是在1942年整风运动以前，尽管我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经过整风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我说你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收获，这就是我唯一的收获。我当时讲过这句话，我现在还是这么感觉。如果还要补充一点的话，就是我首先还不能说自己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你要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这个背景主要的就是结合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存在，解放以后又一次发生，而且今后，也还有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根本也是这个问题，因为要同工农结合、跟时代结合不是很容易的。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所以后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现在延安在争论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毛主席对这个争论作了很深刻的解答说，他们尽管有争论，但在跟工农兵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这个说法是最深刻的。我几十年来跟毛主席接触，感到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人家怎么搞我，我对别的都不难过，就是毛主席对我的这个期望，我辜负了他，我没有很好的跟群众结合，没有到群众中去，都是高高在上。所有的缺点错误，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也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这一派，包括何其芳这些人，要歌颂光明。何其芳原来也是资产阶级的作家，搞一点唯美主义的东西，当然他要进步，热情洋溢。“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文革”时他们批判我，说我主张太阳中间也有黑点，我也主张暴露黑暗，反对毛主席。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是什么呢？是“文抗”他们要暴露黑暗，我为回答他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请你们不要在根据地找缺点，因为太阳中间也有黑点。后来别人就批评我说这是攻击

毛主席的（笑）。因为我不赞成萧军他们的观点，我才写了这篇文章。那是在整风以前。我的思想也没有改造，当然那篇文章不会很有力量，但是我是反对他们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延安有四个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有萧军、罗烽、锡金，还有……都是东北作家。

这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争论。虽然争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无论主张歌颂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还是如何同群众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这还加上演旧戏呀，演外国戏呀。毛主席就找了很多谈，首先找“文抗”的那些人谈，当然也找了“鲁艺”的人谈。谈了以后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就是同工农兵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宗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只有同群众结合，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主席在讲话之前确实找了很多谈，开座谈会的时候听了大家很多的发言，我也作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经过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文艺座谈会以后，精神就改变了。我头一个起来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写了文章。后来就搞秧歌运动。我又写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都经主席看过。主席对我确实是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批判我的时候引我的文章并不多，都是引我讲的话。

毛主席的话帮助了我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时，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有些苦闷。我想难道我做的工作都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吗？我想不通。我曾经想过，我既然管文化工作管了这么久，我既然是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那就算我罪有应得吧，谁叫我没有执行好呢？谁叫我在工作中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呢？现在人家说我反毛主席，那有什么办法。我既然有错误，讲重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过问题是，当时已经不是讲重一点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诽谤、陷害了！我的心里不是那么好受（笑）。我要说是好受，就是欺骗你了（笑）。主席过去在延安的时候跟我谈过一些话，是什么事情引起的，我记不得了。毛主席跟我讲的这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告诉我“不要有委曲的感觉”。他说：委曲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那你不要感到委曲嘛，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是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不认识，所以感到委曲。这是罪有应得嘛，你有什么委曲呢（笑）？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曲，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他这几句话是几十年前随便谈的，后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无非是这三种情况嘛，没有什么委曲。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至少要有这种精神。我觉得我对革命的贡献不大。一个人不管有怎么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他就要预料到在革命进程中会遭到挫折，他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他就不配谈革命。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受的种种迫害，我经常这样想，比起一些对革命更大的贡献的同志来，我所受的迫害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这是真心话。有些同志对革命的

贡献很大，他也受了迫害。这样一想，我就很平静。

与毛泽东对谈文史哲

周谷城

周谷城，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文摘编自1978年《回忆毛主席的教导》一文。

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对百家争鸣的倡导，以及他学识的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真理被接受要有一个过程

有一次，主席坐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的布棚下，把我召去。我刚到，主席就问我：“你能游泳吗？”

我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主席说：“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上游泳裤子，没有穿上身衣，一同下水。主席从深水一端下去，在水中游起来了。我从浅水一端下去，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

主席喊我说：“来呀”。

我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游罢上岸，我穿上衣服，主席只披了一件睡衣，又坐在布棚下，拿着一本大字本线装的历史书，挑出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我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主席的话，我的体会是希望我们坚持真理，投入百家争鸣。

甘居中游

在上海时，主席曾和我谈到洪承畴这个人。记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陈毅同志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主席，把我同陈望道先生召去作陪。晚上还在锦江小礼堂安排了文娱节目，内容好像是关于李自成的一段历史。便宴之后，陈毅同志陪同主席走在前面，接着便是我和陈望道先生，及其他一些人。进入小礼堂，见舞台前放着两张大沙发，主席却不去坐，而同我们一道，坐在中间一排小椅子上，并笑着说：

“我们就甘居中游。”

我随即补上一句说：“这里中游好，能看得清楚些。”意即离舞台稍远一点，看起来方便些。关于李自成的戏快开始了，我随便说了一句话：

“有人说，洪承畴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减少汉人的大遭屠杀。”

主席慢吞吞地，带着微笑说：

“有此一说，不可不信，但亦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简单，怕还要有些调查研究。”

主席的话虽然不多，但我体会，却是一个至当不能移易的科学论断。

不要害怕辩论

主席对我的教导，不仅在有关历史的方面。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方面的辩论。我因不满于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刚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告诉我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我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这件事主席老早就知道了。有一次他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之前，把我召去。我同各位打了招呼之后，主席手拿一本《新建设》杂志，对我说：

“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我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主席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我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主席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我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主席说：“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我说：“我没有看见。”

主席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后来果然有人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都是引了我的话的。因此我参加辩论的勇气也稍为大一点。那次和主席见面时，主席还一再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吃饭的时候到了。主席站起来很风趣他说：“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我于是坐在主席的右手旁边。席间我曾乘便向主席汇报一件旧事说：“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主席沉默了一会，说：“噯，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意思即很早的时候我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我听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后来《人民日报》上又有我的一篇文章，题目仍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主席见了很感兴趣。并用长途电话把我叫到北京中南海。电话是上海市委转达的，去北京的飞机票也是市委准备的。到了中南海，只讲得几句话，主席就把话题转到逻辑问题上，他说：

“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我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主席夹用英语很风趣他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我说：“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主席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觉得是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主席在逻辑辩论方面对我这样关怀、照顾、支持、鼓舞，但有两件事我

始终没有完成主席的指示，至今心里还很不安。一是主席曾对我说过：“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主席虽没有要我一定这样作，但毕竟对我这样讲了。我如果有积极的研究精神的话，应该努力实现主席的期望，然而没有做！二是主席曾对我说过：“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这件事本应由我同书局合作，但我从未积极活动过。后来北京出版方面有信来，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要出版了，目录也寄来了。我看目录，

只是几篇辩论文章，不是大部丛书。分量缩小了，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我不能决定，于是向主席写信请示。主席回信说：

“谷城兄：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读了毛主席来信，我又一次深为感动。主席对逻辑问题的争论不愿意发表意见，正是为了让大家继续开展争鸣。这说明主席对争鸣的支持，他考虑问题是多么周详啊！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

1961年五一节，主席来到了上海，我同上海各界，其中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人，在锦江饭店楼下进见了主席，我同主席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曹获秋同志也在座。这次谈话大家都很自然，无拘无束。主席曾详细地问到周信芳的年龄，又问到沈体兰的年龄。大家汇报的都是生活琐事，主席却非常爱听。这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我在家里已经睡了，忽接报馆记者的电话，要我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以欢迎主席。我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我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后来因推辞不了，勉强写了一首，题目叫“五一节进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主席见了这首词后，便打电话召我。5月3日下午3时，我到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坐在客厅里看报。我一人走进客厅，主席起来第一句话即说：

“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我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主席说：“总怕不止一首。”意思就是说我也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我随即转述我对记者说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主席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意思即也不那么内行，完全是

谦虚之意。

我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主席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我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主席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谈至此，我又向主席转述别人的意见，专讲字义。说：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主席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我于是进一步解除顾虑，以说笑话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说：

“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我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根据，但主席仍微笑着，没有说我荒唐。我更进一步笑着说：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主席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我又笑着说：

“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已是六点钟了，我同主席的谈话还没有完。后来转而谈政治。我偶然提及了邓演达先生，主席随即问我：“你认识邓？”我说：“我认识。”主席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谈至此，主席同我在一个小桌子上吃晚饭。饭后，我即告辞回家，主席一直把我送到汽车上。

吟李商隐七言诗

到1965年，我又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的别墅里见了主席。我一进门，主席即起而笑着说：“又碰到了”。“又碰到了”这几个字，是主席每次见到我的时候第一句常用的话。这次在座的，有陈丕显同志。我同主席握手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谈话的范围真够广了。谈到哲学史，主席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我说：“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主席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主席学问渊博，对古今中外文、史、哲等都有兴趣。关于旧体诗，我们谈到了李商隐；我当即忘乎所以，随便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调哼起来，曰：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把五六两句哼了几遍，七八两句居然哼不出来。主席知我已忘记了，他便笑着，自己代我念出，曰：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主席念出时，我又跟着他的后面哼。一时心情舒畅，超出寻常。万万料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这一次后，除了听过主席一次讲话录音外，再没有机会亲聆他的教益了！

毛泽东的伟大所在 周恩来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

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更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 1947 年 12 月 25 日的报告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

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像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像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

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苏扬整理）

对毛泽东的了解

贺子珍

贺子珍，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1984年在上海去世。本文摘编自《贺子珍的路》一书。

1927年，井冈山上，“我躺在茅草堆里，发起热来，难受极了，但比起发冷来，还算是好过的。我们上山，都没有带被子，虽说这时是八九月天气，但高山上的夜半，仍然是寒气逼人。我控制不住地全身发抖，上下牙齿碰得格格响。这时真想有一条大棉被盖在身上才好啊！可是哪里来的大棉被呢？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给儿子带了一条小薄被，看我冷得难受，就盖到我身上，让儿子冻着。这么一条又小又薄的被子，也驱散不了打心里发出来的寒冷啊！”

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率领队伍到了宁冈的砦市。经过和袁文才、王佐的两次谈判，毛泽东被请上了井冈山。

“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王佐不幸牺牲。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两条心。袁文才很听毛泽东的话，他公开对很多人说过：‘我就听毛委员的’。”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主要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散漫作风。特别是在大革命以前，他们还没有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确实都是绿林好汉。因此，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较多的不讲原则、只重个人义气的侠客思想，这都是需要进行教育和帮助的。”

“从我上山后的观察，即使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里，也是有一定的纪律的。特别是袁文才，对自己的队伍管得比较严。他们不抢（老百姓）、不嫖、不赌、不调戏女人，队员不许随便下山。正因为他们队伍的纪律比较好，才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跟。”

“事实上，当时不仅是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有农民意识，即使是红一团，它相当的一部分成员，也是农民，同样存在着多种错误思想。当然，他们直接在毛委员的领导下，受教育的时间长一点，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有程度不同的区别。我想，毛泽东正是看到这两支队伍要革命是本质的一面，才对他们加以肯定，同时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帮助。”

二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在塘边村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写了《永新调查》，这个报告后来丢失了。“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和毛泽东初期的共同生活是幸福的。“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

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 and 妹妹相逢了。他们在永新右派政变时逃到了吉安的清源山，父母亲当了斋工，掩护妹妹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红军打开吉安后，妹妹安排在特委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亲还未参加革命工作，仍住在清源山，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呆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为了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清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稿，我再替他抄一遍。”

“毛泽东写诗和写文章不同。他写诗比较快，改动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写诗是有感而发，脑子里早已酝酿成熟了，才提起笔来。另外，诗是抒发感情的东西，怎么表达关系不大。文件就不同了，是要指导工作的，表达得不准确，就要出毛病，在打仗时那是要死人的。所以，他写文件、起草讲话稿，特别慎重，总是改来改去。”

“他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读给别人听。写出一部分，就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时还特地把老乡请来，念给他们听，问大家这样写对不对？好不好？能不能听懂，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吧，他的文章除了见解深刻、文采飞逸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通俗易懂，口语化。”

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

“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经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

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

“毛泽东是一个很遵守党的纪律的人。他同前委领导干部之间意见的分歧，从来不同我讲。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他同朱德、

陈毅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我从没看到过他们吵架，只见他们经常来来往往，互相关心，联系挺密切的。我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前委重要的会议记录也归我保管。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翻看了一次会议记录，才知道他们之间原来意见很不一致。

“毛泽东对‘左’倾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他常常爱讲这样的意思：一个人穷极了，饿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可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毛泽东也很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王明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并取得了统治地位。1931年10月，在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宁都会议上，又撤销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职务。“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人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1934年1月，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苏区。李德生得很高大，他开会发言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毛泽东从来没有跟李德单独谈过话，只是在一起开会时有过接触。毛泽东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毛泽东想扭转这股潮流的斗争就更加艰苦了。”

“我没有学过军事，也不会打仗，只是常听毛泽东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指挥打仗，都是认准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长征中，红军经过艰难困苦，强渡乌江，攻下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现在，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开的。”

“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要重新由毛泽东领导军队，这是要出席会议的二十多个同志举手表决的。毛泽东如果争取不到多数，就不可能实行这个转折。他是在最受打击，最受孤立的情况下从少数变为多数的。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他，了解王明路线的错误，他在长征上路以后，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人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在长征初期，人们仍然不同他说话，而他却打破沉默，主动去找同志们谈话。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抓紧时间，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同志一个个地谈话，反复阐述他的意见：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拚，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毛泽东先后做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他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和其他军委、中委的同志谈，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这些同志对毛泽东比较了解，也同意他的观点，谈一谈是为了更多地增进了解。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具体怎样同这些同志谈的，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连队，行军时不在一起，有时宿营了，我去看他，他不在，同志们告诉我，他去找什么人谈话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毛泽东过去也很会做人的工作，一些同志对‘左’倾路线认识不清，盲目跟着走，他为了说服、教育他们，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时，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军团，传达关于攻打南昌、长沙的盲动主义计划。结果，毛泽东用几天的时间说服他，使这位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人，变成反对这条路线的坚定分子。但是，毛泽东也有性情急躁、作风生硬的时候，这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同志间的关系和同志间的相互谅解。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我们党就要垮台，红军也要垮台。他变得更耐心了，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终于争取到多数，扭转了形势。后来，毛泽东曾经感叹地说过：‘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团结大多数人了。”

“离开遵义以后，在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我为了帮助伤员隐蔽，躲过敌机的扫射，负了重伤。连里想了一个稳妥的办法，要我住在一个老乡家，便于养伤。毛泽东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于是，就这样上路了。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但后来，夫妻生活出现了裂痕。为了更多地学习，为了把残留在身上的弹片取出，我到了苏联，历经艰难困苦。谈到这一段历史，感慨尤多：“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

毛泽东在城南庄

聂荣臻

194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了阜平城南庄。

来之前，我们接到晋绥军区发来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决定同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来，要我们派人到五台去接。

大家都知道，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全局出发是不愿离开陕北的。许多同志的劝说都没有用，他不愿在敌人重兵压境之际，离开同甘共苦的陕北人民。同时，他表示，他与党中央留在陕北，就可以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以减轻敌人对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此后，他就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带着一个小小的指挥机关，继续转战在陕北地区，而且，有意使蒋介石知道，他同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彭德怀同志率领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斗，连续大量歼灭敌人。直到陕北局面好转之后，毛泽东同志这才从容地离开了陕北。

看了这份电报，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到来，对我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大加强。这对我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本文摘编自《聂荣臻回忆录》一书。兴奋的心情下，我立即派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到五台去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临行前，我找周荣鑫同志谈了话，交代了路上注意的事项，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住房是很简单的。当时军区新盖了三栋房子，我和作战科住在村西新盖的那个小院里。我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比较大一点，最靠南，是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北面紧挨着作战科。这在军区机关来说，算是最好的房子了。我把那两间房子腾出来，准备让毛泽东同志来住，我搬进了作战科的那栋房子，作战科搬出了小院。

毛泽东同志来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上山的。听说，中途遇雪返回，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我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同志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来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同志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

4月11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志的车队。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我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我们希望他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同志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同志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不过这次谈话的内容，有许多已经记不得了，有些则至今记忆犹新。看来，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有颇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过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我们的谈话内容，就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回顾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我们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是接受了这个历史教训的。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没有出现那种对立情况。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走，自由得很，安全得很。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欢迎我们，工作起来，非常方便。

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晋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土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搞。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在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

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我上面的意见，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除了谈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还谈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我军打到蒋管区的

时候，以及建国初期，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后再进行土改。

谈罢土地改革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同志毫无倦意，他还要我搞一点酒来。

我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同毛泽东同志继续畅谈。

我陪着毛泽东同志，边饮边谈。从土地改革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同志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我们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村里已经是鸡鸣报晓了。

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同志来见毛泽东同志，提出过长江有困难。我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经向毛泽东同志建议，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 this 建议。

在这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我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的意见，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不去苏联了。他搬到西柏坡之后，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了一趟。

在城南庄，毛泽东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仍然日理万机，工作精神十分感人，这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我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蒋管区或国外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准确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在1948年5月初。

多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出去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新闻广播，然后才去吃早饭。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同志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同志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

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五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反复地思考，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了消息。但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还知道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所以，我怀疑内部有奸细。

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应该让他离开城南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什么地方安个呢？我想起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军区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子花山。花山在城南庄以北不远，很隐蔽，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宜的。

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表示同意。这样，毛泽东同志搬到花山去住了几天，就转到了西柏坡。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同志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我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企图毒害我们。但他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之后，我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同志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

了毛泽东同志的安全。

这个案子查清楚了。敌机轰炸城南庄，是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的情报。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同志主持，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死刑。案件报到我这里，我看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就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

在重庆保卫毛泽东

钱之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因为他的主力退缩在西南，当时要接收大片沦陷区夺取胜利果实，这需要时间；但又迫于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强大的舆论的压力，于是采纳了政学系官僚、当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的建议，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为了和平建国的大计，毛主席和党中央抱着真诚的愿望，作了英明的决策：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代表我党，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尽管我们估计到蒋介石在玩弄假和平的花招，借以欺骗国内外舆论，但我们仍准备认真谈判。谁真要和平，谁破坏和平，人民群众是会看清楚的。毛主席到重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震动中外的大事，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都感到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到达重庆之前，周恩来同志便做了细致的安排。他从延安打电报给我，要我把办事处二楼东部的房子腾出来，作为毛主席及其随员的住房和办公之用，并要我们为毛主席准备好衣服、鞋子等；对生活上的细节，也都考虑得很周到，并指定刘昂同志留在二楼照顾，李泽纯同志专为毛主席做饭。

1945年8月钱之光，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处长。建国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顾问。本文摘自1984年《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一文。28日下午三点多钟，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这天一清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刘少文、王炳南、徐冰、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和我共几十人就到机场迎候。到机场去迎接的民主人士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等多人；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还有邵力子、雷震等；驻重庆的各国新闻记者也都几乎全部出动了。

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后，便乘车到上清寺张治中官邸“桂园”稍事休息，然后就来到红岩办事处，受到南方局、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的同志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对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并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晚，毛主席参加了蒋介石在山洞的公馆“林园”举行的宴会，并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30日回到红岩。原来计划把张治中的寓所“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同志居住，后来考虑到在那里有许多不便，就把那里只作为办公和接见中外来宾之用，住还是在红岩办事处。此外，解特生先生的“特园”也给毛主席备用。

当时对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是一件头等大事。毛主席到达前，我和刘少文同志就对全体人员作了动员，务必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到渝后，我即向由延安派来做保卫工作的陈龙和龙飞虎、蒋泽民、颜太隆、贺青华、舒光才、齐吉树等同志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并一起商量的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我们决定设置三层岗哨：外层是流动哨，设在黄果树附近；第二层是大门门卫；第三层是住房门口，实行通宵值班。流动哨和房门口值班由办事处于部轮流担任。当时大门和后门的警卫有五个人，陈龙同志经常查岗。

因为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所以我和国民党双方在保卫工作上有个分工：内部由我们负责，外部由他们负责。所谓内部，在红岩，是指离办事处大门约二十米距离的黄果树以内；在“桂园”，是指院围墙以内。这些区域以外，安全就由他们负责。毛主席出门，我们就通知国民党警备司令

部，由他们负责沿途的保卫工作。在“桂园”，我们派了几个同志，由朱友学负责警卫安全；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为毛主席做饭。国民党在“桂园”也派驻宪兵保卫。他们对所有来客进行登记和监视，并不断调换负责人，每天还要向上司作报告。我们建议他们取消这些手续，他们说不这样做不好交代。

9月1日，毛主席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这一天宾客很多，在重庆的各界知名人士和不少文艺界人士、国民党党政军要人都来了，许多来宾都向毛主席敬酒。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但许多群众纷纷聚集在门口和路边，等着瞻仰毛主席的风采。后来人越聚越多，挤得水泄不通。毛主席出门后，人群中的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这种场面，充分反映了大后方广大群众对我们党的强大的向心力。

毛主席在重庆四十多天，同蒋介石直接会谈六次，还广泛地会见了各方面的人士，其中有国民党当权的左、中、右派，还有大批民主党派著名人物以及工商、文化、妇女等各界人士。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则是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就和平建国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各党派合法地位、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9月15日，毛主席在“特园”同张澜先生作长时间会谈，告诉他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问题已大致获得协议；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当前的症结在于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并说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正在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先生说，应当把两党已经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你们不便提，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出来。毛主席赞同他这个建议。

谈判进行到10月上旬，大体达成了协议。当时我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粉碎了阎锡山的进攻，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的气焰，这也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这个协议的签订，是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这期间，毛主席还接待了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接见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和各国友好人士。9月16日还在办事处会见了三个美国士兵：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德华·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毛主席倾听他们所谈的各种问题，向他们说明我党对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还同他们共进晚餐和一起照了像。

毛主席在重庆，尽管每天考虑的是关系中国命运和亿万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与各方面的接触和社交活动都很多，但他始终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好整以暇、从容不迫的风度。记得10月2日，柳亚子先生应约到红岩来见毛主席，谈话中柳先生请毛主席题赠《七律·长征》，毛主席答应写《沁园春·咏雪》相赠。那一天画家尹瘦石同来，表示愿意为毛主席画像，毛主席答应了，说另约时间。10月5日下午，周恩来、张友渔同志陪同尹瘦石来红岩村，由我把尹先生引进一间客厅。一会儿毛主席微笑走来，寒暄了几句之后，主席坐在一张藤椅上，尹先生便开始作画。毛主席神态安详地静坐着。过了十几分钟便画好了。毛主席问我画得像不像？我说画得很好。毛主席同尹先生紧紧地握手致谢，并留他吃饭，尹先生辞谢了。10月25日，柳亚子先生和尹先生举行诗画联合展出，《新华日报》辟专栏进行宣传，刊头上是毛主席亲

笔题的“柳诗尹画联展特刊”几个字。

10月8日双方会谈纪要定稿的那一天，张治中先生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饭后我们正在看文艺表演，《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一个同志进来向周恩来同志报告。周恩来同志立即站起来，随即把我叫出去。原来是李少石同志当天下午陪柳亚子先生回寓所时在返回办事处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了。司机把李少石同志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后，就到《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周恩来同志要我马上到医院去看望，同时也把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找来，要他查明情况，缉拿凶手，并要张镇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当时因为真相不明，大家作过种种猜测，都同毛主席的安全联系起来；外面也有不少传说。随后周恩来同志来到医院，我也在场。为了慎重起见，我还参加了尸体解剖化验，取出弹片多块。事后经调查，这次枪击事件是由于李少石同志所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路上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国民党的一个排长见车未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同志的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因此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为了这件事，《新华日报》发表了澄清事实的声明；与此同时，我们还慰问了国民党士兵，并承担了他的医药费用。这充分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办事情是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

10月11日上午九时半，毛泽东同志由张治中、王若飞和我护送，飞返延安。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毛主席在登机前向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飞机在下午一点多钟到达延安，我于次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

徐向前

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与林彪、江青是有区别的。

自从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邪风以来，他虽然没有反对“炮轰”，但也没有赞成打倒。1967年“八一”招待会，他同意总理的意见，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出席。1968年3月27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里，他没有涉及“二月逆流”问题。闭幕式的讲话中，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他过去不大了解，现在才比较了解，实际上认可了会议的所谓“揭发批判”。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一伙疯狂陷害“二月逆流”的同志，企图进而剥夺我们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宣告破产。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决不死心。全会结束后，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提出传达时应点“二月逆流”几个人的名。后来的会议简报里，还点了黄杰（徐帅夫人）、张瑞本文摘自《历史的回顾》一书。华（聂帅夫人）二同志的名，诬陷她俩是“叛徒”，要组织专案审查。黄永胜在总参亲自布置，让下面批判我们几个人，包括黄杰和张瑞华在内。我的办公室党支部正式写了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将报告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主席亲笔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无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所谓“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显然是对我进行露骨威胁，与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根本不符。林彪一伙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仍坚持塞进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毛主席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根本不听，千方百计封锁和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在“九大”又掀起围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十一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

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

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十二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

和毛泽东在延安的接触

徐懋庸

我是主要为了弄清 1936 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论争，到延安去的。

大约在 1938 年 3 月中旬之末，由于何思敬、萧军等人也到了延安，原来从延安带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到山西去的丁玲等也回来了。有一天晚上，由毛主席以及康生、张闻天、张国焘出面，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但比我一月间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见到的朱总司令滯洒得多。这一次他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焘作的，他提到了我翻译的《斯大林传》，夸奖了几句。然后让我们被邀请的人发言，大家谦让，推来推去，要我先讲，我就讲了几句。

后来，当时的党报《新中华报》的负责人向仲华来看我，约我为报纸写文章。我当时正读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受到一点儿启发，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利用。过了两三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请我去参加，吃饭时恰好坐在毛主席的旁边，他对我说：“我看到徐懋庸，文学翻译家。建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写于 1972 年，摘编自 1981 年《新文学史料》。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大约是 4 月下旬或 5 月上旬，有一天我在城里闲逛，走到北门里的一个广场边，看到毛主席在对一个队伍讲话。原来以苏振华为大队长、胡耀邦为政委的“抗大”一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了。我就站下来旁听，听见他这样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是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背包袱”这句话。我当时听了他的讲话，觉得又新鲜，又觉得有什么地方很熟悉。回去仔细想想，才明白新鲜的是内容，熟悉的是与鲁迅讲话一样的深入浅出而多风趣（现在想来，主要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精神）。不过鲁迅讲演时，很沉静，不做手势，也不笑；他则姿势很生动，自己也笑。我曾经很喜欢鲁迅的绍兴腔，我同他个别交谈时，都用绍兴话，觉得很亲切。至于毛主席的一口道地的湖南话，我听起来却觉得特别的铿锵。我现在还觉得，一个人的讲话，只要内容好，而且出于真情实感，符合其人品的，实在是用他本人最熟习的语言说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文艺界抗敌协会”隔壁就是延安的大礼堂，名曰大礼堂，其实很简陋，也不大，只容得三、四百人，然而经常在这里开大会，而且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在这里，我也多次见到毛主席。

群众大会是在南门外的沙滩上开的。1938 年 5 月以前，我曾参加过两个大会。一个是公审汉奸吉思恭的大会；一个是处理“抗大”的一个队长黄克功的大会。后一个会使我特别感动。黄克功是原红军的一个团长，是个优秀

的干部。他在“抗大”工作时。同一个从蒋管区来的青年女学生刘茜恋爱，但他那朴素爽直的工农干部作风，不合刘茜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所以刘茜后来不爱他了，同一个知识分子恋爱起来。黄克功一气之下，用手枪把刘茜打死了。党中央认为这事非常严重，决定开群众大会批判，处他死刑。在大会上，黄克功诚恳认罪，甘心服法，毫无怨言。群众中许多人发言，主张免他死刑，让他戴罪立功。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主席团根据群众要求，向党中央请求改判，但是党中央答复，还是要处死刑，说黄克功虽然确是一个优秀干部，过去有功，但这件事政治影响太坏了。最后，黄还是被枪毙了。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我听毛主席谈起此事，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那时，我通过以上种种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对延安的一切非常满意，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启发。我观察在延安的那些上海的熟人，绝大部分在精神面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至少都是很愉快的。在党中央的人物中，只有张国焘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住在“西北旅社”的时候，他几乎天天醉醺醺的，带着四个警卫员招摇过市，来同何恩敬下围棋。延安的人，尤其是高级干部，一般都是工作很紧张的，谁像他那样闲散无聊。

到了5月中旬之末，我觉得应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谈谈上海的问题。第二天就得复，说愿意同我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可惜这封信在1942年日寇对太行山进行五月“大扫荡”时，连同装其他东西的一口箱子被从埋藏的地方挖走了。）又过了一天，他的两个秘书，和培元和华民来找我，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然后大约是5月23日左右，下午三点钟，华民来把我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谈话。

毛主席刚刚午睡起来，窑洞里还是比较凉的，他披了一件旧棉袄，让我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他让我吸烟，我说不会吸，他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

我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我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论争，我给鲁迅的那封信，鲁迅的那篇驳斥我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当我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他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非常注意这一点。我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他笑了一下说：“哦！”

我向来有个不好的脾气，至今也还是改不了，我同别人谈话的态度，尤其对于领导人，总是以对方的态度为转移的。如果觉得对方的态度马虎和生硬，我说话就不自然。反之，对方使我感到很自然的时候，我就毫无拘束。在上海时，有人说，见了鲁迅，自己觉得受到一种压力，说话不能畅快。我对鲁迅，却没有过这种感觉。这回对于毛主席这样一个人，因为已经有好几次看到过他的平易近人的态度，这回谈的问题虽然在我说来比较严重，但又看到他十分认真的听我的话，所以也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拘谨。

他听完以后，就给我作了如下的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我听这个指示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把每字每句抓得很紧，不但一个字没有放过，（现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当然不是原话的全部，原话还要多，大概讲了一刻钟。但主要的话就是这样。）而且盯住他的严肃而慈祥的眼神，越听越入神，觉得每一句话都解开我心里的一個疙瘩，听完之后，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了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同时非常兴奋。

说完之后，他问：“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这时，我倒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今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感激，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接着，他问我：“你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他说：“那末，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我说：“我不想去。”他说：“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我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儿，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于是他说：“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末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教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我说：“我是要到陕北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他说：“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北公学。就这样好么？”我于是同意了。他立即打电话给“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了这件事。

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开了大会，会后聚餐，我和毛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主席问我：“你结婚

了没有？”我说：“已经结婚，还有了儿女呢。”他说：“你爱人现在在哪里？”我说在浙江黄岩。毛主席说：“哦，牛郎织女嘛！那末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我说太不容易了。于是毛主席就对滕参谋长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滕参谋长对我说：

“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过了两天，我还没有把信写起来，滕参谋长就派通讯员到我这里来要了。就这样，到10月间，刘蕴文带了执提、执模和刘仁德就到了延安。

大概在9月间，毛主席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军们（萧克是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回延安的）。文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和我。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他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是闹笑话。譬如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在这个座谈会上，有时他也随便讲一些话。1960年，他的诗词公开发表以后，我曾写了一首《临江仙》：

踏破岷山千载雪，红旗飞越冰峰，大同境界蕴胸中，诗情和战略，马背正交融。

记得延安窑洞里，谈笑满座生风。漫夸韩范是英雄，纵能寒敌胆，曾不识工农。

这未了的三句，就是他一次讲话的意思。当时延安城还没有被敌机炸毁，大街上的牌楼上，还挂着写有“韩（琦）范（仲淹）旧治”四个大字的匾额。

10月间，我到“抗大”三大队担任政治主任教员的工作去了。三大队在北门外，离城较远，就不再参加这个座谈会了，因为这个会总是晚上开的。

后来，毛主席用他的《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吃了一顿饭，并组织了一个延安哲学研究会。日机炸延安后，许多机关搬出城去，中央组织部搬到北门外去了。于是哲学座谈会就在中央组织部开，时间改在下午，会后由组织部请吃晚饭。毛主席仍然去听，我也去的。听了几次之后，因为工作忙了起来，也就不再去听了。

1938年底和1939年初，“抗大”进行工作大检查，接着又是开荒运动；1939年3月间，我又随着三大队去瓦窑堡，7月又随“抗大”总校去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这样就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44年我回延安以后，10月30日那天，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次我坐在头排，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的机会。

在毛泽东身边的见闻

郭化若

立即松绑

郭化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本文摘编自1978年《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一文。

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路上。

我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在一个长亭上停下脚步。由于队伍行进中在这里交叉，人很拥挤。我站了一会，突然听到后面有人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一声“毛主席！”回头一看，原来毛主席来到了。喊声发自一个被捆绑的红军干部。我认出是不久前才被委任为第八军团军团长的周子昆同志。

“你是周子昆同志！怎么搞的？”毛主席问。

“因为队伍垮了，受到审查。”

“解开！解开！”毛主席又说。保卫队人员马上松了绑。我心里非常感动和高兴。老战友得救了。毛主席又有了指挥权。

周子昆同志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成立了新的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升级的方式扩大红军，军队没有骨干。我坚持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受到敌人侧击。新兵不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四道封锁线，全军团剩不到几个人，我也就被捕受审了。幸好还没有……还能见到主席。”这段自述，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事例之一。

毛主席稍微皱皱眉头，似乎不是不满这位被绑的人，而是不满这位被绑人的被绑。

“跟我们走！适当时候给你分配工作。”亲切有力的声音震荡在碧空中。这难得碰见的感动人心的画面，一直牢印在我的脑海里。

偶然的事物，从来不能不是在必然的基础上发生。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根据当时在长征中的具体情况，首先纠正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瓦窑堡会议是长征后遵义会议的继续，主要在政治路线上改正了王明的错误。随着又坚决纠正了王明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陆续为被王明路线残酷打击的许多同志取消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分配了工作。是毛主席倡导了我党有错必纠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冷饭菜就热米汤

遵义会议后，有一段时间，行军时，毛主席总是和干部团一起走。

当时敌人飞机不大来了，我们白天行军。毛主席每天夜晚要研究敌情、地形和道路情况，计划第二天行军以及尔后的行动，睡得很晚。早上，规定让部队先走，留下干部团当后卫，等干部团出发前才叫醒毛主席。

干部团团团长陈赓同志，每次都叫我去请毛主席。

第一次我去请毛主席时，毛主席住在一条小街上。我进去一看，厅堂地面上放着几扇门板，上面铺些禾草，毛主席睡的是个睡五、六个人的大通铺。

连我也出乎意外，难道不能在里面搭个高铺？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规定公务员、警卫员一到宿营地，要首先为他准备好办公的地方，等办公桌凳找好后，已经找不到床板了。于是毛主席只好挤在警卫班同志的铺上睡。

公务员喊醒了主席。当主席掀开白布套的薄棉被坐起来时，我才看到，他原来是穿着棉衣棉裤睡的。大概只睡了两三个钟头，至多四、五个钟头。

毛主席很快起来，用凉水漱漱口（当时大家都不用牙刷刷牙，大多是早就没有牙刷了），用冷水洗一洗脸（有时急于走路就不洗了）。我们准备等他吃了早饭后再走。可是他说：“不，先走一段路，休息再吃饭。”

一走就是二十里，大约不到两小时，才停下来休息。在田坎上坐下，公务员打开饭盒子。里面一层是饭，一层是当天部队开饭时吃的菜，大约不到小半碗。另外还有一点炒辣椒，这是公务员千方百计弄到的。

由于饭菜全是冷的，我们建议到附近老百姓家里要一碗热米汤来给主席喝。公务员接受了建议，这一计划实现了。主席吃两口冷饭，喝一口热米汤……

一连几天，大多数时间这个计划没能实现，因为休息的地点，路边没有老百姓，要不到热米汤。于是我们同公务员商量，早晨为主席留一大壶热开水，让他出发前能喝一杯热水。

长征是艰苦卓越的斗争，而在这艰苦斗争中有些人负担着人们想象不到的更艰苦的工作，有些人过着人们难以想象的更艰苦的生活。

尊重别人

西安事变后，毛主席进了延安城，住在延安城内的一所石窑洞里。

当时，延安城破旧不堪，不但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连一座整洁的好房屋也难得。然而从全国四面八方不远千里而来访问毛主席的名流学者却络绎不绝。

凡是来访者，毛主席都接见。时间多安排在夜间，大多是从夜晚十时左右开始，谈三、四个小时，有的则谈到凌晨三时至四时，客人还舍不得告别，毛主席也畅谈不倦。

我没有参加招待工作，但常常听到被接见的各方面人士的反映。他们政治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和毛主席谈话后，却异口同声地称颂不已，一致钦佩。当时毛主席虽已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红军毕竟还弱小，根据地也很小，共产党的影响并未完全普及全国。我们全军上下对毛主席的信赖和钦佩是早已确定了，并早已深信在毛主席领导下定能战胜国内外敌人，这是不待说的。但对外来的名流学者，他们怎么在一谈之后就那么佩服主席呢？主要原因在哪里呢？我和秘书处的同志们谈论起来，总觉得是个奇迹。

有一天夜晚，我去看望主席，汇报了最近来访者的反映之后，冒昧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毛主席回答说：“尊重别人。”他着重讲“尊重”两字，并解释了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毛主席和来访的名流学者，都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战争的方针和办法，不过都是用商量的态度，诚恳征求对方的意见，并倾听对方的意见。这是尊重别人的一种表现。

有一次，有一位老教授会见主席后非常感动地对我说：“我去见主席，主席拿出纸烟来招待，可是不巧烟吸完了，只剩下一支。你想主席怎么办？他自己吸不请客当然不好；拿来请客，自己不吸也不好。于是毛主席将这支

纸烟分成两半，给我半支，他白己吸半支。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待人热情、诚恳而又亲切。”他最后说：“这使我很受感动。”

毛主席的谦虚诚恳态度和对团结抗战前途的英明预见，正确的方针、办法，使许多名流学者心悦诚服。

我把主席讲的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当作对我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心里。

我折本了

1937年8、9月间，我从庆阳到延安。听到大家反映，毛主席讲哲学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有一次我到主席处谈到这些反映，并以我不在延安为憾。毛主席幽默地说：“我折本了。”我不大理解，有点诧异。主席解释说：“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那知只半天就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

正是由于毛主席作了深入的精细的研究，所以他才能发展了辩证法的许多方面。特别是他创造性地提出“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他的杰出的命题是“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例如武装夺取政权问题，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但是由于各国社会情况、历史情况的不同，所走的具体道路也各不相同。所以毛主席后来说：我们不要求兄弟党都照中国革命的办法做，只要求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主席所说的“折本”当然是开玩笑，他历来是把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两句成语统一起来，看作教学相长的。他自己学了就向干部讲，把讲课前的准备和上课时的讲解，作为加深研究的方法。在陕北公学讲了哲学课后，又应红军大学（后改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请求，讲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讲课的记录稿整理了出来，经过毛主席同意，打印若干份，分给我们学习。后来毛主席根据记录稿，选出其中辩证唯物论中的《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统一法则》两节，整理加工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矛盾论》，和后来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本哲学著作，就成为当代马列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成果。

带头开荒

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我们贯彻执行了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了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国民党出于反共的本性，却不顾大敌当前，阴谋置我军于死地。他们不遵守协议，连很少一点的军饷也不发了。

毛主席召集在延安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毛主席讲的非常简单明确：何应钦不发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的。解散回家吗？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难。

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热烈拥护，许多人还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毛主

席当场表示他也参加开荒。同志们都认为主席领导全党全国抗战，工作重要，不必参加。有人提出：“我们为主席代耕！”主席说：我一定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代耕。

果然，毛主席在他窑洞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一清早，他还未睡觉，就荷着锄头山门开荒。挖了一会，回窑洞办公，办公一阵，又出去挖地。

过不多久，毛主席根据他自己少年时代种田的经验，认为挖得差不多了。叫人来认真一量，果然一亩有多。

毛主席总结生产运动的经验，亲笔题了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全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展了生产运动。我军紧紧抓住了整风、生产两个环子，就立于不败之地。

哲学夜谈

一段时间，在杨家岭毛主席办公的窑洞里，每到星期三夜晚，总有七、八个人围在一支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的新哲学。这个会是毛主席组织的，每次他都亲自主持。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首先发言，然后大家发表意见。开始谈的几个人都是毛主席秘书处的秘书或干事，谈的只是哲学的一般常识或通俗讲话，随后逐渐扩大，也有高级干部和理论家参加，人数增加了座谈的内容也有所发展，地点移到了中央组织部大而深的土窑洞内，中央组织部还准备了简单的面食招待。因为毛主席的号召适应了广大干部的迫切需要，因此参加的人都踊跃积极。这是毛主席传播马列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一种方式，引起了许多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兴趣。

毛主席认真实行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和讲堂上解放出来，把哲学交给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他不断地竭尽心思、想方设法，把唯物论辩证法这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用通俗、易懂、易记的语言传播出来。如“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点的试验，面的推广”、“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分为二”、“要抓住主要矛盾”、“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等。这样就把哲学思想和实际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毛主席很高兴，进一步提出成立“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等同志主持，具体工作叫我做。新哲学会用什么形式宣布成立呢？毛主席提出筹备召开新哲学年会。艾思奇、何思敬同志都表示拥护。于是分别去请人作报告并邀请各方人士到会。愿意来听报告的人不少，起码在二百人左右。而作报告或讲话的人则你推我让，最后请了几位同志来讲演，新哲学年会毕竟开成了，约开三、四个半天。开完会，我向毛主席汇报时，主席高兴得立即定于第二天在西北饭馆庆祝。

第二天在西北饭馆摆了几桌酒菜，费用是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交付的。人们都满面笑容而来。毛主席首先举杯庆祝新哲学年会的成功，并宣布新哲学会的成立，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扩大。毛主席还走到每一桌去敬酒，并和每个人碰杯，大家都受到极大鼓舞。

纵谈毛泽东一生功过

黄克诚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低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黄克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本文摘自《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1980年在中央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创建红军时期，
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像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

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饱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饱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饱、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

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 “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1929年2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复中央说：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军阀战争很快爆发，形势就变了。毛主席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那首词，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1929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他的前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有的人现在说古田会议好像不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像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1930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1931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

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同志来到苏区，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消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作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他的《渔家傲》词里面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拆了毛主席的领导，
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

1931年，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组成了中央局，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斗争。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许多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绝大部分拔掉了，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他自己内部的各派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可惜当时我们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正确意见。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毛主席又被排挤。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已有深刻影响。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以博古力书记的临时中央也来到中央苏区。此后，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指挥军队。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他们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他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1932年受排挤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就是那时候写的。

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
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作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会议前后，毛主席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党的领导和军事方针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那时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当时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只是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领导同志就多了，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汇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阴谋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到三万。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他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陕北。

1936年底西安事变，成功地实现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执行毛主席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1941年，在中央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规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相反，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四五月间就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江南敌后，随后又渡江北上，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毛主席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比较具体地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党中央。在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像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并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后果是尽人皆知的，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

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有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还有一点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后，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与毛泽东天津看海

萧 三

萧三，原名萧子暲，新民学会会员。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本文选自1981年12月23日《天津日报》。

1918年6月，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致力于刚成立不久的新民学会会务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会友同学和一般有志的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有一种十分吸引人的印刷物到了长沙，这是宣传赴法勤工俭学的材料，我们看了都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向外发展的好途径。此刻，我们尊敬的老师杨怀中先生应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请到北京去了。北京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赴法勤工俭学之举又是北京的一些人，如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提倡的。主持者在北京、保定一带办法文学习班，受这一运动宣传品影响的湖南青年（骨干是新民学会会员，第一师范及各校学生），纷纷去保定、北京学法文，也学工艺。蔡和森带领几十个青年学生去保定布里村学法文，我和几个人到北京，和本省及浙江省的中学生办留法预备班。毛主席和第一师范同学罗学瓚、张昆弟等同路到达北京，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巷七号公寓。七八个人挤着睡在一个炕上。

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校内出现了许多组织，课外活动相当活跃。各种会社如哲学研究社、新闻学研究会是毛主席最感兴趣的。新闻学会请名记者邵飘萍来演讲。毛主席都去听，我也去听过两次，新闻学会后来还举行过结业式。

在北京，我们除和一般青年共同组织活动之外，毛主席和我们少数旧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又有个别的活动。

和在长沙时一样，我们经常到杨怀中先生家里去请教。杨先生那时住在北门（地安门）外豆腐池胡同。毛主席就住在杨家。我们去那里总是呆大半天。和在长沙时一样，杨先生夫妇、老夫人和杨开慧同志总是殷勤招待，留吃午饭。还是和在长沙一样。每人两双筷子，一双公筷。饭前饭后谈学论道，讨论时事。毛主席当时就不打算出洋赴法，他要留在中国（研究学问和救国之道）。但在北京居住要花钱，杨先生把毛主席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每天登记来馆看书报的人的姓名，也是他的职内事，每月薪金八元。毛主席要求不高，能糊口就得了。馆长是北大教授李大钊同志兼任，馆里有许多关于中外各种思想学术以及当时新文化的书刊。李大钊同志很器重毛主席，认为他是湖南学生的领袖。

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慕他们。杨先生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

1918年冬，我们这批预备留法勤工俭学生派一人先去法国作先遣，主持人也认为有必要。毛主席对这事出了许多力。

冬天到了，我和毛主席都想到，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因此决定到天津附近大沽口去看看。我们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又转车去大沽口。但下车后走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顷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来是一个冰的世界！眼力所及的十里海面上，冰块高低不平地躺在那里。

我们俩都很失望，但是既然到了海口，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我们于是相约：两人各向一方走去，绕它一周，然后回到原地来集合。毛主席向西我往东，走到前面，忽然眼前出现一个木头房子，在迷茫的雾气中闪烁着隐约的火光。我径直朝它走去。只见屋内一个中年以上的人在生火，在劳作。他看到我，奇怪地问：“你从哪来？”我答说是南方人，打算来看海的……一会，毛主席也进来了。主人表示欢迎，给我们泡茶喝，同我们谈话。我们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支支吾吾，不肯说真话。我们也就不问了，谈些别的话。（到现在我们都不明白，这位老人住在海冰上的真意。）坐了一会，我们又分头绕了半圈，才走到原地会合。但毛主席回来的迟，我等了许多许久，觉得脚都冻了。我问他，哪去了？他笑道，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上得岸来，我们仍乘火车到天津。这时候已经是晚上，街上一片灯光。我们都急着小便，但找不到厕所，于是去问警察。那警察听毛主席一口湖南话，又见我抱着一个大皮包，他不答复我们的问题，却要检查我们的皮包。毛主席故意逗他，从我手里拿去皮包，紧紧抱住不放。警察愈加怀疑，硬要看，毛主席硬不给。最后警察从毛主席怀里抢去，打开皮包一看：里面除两条毛巾、牙刷之外，尽是一些蚌壳——我们从大沽口海边上捡的。我们大笑，他晦气地把皮包还给了我们。我们也忘了要办的事。最后在一个小摊上买了几个有名的天津锅贴吃了，顺便进店找到了便所。

在回北京的车上，除我们外几乎没有别人。我们最苦的是两脚冻得很，车上也不生火，没法子，我们索性脱了鞋，两人对坐着，把脚伸到对方的裤腿里去取暖，两个来钟头之后到了北京，下车后各往自己原来的住所去。这就是我们的大沽口——看海之行。

后来，1939年我回延安在毛主席处吃饭时，他还回忆起这次“旅行”，并对人们说：“我那时真希望找到蓬莱仙岛哩……八岁的时候，我非常信神，我父亲不信，我和母亲还认为不对，会对家里不吉利哩！有人说我从小不信神，那是讲错了……”

和毛泽东的友谊与分歧

萧子升

萧子升，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本文摘编自《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

民国初年，1912年，长沙市建立了第四师范学校。

第四师范成立没有几个月，湖南省政府就决定把它与我所在的第一师范合并。合并后的学校就叫第一师范。第一师范原本就有一千多名学生，这么一来，它一下子成为长沙最大的学校了。

第四师范来的学生不像一律穿制服的第一师范的学生穿戴得那么整齐。他们穿得五花八门，就像一帮刚招募来的新兵。有个“新兵”，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

从第一天起，因为我们都是同乡的缘故，我就知道他叫毛泽东，他也知道了我叫萧旭东，这是我的学名，我们两家相隔三十公里左右，分属于相邻的两县，我来自湘乡，他家在县界那边的湘潭。

尽管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却从未交谈，只有当我们偶然在走廊里或操场上相遇的时候，才相视一笑或简短地寒暄一两句。那时候，我是高年级学生，他是新来的初年级学生，我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我功课很紧，所以既没时间也没兴致与低年级的学生讲什么同乡之谊。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桩事，竟使我们的交谊有了飞跃。它发生在陈列优秀作文的教室里。学校十几个班里的学生，每人每周必须写一篇作文，每班选出最好的交到教师委员会，再从中选出三、四篇挂到那间宽敞的展览室里的玻璃陈列橱中，让所有的学生观摩。我的作文常常获此殊荣，而毛则是最热心的读者。有时他的作文也被选中，我也兴趣很浓地读它们。因此我熟悉了他的思想。但那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笔画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后来他自嘲地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子。”真是一点也不假。

通过阅读彼此的文章，我们了解了对方的思想，联结了一根彼此相投的纽带。

每天清晨，我都听到毛泽东大声朗读古文，我知道他很用功。但是在所有科目中，他只有作文是拿手的。他的英语很差，算术也不好；图画课上他只画圆圈。在这些科目上，他总在班上的后面。但那时候，人们认为作文是最重要的功课，只要文章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泽东算好学生。

自从我们在展览室里简单交谈后，几个月过去了。一天早晨，我们在走廊里相遇。因为我们都没课，所以都走得慢慢腾腾的。毛带笑地站在我面前：“密斯特萧。”那时候，学校里人人都用英语彼此称呼。

“密斯特毛。”我也招呼了他一声，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会说点什么，因为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进行交谈。

“你在第几教室？”

“第一教室。”我回答了一声。他当然知道我在第几教室，这个问题仅仅是个交谈的借口。

他恳切地说：“今天下午下课后，我想到你们教室看看你的作文，行吗？”

“当然，欢迎你来。”我回答。因为好朋友之间惯常把作文交换着看，而已这种举动表明对作者的赞赏和敬佩。毛泽东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我发出了友好的信号，我接受了他的这份情谊。

当天四点钟下课后，毛不到五点就来到我的教室。同学们都散步去了，我独自一人等待毛来访。在我们的首次交谈中，谁也没提及家乡。我们谈的都是学校里的组织安排、课程和老师，并对其优劣各抒己见。对于体育课我们所见略同。全校一共有四位体育教员，一个专教军训，一个专教舞蹈。我们俩都不敢恭维这两位教员。他们虽是衣冠楚楚，却没有一点老师的气质。我们觉得他们道德水准太差劲：早上他们常常旷课，因为玩牌玩到深夜，早上来不及醒来。

我俩都很满意这首次的畅谈。临走他说：“明天我再来请教你。”他拿着我的两篇作文，朝我鞠了一躬，便离开了。他很有礼貌。

第二天课后，毛泽东又来找我，并说：“我很喜欢你的文章，想再留着拜读几天。饭后，咱们一块去散步，好吗？”我答应了，并提议由我在公共教室里等候他。学生们那时很时兴饭后散步。

第一师范的校舍是长沙当时唯一的一栋真正现代建筑物。人们叫它“洋楼”。“洋楼”四周砌起了院墙，大门外有一条马路，好几条小岔道从大马路上延伸开去。学校后面的小山叫做“妙高峰”。长沙城位于右侧，左侧是一溜五百来级的石阶，直通铁路，再稍往前就到了湘江边。湘江是湖南最长的河流，各类船只来往穿梭于江上。江中心有一座狭长的岛屿，上面种满了橘树，这个岛便叫“橘子洲”。橘子成熟的时节，远远望去，这片江中沙洲就像一团金红的云彩浮在水面。我和毛那时作的诗中曾有“橘云”，“橘子洲”等辞句。再前面三里以外，是高高的岳麓山。

湘江沿岸风光秀美，让人不禁诗兴大发。我在日记本中写了许多诗句。至今我仍然记得我和毛在一块漫步湘江边作的一首诗的前几句。在中国，人们司空见惯两个人合写一首诗。诗句如下

萧：晚霞峰间起，归人江上行；云流千里远，
毛：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萧：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
毛：高阁倚佳人。……

我是否见过毛提到的佳人，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后面的诗句我也忘了。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的最大乐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

第一次，我们饭后沿江讨论了两个小时。毛开口便说喜欢我的大作。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的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了我的文章。时隔四十年，至今王先生和毛对我的评价仍然记忆犹新，仿佛昨天才发生过的一样。

我把写着二十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第一篇的题目叫“评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这篇碑文是古典名篇。毛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我们都在争论。

光武帝是汉朝的一代名君，在位执政三十三年。在继位之前，叫刘秀，

曾与学士严光交情甚厚。刘秀登基后，邀请严光一同临朝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他推辞了。当朝宰相范仲淹——也是一大文士——应邀作了一篇碑文。这篇碑文素负盛名，后来收录在各种文学课本里作为“精选文章”。国文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我借给毛泽东的一个练习本上的第一页就是写的这样的一篇作业。

范仲淹写的碑文，仅二百一十九个字，文中表达了他对光武帝和严光的敬慕之情。这两人显示了杰出的高风亮节：光武帝贤君爱才，严光不爱权力和俗名。

我读碑文时，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在作文中我这么解释：鄙人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鄙人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委任，那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其同床共寝？这不也表明了他爱慕虚荣吗？

毛泽东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二百多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我反驳道：“你显然没有理解严光的思想。”

我们争论了好半天，但没有结果。

第一师范学生的作息时间表非常刻板，从早到晚的活动安排得极为严格：进课堂，入阅览室，到饭厅以及寝室等等，都必须随着号角的鸣叫准时进行，号角就像军营中的军号。当号角声一响，一千多名学生在十名维护秩序的人员指挥下，像一千多只鸭子似的迅速集合起来。我和毛泽东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我们以为这种强制纪律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常常不按号角行动。有一时期，训导人员对我们大加斥责，但最后校长表示让步，因为我们是好学生，行为纪律也不错，我们的违令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全然不理号角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愿意我们的谈论被突然打断。我们以为这些谈话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不应该中途而止。

夏天时，当其他同学都到大阅览室和自修室时，我俩常出去，到妙高峰的那块草地上去。妙高峰是座二、三百米高的小山，就在学校背后，从学校内体育场走去，只须几分钟就可到达那里。站在山顶上，我们可以俯瞰学校高耸的建筑物，也可以横看岳麓山的山峰。我们时常夜里登上山峰。坐在星月之下，一面高谈阔论，一面远眺校外长沙城中的万家灯火。

我记得有一情景十分难忘。像往常一样，吃罢晚饭，我们登上妙高峰，找块舒服的草地坐下来，我们沉浸在交谈中，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听到号角声。“他们一定是到休息室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后来，号角声又响了，“现在他们一定是回寝室去了。”半小时以后，传来了最后的一次号角：“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熄灯了！”而我们仍坐在那里继续谈着。顷刻，整个学校被笼罩在夜幕中，我俩清楚，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擅自离开已被察觉。但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沉浸在交谈中，根本没有考虑熄灯后仍在校外的后果。

暑假就要开始了。布告里贴出一则消息，各个班全部考完试后，学生将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学生应于三天之内离开学校。

最后，所有的教室都空空如也了，只有我所在的教室是例外。所有我的书籍、毛笔和墨水都摊在桌上，书箱也满满当当的。毛泽东走了进来，跟我打招呼。当他看见我还没有动手整理东西，就坐下来，说道：“萧先生，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已决定不回家了，”我答道。

“你真就呆在学校里吗？上个月你这么说时，我以为你在开玩笑。”

“没有，”我接着说，“我已决定先在这儿呆一两个月，然后再回家住上二十天。学校很安静，呆上两个月我能读许多书。”

“你这两个月的计划是什么？你计划学些什么？”毛泽东问道。

“我准备先自学一下下学期的代数、几何、英语和地理，兴许还要读些哲学方面的书籍。”

“我知道了。那校长允许你留在学校吗？”

“允许的。昨晚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想呆在学校，他说那是违犯校规的，但他相信我的确是要认真读书的，因此也就同意了。他告诉我，门房和四个校工放假期间也留在学校，所以学校不光我一人。他说他会告诉他们睡的地方离我寝室近些以便照看我。一些厨子也会留下来的，这样他们可以给我做饭，当然，我得交伙食费，学校不会负担任何额外的开支。”

“听起来真不错，我也想和你一起留下来的，你觉得怎样？”

毛泽东是我的最好的朋友，自然我很高兴，于是说道，“好，赶快去见校长。如果你愿意，我跟你一起去，兴许我能帮点忙。有个朋友陪伴在一起当然好，我希望你能留下。”

“但是告诉我，”毛泽东迟疑地说，“你为你的伙食费将付多少钱？”

“一月两块半。每餐一汤一菜。”

“一月两块半！也就是说两月五块！”毛泽东嚷道。“太贵了！”

“不，不贵，我以为很便宜！但不要为费用担心。如果你钱不够，我可以先借你。走吧，我们赶紧去见校长吧。”

我们去见校长，校长对毛泽东的请求毫无意见地准许了。当其他学生听说我们要留下时，又有两人想和我们一起去，他们让我跟他们去见校长。校长也同意了，这样暑假期间，我们留下了四人。尽管我和另两人很熟，毛泽东和他们却较生疏。我们以为他们很一般。

夏天，天气很热，下午简直无法读书。我们上午读书，吃完午饭后聊天，可有时天热得连话都懒得说。气温之高，我们静静坐着什么事都不干，仍大汗不止。

我们早晨做的事不尽相同。我会先学些英语和代数，而毛泽东对这根本不感兴趣，他不想寻求一种方法自学英语和代数。他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古典论文和历史上。其余时间，我常练习书法，而毛泽东字写得自成一体，也从不设法改变一下。

毛泽东暑假呆在学校的原因和我的很不相同。他对他的家没有什么感情，然而，他那唯一的一双鞋已十分破旧，鞋底都快磨透了，为了拿双新鞋，他晚些时候总得回家一趟。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穿家里做的鞋，在校穿双店里做的鞋是极为特殊的，那表明不必要的浪费和一种炫耀的心理，穿着往往被人瞧不起。一个和我与毛泽东一起留校的同学穿了一双很漂亮的店里做的鞋。对于我们，这双漂亮鞋可不及毛泽东穿破的那双鞋有价值。当我们这位同伴意识到我们对他的鞋子有看法时，没有再穿，毛泽东的那双破鞋倒赢得了真正的荣耀。

如此少的几个伴儿，彼此的性格就显而易见了。尽管没有人视察，我仍是每天尽量把自己的课桌、书本和寝室收拾整齐，我以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这也是我一贯有的习惯。而毛泽东的书桌却总是堆了很多书报，我们

的书室也是迥然不同；我的总是干净整洁，而他却常常挤不出时间来彻底收拾一下。一次我开玩笑地说：“大英雄如果不清理自己的房间，他怎能治理天下呢？”毛泽东却回答道，“一心想治理天下的大英雄没有时间考虑打扫房间！”

尽管我们的性格、背景和个人习惯均不同，并且毫不迟疑地互相批评，我们从未真正吵过嘴。事实上，我们很喜欢对方，而且互相尊敬。彼此批评一通后，我们总是笑笑就了事了，我们常常开玩笑，因为那样可以放松一下。

这些观念和习惯的细小差别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严肃讨论。每天下午我们都进行一次长谈，通常没有固定的题目，而是当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然更多的是讨论我们刚从报上读到的最新消息。

在师范学校，教育的宗旨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民国元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所谓军育，显然是摹仿了德国和日本，而毛泽东认为这一点是值得尊崇的。我不同意，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中，我说，“蔡元培的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前些日子，他针对这一主题写了篇很好的论文，题为《以美学代宗教》”。

“但是”，毛泽东坚持道，“军育更为需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德性的完美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那就是同样的意思。”

“如果民族软弱，完美德性又有什么用？”毛泽东问道。

“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不同，但在我们欢快的热忱的青年时代，我们又怎能意识到我们这种不同的深度呢？！

新民学会由毛泽东和我于1914年筹备组织起来。最初，它不过是由精选的道德良好、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简单说来就是：每个会员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修养、提高文化水平，肩负起改造中国的使命。学会没有表示任何政治主张，也不隶属任何党派。然而，后来毛泽东和学会的一些成员发展了政治雄心，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现在北京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是昔日新民学会的成员；而另外一些有学术兴趣的、富于理想主义的会员，则依然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们的学会可以称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当共产主义理论开始唤起广泛兴趣时，其运动的骨干就已在学会中间。我之所以把学会称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称呼；虽然一些年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新民学会仍是主要的核心。

1920年冬天，我由巴黎回到北京。毛泽东已经由北京回长沙很久了。虽然我们常常通信，但一直到1921年3月份我才有机会去长沙见他一面。

从3月到7月，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但我们似乎是越谈越崩。然而彼此仍以老朋友相待，都希望能够理解对方的观点。

新民学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其会员也不研究社会主义或者其他政治体制，但很多成员出席C.Y.的秘密会议，C.Y.的诞生使原来的新民学会走到了

尽头。我在长沙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不过，会员们仍热烈欢迎我。我与好几个会员多次亲切叙谈。很明显，毛泽东不喜欢这样。他担心有人会受我的影响，失掉对 C.Y. 宣传的共产主义的信心。他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够信仰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与他合作，将这种主义向全国宣传，然后付诸实现。

在长沙，有一幢叫“船山学社”的房子。是为纪念学者王船山（1619—1692）而命名的。现在有五十多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接管了这幢房子，因为毛泽东是其中成员之一，所以我也受到邀请到那里去住。

我在考虑重振新民学会，但同毛泽东初步长谈之后，我已意识到，毛泽东和我两人已无法一致了。

我的老朋友陈昌对我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已秘密成为 C.Y. 的团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改造中国，它既无政治观点，又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遵循俄国的榜样，努力宣传列宁的学说。没有人在寻找改造中国的其他途径。为什么？首先，有俄国的先例可效仿。第二，学习俄国，可以获取他们的援助和帮助。第三，人人都会热衷于秘密运动，秘密集会的神密劲有种诱惑力，恐怕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回头。我知道你有你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我认为你和润之将来必定会分道扬镳，但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说心里话，我认为各走各的路是好事。真理有诸多方面，每一方面都是宝贵的。”

当我把陈昌的这番话告诉毛泽东时，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要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

毛泽东和我的确有一连串的问题要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常常彻夜长谈，以至忘了睡觉。有时我们的谈话弄得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互相协调的基础。我无法接受毛泽东的论点，而我的答复也不能使他满意。几个月来，我们被这种无结果的讨论所折磨，但双方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口出恶言。因为我们不能弄出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双方都感到真正的遗憾和伤心。尽管我们的大前提是南辕北辙，但我们还是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讨论的重点可以概述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自由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我说我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却使人民失去了自由。

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搞移植共产主义并不表明人民就没有自由呀。”

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权力太大了，而个人却微不足道。毛泽东用笼统的语言说公众需要受法律保护，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如果必要的话，他必须为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

毛泽东在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时，还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新民主主义’。

讨论的第六点是：是教育还是政治？

我坚持认为，“靠军事力量所取得的变化只能是造成暴力；而通过教育达到的改革，就会是和平的和永久的。这是‘和平的改革’，当然，如果你

要立竿见影，那它们自然不能与武力带来的改革相比较。”

毛泽东说，“我喜欢立竿见影的事。坦率地说，你的观点根本说不动我。”

我叹道，“你不同意普鲁东的学说，这多么可惜呀！”而毛泽东却说：“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多么可惜呀！”

我们还谈到了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我们不停顿地讨论着，但我们越是讨论，越是出现无法回答的问题。毛泽东显然认为无须回答，取得成功唯有实践。对此我回答说，为达到目的，要作这样大的牺牲，那我宁可不去行动。

我们这样探讨下去，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直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日。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谈到黎明，毛泽东仍在说服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会议。

直到此时，毛泽东对于他在共产党内的活动从未向我隐瞒；而他对我说的秘密事情，我也的确不曾向任何人吐露一字。我们在上海分手后，经常通信，有时用只我俩人能懂的隐语。几个月后，我返回法国，我们的信件需要十或十二周才能达到对方手中，因为当时还没有空邮。对于毛泽东的钱包来说，没有空邮也是件好事，因为他的字很大，而且他的信往往很长，这样一来他得花好大一笔钱买邮票呢！

我迟至 1924 年才返回中国，住在北京。因为我不能到长沙和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见面，我们便频繁通信。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决定与共产党合作，结果共产党员都兼作国民党党员。国共合作使军阀经常指控国民党党员是共产党员。

这期间，我所效忠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着相同的基本目标——打倒军阀。我积极参加了这一革命活动。毛泽东、我和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都在为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尽管我与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以及其他活跃的共产党员有直接联系，但我对共产党内部的秘密讨论和计划自然一无所知。毛泽东继续给我写很长而亲切的信。尽管他不能公开讨论他党内的行动，我们仍像以往一样坦诚地作理论上的争辩。

1925 年，我经常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也失去了自由。我得经常藏在北京或天津外国租界以免被捕。1927 年，当李大钊和其他好几个共产党人被军阀政府绞杀的时候，我们革命党人更加活跃，尽管危险也更大了，我们的家经常被警察和士兵里里外外地搜查。有一次，我躲在外国租界，家人把毛泽东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写给我的满满一箱信件烧掉了。我不时地收到一些简短的口信，最后完全失去了联系。

毛泽东坚持党内民主

萧克

萧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曾任军事学院院长。本文摘编自1978年《伟大之所在》一文。

我不只一次地听到毛主席说，我这个人的头脑也很复杂，小时信佛教，跟母亲朝南岳，信过孔夫子，后来信进化论，最后才信马克思。1959年4月初，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党内民主生活时，又说，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说到这里，他又补充一句，这个同志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指主席）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听着毛主席的话，我立即想起一段往事。那是1931年秋天，我们永（丰）吉（安）泰（和）特委的负责同志毛泽覃（特委书记）、陈正人、余泽宏和我，在富田开会。一天晚饭后，毛泽覃同志和他的爱人贺懿同志同我们闲拉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扯东道西，无话不谈。谈着谈着，毛泽覃同志说起他和哥哥毛泽东同志吵架的事。他说：“有一次，我同哥哥（指毛主席）讨论一个问题，他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争吵起来，他说不服我，就要动手打我。我问他，红军还打人？这时，他把我没办法，也就不打了。”

泽覃同志边讲边做着手势。贺懿同志咯咯直乐。

我当时感到兄弟之间争吵，是家常事，所以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毛主席却把它记在心里，二十多年后还把它提到反对家长制的领导来检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

毛主席多次讲，在党内可不能搞家长制的领导，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主席的话，勾起了我对井冈山斗争生活的回忆。

井冈山初创时期，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部队，就其成分来说，大都是从旧军队和农村来的，虽然有党的领导，但很多东西还是旧的一套，还有浓厚的雇佣观念和军阀习气，干部打人骂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同志发现士兵反对肉刑，对打骂现象很有意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委，就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废止肉刑，反对军阀主义习气等制度。他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部队的民主空气空前浓厚，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互相有意见总是开门见山。领导批评群众，群众批评领导，直来直去，谁也不拐弯抹角。群众有时议论领导的错误、缺点，领导知道了，也不打击报复。有时大家正在议论某一位干部，这个干部突然来了，战士仍无拘无束，直言不讳。有的干部还把自己的旱烟袋锅，送到讲自己毛病的战士手上，让他边抽边讲。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

记得1929年一、二月份，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

地时，部队每天要行军，做群众工作，有时还要打仗。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总是每隔两、三天就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一次会，会议时间不长，个把小时。每到开会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提上马灯，准时到会。毛主席总是说，把你们找来，一是及时了解情况；二是请大家来研究一下行动和工作。后来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好办法，打胜仗是大家的，即便出了问题，也不互相埋怨，不推诿。

那时，前委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陈老总三个人领导。有时我们在一起开会，遇到有不同意见，就在会上辩论。在会议中间，毛主席总是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叫你讲话。会议结束时，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结论。毛主席从来就不主张按“长官意志”办事，反对那种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的封建主义思想。他常说，我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如果多数人不同意，那就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那时，从来没看到谁不同意谁的意见，就给人家任意扣上反对谁的帽子。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领导的典范。

毛泽东教我正确评价父亲 章含之

1962年12月26日，毛主席70寿辰那天，我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主席的家宴。这次见到主席，导致我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这是我始所未料的。

主席同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父亲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至交，经怀中先生介绍，父亲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主席。主席70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自己的亲属之外，只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父亲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主席事前关照每位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大女儿，王季范先生带他孙女王海容，父亲带我去。饭前，毛主席与四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主席还问了我们几个儿孙辈的情况，我告诉主席我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主席很感兴趣，问了我的年龄后打趣地对我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我：“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主席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这段对话我当时以为毛主席是那天晚上高兴了说说而已的。章含之，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女儿。本文摘编自1988年《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没想到，一周之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主席在寿宴那天同我说妥的，要我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关照要我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里。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他同毛主席数十年相知，他对我说主席是很随和的。他还要我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主席。父亲藏书较多，主席经常向他借书看。

就在那段我经常去毛主席那里帮他学习英语的时间里，在闲谈中，主席多次提到对父亲的评价。那时，每次读完英语，毛主席都要我和他以及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三人一起晚餐。有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主席问我：“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我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主席认真地望着我问道：“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我答：“1957年1月。”主席风趣地笑着说：“啊呀！我党的老党员喽！”我很窘，忙说：“新党员还不够条件呢！”接着主席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既然是个党员，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我父亲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脚，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我们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主席又考问我说：“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我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我说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主席听着我数说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我，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我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上了。主席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

多少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我只得老老实实地摇头。主席没有让我太难堪，他对我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于是，主席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是《苏报》案。主席说父亲因《苏报》一案报纸遭清廷查封，父亲后来流亡日本。主席问我：“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与毛泽东的交往

梁漱溟

1938年—赴延安

我第一次到延安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1月。见面之中，主席说，梁先生，我民国7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就见过您，那时您是老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您常来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还记得吧？主席的记忆力使我吃惊，他的话自然唤起了我的回忆。

我同主席同岁，稍长于他。杨怀中先生比我们年长。在民国6年我进北京大学教书之前，因我的一位本家兄长梁焕奎（我原名梁焕鼎）与杨先生相交颇深，他常引杨先生到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我家中聚谈，我也因此与杨先生相识。更由于杨先生是搞哲学的，而我则正在自学佛学与印度哲学，谈起来便有话头，常常向他讨教。民国6年（1917年）我应蔡元培先生之聘，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这样我就同杨先生成了同事，我们的交往就更多了。

杨怀中先生当时居家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是我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之一。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本文摘编自《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常去的地方。民国7年，毛泽东自湖南来北京。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是杨怀中先生所喜爱的学生，经杨向蔡校长推荐，给毛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月薪八元大洋的小差事，平时在杨家住宿。因住的正好是大门一侧的南房，所以常常为来客开大门。记得我去杨家，是有一位年龄与我相仿，但身材比我高许多的湖南青年常开门迎我或送我，杨先生本人也向我介绍过，但我记忆不深。不久杨怀中先生病故，因家境萧条，办丧事有困难，还是由蔡校长出面，由大家资助的，我是资助者之一。具体为杨办丧事、还是毛泽东，至于毛何时与杨怀中之女杨开慧结婚，当时我却没有印象。

在延安，我与毛泽东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至第二天凌晨，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我先讲，坦率地谈到我的失望，我的悲观，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破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时隔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是紧接着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谈到凌晨，而是谈到天明，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我头一天把自己

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点，很突出它的作用的。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说的大意是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出发才能达到。所谓“伦理本位”，即注重为家庭为社会尽义务尽责任；所谓“职业分途”，即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我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两夜长谈之后，我又到延安各处参观，在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一样，是很深刻的。

1946年再赴延安

1946年春我二赴延安。到延安第一天即见到毛泽东主席，寒暄后我提出，希望包括毛在内找十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第二天，果然是十个人，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我能记得的有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我先说了重庆的情况，由于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局面好，大家劲头很高。接着便转到我要陈述的本意。我讲的大意是自己年轻时，也欣赏欧美式的政治制度，但集三十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认为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和农业。因此，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而不是轮流执政，各搞各的。对国民党近二十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现状。但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我却答不上来。面对现实不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今天专

此时，梁漱溟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门来延安在这样的场合说这番话，向各位求教，算是留个题目。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的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垮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的的确确，我那时是做梦也未曾想到，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全面打内战；特别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也从此站了起来。

这次我在延安呆了十天，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匆匆返回重庆了。

1950年两次相聚

我于1950年1月中旬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沿途由四川省委统战部派专人护送我北上，在武汉还受到当时在湖北省任职后调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的张执一盛情招待。抵京后正值毛主席和周总理皆在莫斯科。3月10日主席和总理返回北京，在火车站迎接时，可能我是新近到北京的，统战部把我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头一个。主席握着我的手，比别人多说了几句话。他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并问候我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我的印象是主席和蔼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般视我。11日公宴，我又见到主席。席间，主席还走到我们的席前，见我吃素，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主席当场约我，明日（12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我深感荣幸。

大概是下午将近五点钟的样子，毛主席派来的汽车来到我当时的住处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十多分钟后便进了中南海。我进了颐年堂的第一道门，毛主席已在里边迎我了。这次谈话有林伯渠在座，他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也是1938年初我去延安经西安时认识，并在后来重庆旧政协会议上交往多次的熟人。但此次谈话，林老只是听，几乎没有插话。

毛主席这次谈话，一开头是寒暄，彼此问问近几年的身体、工作、家庭情况。转入正题，毛主席即问我对国事有何意见？我随口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主席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接着毛主席就对我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可难住了我，说不同意吧，颇有清高之嫌；说同意吧，又违背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考虑了片刻，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我的答复显然出乎毛主席的意外，他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并未形成僵局，很快又东南西北，

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到了开饭时间，主席传话开晚饭，我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主席笑着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吃饭时多了一个江青，但我们只是点点头，没有谈话。

主席还告我，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并说具体行程他会交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

从1950年4月至9月中旬，我都在外地参观访问。9月23日晚，主席找我谈话，但那天我另有约请，是匆匆吃过晚饭才去的。我到主席住处，他即让人上菜吃饭，而且也准备了素食。我十分歉意地说，我因有约请，已吃过晚饭了。于是江青给我送来水果，是很大的水蜜桃。我一面吃，一面想，这桃子何以能保存到这个时候，但没有发问。这时主席在饭桌上问江青，去南方参加土改的事怎么样了？江青说总有人处处设障碍，摆出种种理由，劝阻她不要下去。主席大声说，只要决心大，有毅力，没有达不到的目的、办不成的事。主席讲这些，都没有避开我。饭后主席询问我参观访问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谈完后，又对我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但我表示，今年出去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把参观东北、华北的见闻感想写出来，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这一次我又没有接受主席的意见，但不像上次那样，主席没有显露出不高兴，他笑着摆手说，也好，先写写观感，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谈吧。这次谈话的末尾，主席对我说，听说你抵京后一直未有合适的住处，我已让人安排接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你在家听候安排吧。

关于我个人的住房及生活，主席曾问起过，但我并未细说，总是表示自己并无困难。我当时寄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住房并不宽裕，生活亦有不便之外。主席了解了这些情况。几天后即由徐冰安排，派车接我去颐和园，住进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一直住了两年多，直至后来搬至积水潭边上的小铜井一号院为止。住进颐和园之事，足见主席对党外人士生活之关心，照顾之周到。

1951年一起论说邓小平

1951年春，中央有组织赴西南土改团之举。我省悟主席头年要我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在要我看看土改，便自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我所在的土改分团由章乃器任团长，有二十多人，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近四个月。

我于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3日晚间毛主席就约我去谈话了。他派车到颐和园把我接到中南海，还是在老地方。在我进门时，章乃器刚刚告退，他主要也是来报告到西南参加土改情况的。毛主席对我说，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主席仍陪我吃素，只有我们两人，不喝酒水，很快就吃完了饭。主席很能吃辣椒，我则不敢多尝。饭后毛主席问我，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我大致说了两点。一是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改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我也指出，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

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对这一点，毛主席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致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第二点我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我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说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政有力，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我特别讲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深得人心。我还举了解决四川的袍哥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件事办得好。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毛主席听着我的话，竟笑出声来，然后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我一直记着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久大区撤销，毛主席调邓小平到中央，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走上总书记的重要岗位。即便在“文革”中毛主席仍不时说邓“人才难得”，因而几起几落，还能留在党内，以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掌航向，使国家走上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1927年前结识的毛泽东 谢觉哉

1920年8月，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湖南省城通俗教育馆的报纸编辑会议上初次看到毛泽东。当时湖南刚赶走张敬尧，何叔衡任通俗教育馆馆长，约我去编《通俗报》。我历任农村小学教员，见闻不广，没有编过报。毛泽东的发言，我还不能全部领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通俗教育馆的房子，已记不清了，但毛泽东当时坐的姿式和地方，我记忆犹新，假如我能画的话，可以无遗憾地画出来。

一面之后，不见毛泽东再来报馆，却接到他自洞庭湖各县寄来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上的显著地位。原来毛泽东要亲自考察社会情况，没有路费，于是作“游学客”——穷读书人向私塾或读书人家求“帮赠”的办法——实际是做社会调查。

还有一次在长沙，我到毛泽东住的船山学社去。他不在，他要搬家，有人正在搬运他的行李。有一大网篮，满满地盛着笔记本。我大惊骇毛泽东阅览的丰富和阅览的用心，竟写了这么一大篮子。

在反动统治下，革命的进步的报纸是不会长寿的。1921年6月，叔衡的通俗教育馆馆长被撤了职，我的《通俗报》总编辑也随之完结。在移交馆务时，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湖南马日事变，我避居长沙乡下。几十天后，潜入长沙，在北门外的沈家大屋又会见了毛泽东，同住了若干天。这时毛泽东昭示我们的，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两件事：要搞武装，没有武装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要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他写过一篇文章，说现在还怀疑土地革命的同志是在发“黑眼晕”（一种突然晕倒的病，湖南人叫“黑眼晕”）。

在决定要毛泽东去湘赣边区搞武装的那天晚上，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同志化装成农民出发了。临行对我说：“谢胡子，这大屋住不得了，防止敌人来一网打尽。”我们也就很快离开了那个大屋。

毛泽东在“沔痴寄庐”

蔡 畅

1917年6月，我的三哥蔡和森同志在湖南高等师范文科毕业。这时，我们一家，以母亲葛健豪为首，都住在长沙岳麓山下周家台子的“沔痴寄庐”。母亲已经在长沙的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大姐庆熙还在自治女校学刺绣，她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刘昂也在小学念书。家中只有我一人，于1916年夏在周南女校音乐体育科毕业后，留校当体育教员，每月挣八块钱，加上母亲剩余的一点首饰，勉强维持生活。为什么和森没有找工作呢？一方面当然是在长沙找工作确实困难，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他和毛泽东同志等进步同学，正在酝酿组织新民学会。他们正在反复讨论、琢磨，如何把解决个人出路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结合起来。

当时，湖南是北洋军阀与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争夺之地，但革命势力的武装力量都是南方军阀的部队。连年征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正是在资产阶级无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封建军阀又一味倒行逆施，百般蹂躏老百姓的多灾多难的历史环境之下，举起改造中国的革命大旗的。

从1917年秋季起，毛泽东以及张昆弟、罗学瓚、邹鼎丞、蔡畅，新民学会会员。建国后曾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文摘编自《回忆新民学会的活动》一文。何叔衡、陈章甫、萧子升等进步青年更为频繁地来往我们家中。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的学生，而第一师范的校址几乎正和我家的住处隔岸相对。由我家去杨怀中先生所住的饮马堂也只有三四里路。每逢远远望见毛泽东来临时，我的外甥女就高兴地喊叫：“润之先生来了”。在那时和森就已非常钦佩毛泽东，说他品德非凡，文章出众。在我们家中他俩经常促膝长谈，纵论天下事。有时他俩和其他知心朋友同出郊游，一面欣赏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一面筹划革命活动的前景。这时俄国两次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曲折传来，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已通过《新青年》杂志在国内进行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所有这些都吸引了他们的强烈兴趣。

1918年春，毛泽东回湘潭度寒假，带着他母亲来长沙治扁桃腺炎（那时叫“蛾子”，还是难治之症），就住在我们家里，由庆姊日夜照护。不久，和森就和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去旅游了半个多月，实际上大概就是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的大政方针吧。这样大的旅游毛泽东已与萧子升进行过一次。1918年4月17日终于在我们家中召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我这时由于年小还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但是还隐约地记得那天中午会餐的情景，因为这次简单的午饭是庆姐、我和母亲几个人亲手做的。

同毛泽东谈文艺

臧云远

臧云远，作家。本文摘编自1979年《新文学史料》。

1938年秋天，我到达延安，下榻在西北大旅社。翌日开始拜访几位文化界的朋友。

当时，交际处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把多年渴望的心思脱口说了出来：“我想见见毛主席。”第二天他来回话：“晚饭后，有位同志来接你去见毛主席。”我这一天是很不平静的，觉得钟表走得太慢了。

傍晚的时候，有人领我先到一所窑洞，里面走出一位同志，热情地接待我。由他挂了电话，又派另一位同志送我到一院落。只见土山下三间窑，青石镶垒的门窗，中间窑洞有门，左右两窑安窗，里面互相通着。毛主席正在靠南的窑窗前，俯案写作。书案是长方木板。上面铺着桌布，点了两支蜡烛，案头上放着一个半尺高的高尔基塑像。毛主席见我进来，就放下毛笔，同我握手。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一看窑里有个木板床，墙上挂着一件大衣，我们的毛主席就这样简洁朴素。这时他打开一筒小炮台烟叫我抽。我说忌烟了。一位同志泡来两杯茶。喝一口延河水，心里像延河一样欢腾翻滚。我一看在一迭稿纸上，起头写着“论新阶段”四个字，这就是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谈话就从《论持久战》开始，毛主席问我在汉口文化界有什么反映。我说是顿开茅塞，心里亮堂了。离开汉口时，凯丰曾和我谈到《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一下子销售了一万多册。我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问我刘白羽到延安来了，你认识吗？我说，他是写小说的，去年在济南前线余心清家里见过一面，我是同丘东平一道去的。毛主席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回答是山东蓬莱。毛主席问那里地势怎样？有山吗？我说胶东像个牛头。蓬莱是牛角，突出在渤海。海里一串岛屿，是渤海南端的门户。陆上丘陵起伏，东南在青岛以北有崂山，面对太平洋，西面是泰山，算是顶高的。当中无数小山，一片片松林。我们在家就是烧松材毛做饭的。毛主席点点头。当时我不知道毛主席问胶东地势早有打算派八路军支队去打游击。以后许世友将军就由毛主席派到胶东锯齿牙山建立了敌后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问我在东京几年，我说五年。接着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在东京留学生中革命文艺活动的情况。原左联同仁，有的是从上海去的，有的是从北平去的，都想办个刊物，以后合起来办了个《杂文》。这个刊物是鲁迅起的名字，在东京印，运到上海发行。出了三期，给上海反动当局封掉了。我们《杂文》社同仁，在东京“三间庄”商量再出刊物，当时郭沫若在座，他说改名《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大家都赞成，于是继续出《质文》。还通过魏猛克联系，使鲁迅与郭沫若互相问候致意。鲁迅对郭沫若在东京千叶从事考古研究很赞赏。郭沫若看到鲁迅来信也很感动。我们在东京的文艺青年对两位“五四”文艺革命前辈的互相问候都感到很高兴。

我说了以上情况后，接着说，中国的李白和杜甫不是很要好吗？李是浪漫主义，杜是现实主义，李比杜大十一岁。“五四”新文艺运动，鲁迅是现实主义，郭是浪漫主义，鲁迅比郭也大十多岁，他们也是应该很要好的，毛主席笑了，说你们做得很对。

毛主席一支支地吸着烟，慈祥和蔼而又严肃，锐利的目光，洞察千秋，炯炯的光辉照耀万代。我在毛主席的对面坐着，好像掉到大海里一样，自己仿佛是一粒海滩上的沙子。望着两支熠熠的烛光，像自己的心一样跳跃欢腾，书案上高尔基的塑像，也在向我微笑似的。

记得在东京早稻田一家“支那料理”的楼上，几位文艺青年，与秋田雨雀会面。他那时五十岁，一头白发，在签到簿上，一笔画出自己的侧面头像，在耳旁长长地写上雨雀二字，他是那样亲切地与我们谈论着英雄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崇敬地谈着毛泽东、朱德的名字。我们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大路歌》、《渔光曲》唱片。虽然《大路歌》、《渔光曲》并不是描写红军的伟大长征的，但是隔着黑水洋，对于从祖国大陆上的进步歌曲足以引起向往的情思。

那时中华民族危急存亡，远离祖国寻找真理的留学生，把希望寄托在井冈山，寄托在红军。无论是剧团演出，诗歌座谈，文艺界和文化界的集会，都在谈论着红军的消息。而今夕是何夕，在烛光照耀下，红军的创建人，党的主席就坐在面前，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毛主席当时四十五岁，正当壮年，我不过是二十五岁的青年。感到万水千山，二万五千里征途的战火风云，仿佛都留在略显消瘦的主席的面宇上，眉宇间闪动着千军万马指挥从容的雄才智慧，蓬松的鬓发轻摇中闪现出缔造新中国的谋略和图景。

我汇报了武汉文艺界的情况，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又说：有人提出，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辩。毛主席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的斗争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给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里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

我问主席对当时文化界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有何指示。在汉口讨论时，是主张解放思想，提倡科学与民主，那就是“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现在要完成。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因为封建落后，反对愚昧，就要来个启蒙。接着毛主席谈了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问题。他说：中华民族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留下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都还没有来得及有系统地整理考证，理出头绪，还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资料很多，杂乱散落，要下一番功夫，弄清楚事实，这是整理和考证的工作。然后，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掌握资料来分析批判，看那些是好的，有用的，那些是坏的，没用的，坏的去掉，好的留下，要为新时代所用，这是文化工作的两重任务，要一道来作。

毛主席还谈了有关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对启蒙运动赋予了新的涵义，指明了文化艺术运动的方向。我当时感到在汉口文化界座谈讨论时，还只是几个条条，一些概念化的理解，经毛主席这一番指点，心明眼也亮了，看得远了，仿佛新文化的灿烂前景出现在地平线上能一眼看到了。

谈话由文化问题又回到文艺问题上来。我向毛主席报告武汉抗战诗歌的朗诵情况。在文艺界座谈中，提出通过朗诵诗的语言接近大众语，大众语也变成了诗的语言。如去年，飞机两字不能入诗，诗人叫飞机是铁鸟，飞机在生活中多起来，今年在诗歌中就叫飞机了。毛主席笑了。毛主席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

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的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

烛光把毛主席魁梧的身影照在粉白的窑墙上，他对祖国文化和文艺问题的高瞻远瞩、亲切教导，使我这一粒海边的砂子，仿佛也明亮透光了，顿时感到这墙上窗上移动的身影高大起来，像主席长征途中越过的昆仑山一样，雄视着黑沉沉的亚洲大陆。而自己又像山谷河边的一棵小草，在时代的风云中舞动。烛已换过，夜也深了。我想主席该休息了。我站起来要告辞，主席亲切他说再谈一会儿。

我坐下来，幼稚地问主席，你看革命什么时候成功。当时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脑子里还没有清楚的概念。我所指的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消灭反动派。主席望着我，停了一下，慈祥地对我说，你指的是抗日战争吗？需要十年，八年。至于革命成功，也许二十年三十年，也许我们这一辈子都赶不上了。中国黑暗势力，目前占百分之七十强，进步的力量占百分之二三十，两种力量对比，向着革命转化，前途是光明的，斗争还是很艰巨的呀。

接着，毛主席又谈论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仿佛整个地球都在毛主席手里转动。时间不早了，我站起来告辞。毛主席与我握手告别。主席站在窑前，伟大的身影对着满天的星斗。由一位同志伴我走出了院落。我觉得眼前一片光明，新的战斗在向我召唤。

我在延安呆了一年多时间，组织上指定我与艾思奇联系，他多次约我一道参加纪念会和晚会，也多次见到毛主席。印象比较深的，是刚到延安不久，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发展生产，开过骡马大会，边区主席林伯渠主持开会，毛主席也在会上就边区发展生产问题作了指示。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领导和关怀下，进步文艺界进行了学习。后来《兄妹开荒》在红岩村场地上演出，招待文艺界。接着看到了《王贵与李香香》，听到了有关《白毛女》的消息，和其他有关小说的创作。都是在毛主席光辉的文艺思想教导下，深入生活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在我即将离开延安的时候，忽然接到了通知，叫我第二天不要出去，有一位同志来接我。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人来了，把我领到延河边上，一座礼堂的会客室。见到了毛主席和政治局的部分领导同志，还有艾思奇、周扬等。显然他们是刚开过什么会，要在那里会餐。我走到毛主席跟前，主席说：你瘦了。有人替我回答说：他病了一场，是伤寒。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是留下，还是回去？”旁边人替我回答：“他回重庆去工作。”接着谈了几句别的，就有人张罗吃饭了。

大家围坐在两张方桌拼起来的长桌上，我坐在艾思奇和周扬的中间，在靠西边桌子上。菜是一式两份。毛主席坐在当中，面向南，吃着酒。席间中央领导同志谈笑风生，有人问：主席，听说你在长征到甘肃路上，吃西瓜加辣子。毛主席幽默地回答：嗯，吃西瓜加上自己爱吃的东西。说得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心中装有新诗

臧克家

臧克家，著名诗人。1957年时为《诗刊》主编。本文摘编自1990年《毛泽东同志的新诗观》一文。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文苑诗坛上的高手。他不但在诗词创作上，出类拔萃，饮誉世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功力也颇深。这从他对古典诗词与当代作品的欣赏与评论方面，可见一斑。

可是，对新诗，他没有过系统性论述，从有关的片言只语中，给人的印象有点纷坛，甚至似乎互相矛盾的感觉。我常常想，我们是否可以就上述情况加以思考、分析，得出毛泽东同志对新诗到底持怎么的看法？主意何在？

他有些关于新诗的话，传得很广，譬如：我不看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这虽是出语幽默，但也见出他对新诗不大喜欢。他也曾这样说过“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的话。爱与不爱，是个人偏好的事；有无成功，却是一个理论评价问题了。

如果问我：你看毛泽东同志是否有点重视旧体诗词而贬抑新诗呢？

我的回答：不是的。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对新诗的作用是看重的。1957年，他给我和《诗刊》编委同志的信上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同时，他以喜悦的心情写道：“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一个伟大领袖人物的胸怀与卓识。他是革命家，一切以革命需要，人民需要为取舍的准绳，摒除偏私，顺应时代潮流。他个人是写旧体诗词的，却号召以新诗为主体。古代诗人，他是偏好“三李”的，对杜诗认为好作品不多；但在正式评价的时候，他对杜甫给予很高的地位。

1957年，1月12号，毛泽东同志邀约我与袁水拍同志去谈话。一谈就是两个小时。谈话内容，大半与诗有关。从《诗刊》的创刊，民歌从四言到七言，谈到新诗的时候，他说：“太散漫”，因而谈了他个人的看法。他认为：“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这与鲁迅对新诗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与我个人一向对新诗的观点与创作实践相符合的。听了他老人家的话，我特别兴奋，后来，我就以《精炼·大体整齐·押韵》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送我们到勤政殿大门口，站在那里，举起大手，一面高声喊着：“把你们的作品，送我一份呵。”这时候，我们心里都很激动！回家路上，我在车子里想：毛泽东同志，心胸里有千条事，万条事，其中就有新诗一条呵。他那么忙，真是日理万机，他还想到约我们两个新诗作者，作了这么一次长谈！

回忆毛泽东二三事

薄一波

毛泽东同志精心阅读马列的书，垂老不倦。他曾经建议把三十几部马列经典著作印成大字本，发给高级干部作为必读之书。他并且注重总结国际工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在这同时，他还经常阅读中国的古书，而且很讲究读书里的学问，从来不是无所谓地去读，而是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常常把书里可以借鉴的内容自然而贴切地运用于指导实践。

他很喜欢读中国的史书，历史的知识很渊博。自己爱读二十四史，还鼓励一些同志去读这部史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工作的借鉴。1965年，毛泽东同志曾向一些领导干部建议，读一读《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书中的这类话当时曾为不少同志引为箴规之言，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经常想一想。

毛泽东同志也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本文摘自1981年《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一文。绍给别人。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谈到《西游记》，毛泽东同志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同志评价很高。他对我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他还讲过，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他借这件事说明选拔干部，不能统统按资历，要按能力。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他在一次会上，还讲过《西厢记》中张生和惠明的一段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找人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可是无人肯去，于是开群众会议，这时惠明挺身而出，把信送了去，搬了兵，解了围。毛泽东同志说，惠明见

义勇为，勇敢胆大，是个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点惠明。他还说过，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个青年，是个奴隶，为了成全别人，自己受拷打，不屈服，反过来把老夫人责备了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的学问好？他希望人们不要小看地位低的年轻人。

毛泽东同志看戏也常常与众不同。比如看《打金枝》，他是从工作方法的角度去看的，说郭子仪的儿子同皇帝的女儿结亲以后，闹矛盾，郭子仪和皇帝各自批评了自己的孩子，解决得很好。这是说解决内部矛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他还说过郭子仪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当时有人告郭有谋反之心，郭听到后就把自己的门第敞开，任人参观，“门户洞开”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看《打渔杀家》，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一位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讲，萧桂英一度动摇过，后来醒悟过来了，终于一起去复仇，这就好嘛！我把你比作萧桂英，萧桂英终于是革命了。这一席话，使那位朋友很感动。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大会上，批评少数党员干部争地位、争薪水的不正之风时说：有个戏叫做《林冲夜奔》，那上面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请看：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碰到评级这个机会。同志们，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我们大家回去劝他一下，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伤心处呢？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弹几滴眼泪的。

毛泽东同志不但注意从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中吸取鉴戒，而且重视在现实的生活中倾听群众的呼声。只要是有利于革命的意见，他就积极采纳；做错了的事就改正。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延安曾经多次听到和见到这种事情。

1943年秋天，我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同志，他讲到反对张国焘路线的问题，说有一次听抗大汇报工作，他们谈到原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同志说，我当时表示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因此立即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错误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从几个战士的不满中，发现并纠正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扩大化错误，团结了原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和战士。

我还听毛泽东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1942年8月，一天，边区政府正在开征粮会议，天降暴雨，雷电交加，把参加会议的延川县县长击死。街上老百姓中就说怪话：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主席？保卫部门要追查讲这个话的人。可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让追查，而是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反感。后来检查发现，陕北这么个不过一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征收19万大担公粮。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他们不满。于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能再这样办了，决定把公粮减为16万大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受到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又善于团结自己队伍中犯了错误的人。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他提议要把几位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

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着重个人的责任。选举的那天，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同志不走，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票快唱完了，王明的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走了。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七大”开会前，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内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都正确地解决了，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七大”开会时，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是新的伟大任务。党的“七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在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之后不久，我们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四年之后，又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人民的新中国。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

第二编 外国名人的评说

毛泽东深邃而豁达

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本文原载日本 1976 年《读卖新闻》。

我作为外务大臣于 1972 年 9 月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和 1974 年 1 月为签订日中航空协定而访华时，先后两次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我想，我可能是日本的政治家中见到毛主席的最后一个人。这两次会见时，周恩来总理都在座。

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我是在北京市内中南海旁的住宅里见到毛主席的。那间接待室兼书斋里摆满了线装书，书中夹着许多白色的书笺。毛主席似乎就在那里度着专心读书的生活。

我没有看到那里有外国书。我感到，他对日本问题很感兴趣，并且有很丰富的知识。我听说他没有来过日本，但是，他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很了解。

譬如，毛主席举出“ I、RO、HA”及“ A、I、U、E、O”（都是日文字母的读音——编者注）评价说，创造了这些文字的日本民族是伟大的。他还说他在学日文。可能是半开玩笑，他还说想到日本留学。

当我说：“那我们可怎么照料您好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毛主席开玩笑地说：“你不友好啊！”如今，这已成为值得怀念的回忆了。

他对自己年轻时的事也毫不掩饰，调皮就是调皮，不遮不掩，发出朗朗的笑声，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我感到他像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在第二次日中航空协定谈判时，他毫无顾虑地对我说：“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他的话消除了我的紧张心情。

毛主席谈话时，总是慢慢地选择着词汇。

毛主席尽量地特意抽出相当长的时间会见我和别的人。我想他是尽量地会见各国的应该见的人的。

在国务方面，他作为最高的负责人，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先生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自始至终保持了非常恭敬的态度。似乎可以肯定，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和周恩来先生作为卓越的组织者的能力，是缔造了今日中国的巨大动力。

不拘形式的毛泽东

王安娜

毛泽东并不像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剧场里。其实，那不能算是正式的剧场，只是一个照明设备不足的大厅。在大厅的一头，有一个高起的平台，权作舞台之用。观众是红军战士、学生和老百姓（即延安的普通市民和从近郊来的农民）。

我时而看看舞台，时而望望观众席。这时候，艾格妮丝问我：

“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到剧场来看戏。”

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像孩子一样的笑声，王安娜，西德友好人士。1935年与王炳南结婚，后到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之久。本文摘编自《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当你和他接近时，就会觉得，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我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我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一天，他循例只带着一名“小鬼”，慢悠悠地踱到我们的院子，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在那张破旧摇晃的桌子上，放着已经盛上咖啡的杯子。

在阳光下细看他的样子，比在昏暗的剧场清楚多了。这时，我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的样子。然而，面对着他，又不能不被他的才智焕发所慑服。这个穿着满是皱折、不拘款式的衣服的瘦瘦的男子，由于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使党和红军都确信能取得最后胜利，当我知道这一点时，能不为之惊叹吗？摆脱了全军覆灭的危机，毛泽东现在正以中国这一边远荒僻的地区作为根据地，全力以赴地为革命进入新阶段而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和我们谈话。当他看到我难以听懂他的湖南方言时，便对着我微笑。我们谈到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我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当艾格妮丝谈到我的儿子时，毛马上问我：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余兴未尽地问。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我答道。

“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

像比你们强呢！”

那时候的谈话不用说，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是他在自己的谈话中，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做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因此，外国人要很好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外国，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谈到他对外国的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全都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他头脑里的欧洲，一步也还未越出1900年的状态。

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话，这一点使我极为愉快。说轶闻趣事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

毛泽东在院子和我们分手时，希望我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我们的谈话。

毛是夜里工作的人。他很晚才起来，用两、三小时在延安的小街上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到接近傍晚的时候才开始工作。

第二天傍晚，我去看望他时，只见宽阔的房间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奇形怪状的投影。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夹。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据他说，碰到特别有兴趣的书，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把它看完。深夜两点乃至三点以前他是不睡的，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够长。

和其他烟酒不沾的共产党人正相反，毛偶然也喜欢喝一点土制的味道不错的红葡萄酒，此外，还非常喜欢抽烟。我看见他喜欢抽的老刀牌香烟的盒子，在房间里散乱地放着。

我们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成功的应变措施各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不管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还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地区（即边区），统一战线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毛深思后，缓缓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慢，倒不是拙于言词，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我一再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即使很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据说，毛有这样的习惯：他在延安城内蹒跚时，不管碰到谁——小商贩、赶车人、农民、羊倌……，都要详细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问毛泽东。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答道。

“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都加入我们的阵线。”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和学校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接着说，“现在，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

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以完成将来的解放战争。”

“可是，究竟国民党方面是否已准备和你们协商？”我又问道。

毛泽东微笑着说：“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就根本的问题谈得更深入，我们甚至要求国民党代表团到延安来，我们等待着。”

然后，毛泽东又和我谈到了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课。他在讲课中谈到内战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在内战中发展了的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

毛对我再一次详细说明在江西省曾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战略原则的内容。可是，当时那些正统派的党领导人不接受这些原则，他们已被西欧的军事理论俘虏了。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指在敌人比我方强大时，暂且退避，待条件有利时才进行反击。毛泽东在给我说明时，引用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兵法和古典小说的事例。比如，春秋战国时代以弱胜强的范例以及在许多京剧里演过的、中国人人皆知的曹操远征的故事。

我离开毛泽东的家时，已是晚上 12 点多了。他让抄下了他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译了出来，诗如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是一位谦虚纯朴的老人 巴里奥斯

塞莉亚·巴里奥斯，秘鲁著名记者。本文原载秘鲁《新闻报》。

我一到达中国，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名字：“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都亲切地提到这个名字。对革命来说，这位领袖是团结的中心，是它的信仰和宗教。

要想见到毛是很困难的。当时我们这些应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大约五千人聚集在北京。

这位伟大的理想家，历史上最不屈不挠的造反者在全中国确立了他那作为唯一伟大力量的地位。

在北京逗留期间，我访问了公社、学校、工厂、合作社。毛的名言、他的思想一直是那个强大和复杂的国家的行动指南。

十月份温暖的一天，我到著名的北京“红星”公社去访问。

当我们回到市区时，《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等在旅馆门前，看上去她有些激动。她同翻译讲了几句话，于是脸上露出了微笑。

“别下车了”，她对我说，“毛主席将接见你。”

“毛泽东主席，现在，我就这样行吗？”我不知所措地问道。

“没关系”，她回答说，“毛主席是非常朴素的。你能见到毛主席很幸运，你的一些同事来过几次，都没有能够见到毛主席。”

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有一群人正等着，他们已经得到确讯，知道毛要来。

人们领我们进了大厅。大厅墙上挂着以中国传统国画轻灵飘逸的笔法画的大幅花鸟画。

我们按国籍分了组。一位阿根廷人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将要见到毛。许多人同毛主席握完手后，恨不得把手留作永久的纪念。”我对她说：“同一个人握手实际上并不那样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作为领袖而参与的这个历史进程的规模。”

几分钟过后，毛泽东出现了。我原以为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进入大厅会像神人出现一般，形成一个震动人心的场面，实际上我却在肃静的气氛中看见一位衣着整洁朴素、和我在大街上看到的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的老人走了进来。

我看了他的面庞。他的目光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的目光安祥而清澈。全身都焕发出谦虚之感。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时刻之一。我看着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人物，最伟大的领导人，历史上最光华四射的智慧之一。他是一位纯朴的人，举止谦虚，这反而显出他的伟大。

于是我理解到他的心胸广宽，明白了为什么他的人民热爱他。他同他们一起斗争，他以顽强和不可动摇的造反精神坚持实现他的理想，他解放了他们。

当毛来到我身边时，他微笑了。他伸出右手，我听见他说“秘鲁”，还说了一些表示欢迎的话。

我向毛致意时说：“看到您的思想唤起了全中国的智慧和意志真感到了

不起。我看到，在工厂、公社和街道上，任何轰轰烈烈或平凡的创造活动无不从您的思想和教导中得到鼓舞。”

当毛离开大厅时，我看见一群个子十分高的、身穿长袍的非洲人一边眼里流着激动的热泪，一边唱着“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歌曲。

这些泪水不是软弱的表现。相反，我认为在这些泪水中充满着世界的力量。这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毛所激发的力量，他的逝世对人类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会见赫尔利 巴雷特

巴雷特，曾以美国军事观察团团长身份于 1944 年 7 月到延安。本文摘编自《毛泽东会见记》一书。

凡是有飞机由重庆飞来，在延安都是一件大事。1944 年 11 月 7 日下午，周恩来，我，和一大群中国人和美国人到飞机场接机。飞机着陆后，门一打开，梯子上赫然出现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军人模样、非常英俊的人物，他穿的是我历来所见剪裁最漂亮的制服、胸前佩着的绞带在我看来足以代表美国参加过的每一场战争。他就是美国总统特使巴特立克·赫尔利少将。他访问延安、显然事前没有人通知我们。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此行目的是要在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之间担任调停工作。

周恩来一看这位军人气派十足、服装异常漂亮的人物，显然吃了一惊，立刻问我，这位贵宾是谁。我告诉他，这就是赫尔利将军。好几年前他是陆军部长，我曾在纽约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周说：“你留他在这儿，我去带毛主席来。”接着就在滚滚沙尘中扬长而去。

一会儿，比我所料想的还快，毛和周坐着中共在延安唯一的汽车来了。这辆司机室关闭着的破旧卡车至少是我在延安所仅见的一辆汽车。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一连步兵，显然是在飞机场附近兵营临时匆匆召集的。毛以正式的礼节欢迎赫尔利将军，一连步兵排列成为仪仗队，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检阅。赫尔利将军回敬步兵连长的敬礼，然后挺直他的高昂的身躯，像中毒的小狗一般鼓足气，发出一声印第安人的长啸。毛和周看见这位贵宾的怪异行为后的脸上表情是我毕生难忘的。

检阅仪仗队之后，毛主席和赫尔利将军爬进破旧卡车的司机室内，我也跟着挤进去做翻译。赫尔利将军语言泼辣，说话奇特，因此翻译相当困难。此外，他的谈话缺乏条理分明的思路。他看到路上的乡下人，就回忆往事，联想俄克拉荷马州的老朋友——这些对毛都是没有意思的。他看见一个老农夫使劲扯着一只被我们的卡车吓惊的逡巡不前的骡子，大声叫嚷：“差利！打它的另一边。”我必须有敏捷的思想，才能把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谈话的大意翻译出来，使毛主席和周恩来了解他的说话的一些内容。赫尔利将军和他的秘书——一位叫史密斯的陆军军曹——被安顿在美国军事观察团团员所住的同一类窑洞里，卫生设备（或者缺乏卫生设备）和我们的一样。如果赫尔利将军对这种斯巴达式的简单设备感到不平常，他却没对我说甚么。……

我觉得赫尔利将军在开场白中竭力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共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强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愿竭尽全力最终击败日本。他进一步声明，他坚信蒋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衷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接着，他递给毛主席一份声明，说蒋委员长愿意根据其中的条件和共产党达成协议。

声明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中共军队将遵守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遵循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

享、民有之政府。两党之政策应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

四、中国只应有一个国民政府与一支军队，共军所有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组后，将按军队接受与国军相等之兵响与津贴，所有部队皆应获得武器及物资之平等分配。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存在。中国各政党皆享有合法地位。

以上条文的措词无疑带着美国口气，其中“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以及“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等字眼尤其明显。

这些下甚平常的措词显然逃不过毛主席的眼光。条文一念完，他立即询问这五点内容代表谁的意见。赫尔利将军回答，这些要点是他的意见，“但我们大家都参加起草工作”——大概他指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包括蒋委员长及其顾问。赫尔利将军继续说：这些条件并非“不容讨价还价”的建议，而是要和毛主席及其他中共领袖坦诚进行磋商的，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态度，根据史密斯军曹对会议的报告，我当时告诉赫尔利将军，我认为毛主席想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所提出的全部条件，赫尔利将军回答，他都同意了。

当时我觉得毛询问这些条件代表谁的意思似乎有些唐突。但是，我后来阅读这些条件，感到这个询问是合理的，因为其中有些措词不像蒋委员长普通的语调。

同日下午，赫尔利将军与中共领袖举行第二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议中，多半时间是由赫尔利将军发表声明，我看他的目的是要表示美国政府真心诚意希望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次会议的经过情形和早上的会议不同。第一次会议由赫尔利将军扮演主角，第二次会议则由毛主席支配。

毛主席首先有礼貌地作了一番最简短的挖苦，接着就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他提出好多点指摘，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他宣称，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加以改组。毛强调，蒋委员长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崩溃。

毛坦率地宣称，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一百九十五万大军之中，七十七万九千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最近在所有对敌战役中，其余的兵士都逃跑了。他说，在另一方面，中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

对于共军应领取与国军相等兵饷与津贴之建议，毛指出国军每位兵士的兵饷只足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军兵士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强壮，而蒋军士兵却饿着肚子，衣衫褴褛，许多人羸弱多病，甚至短程行军都不行。

毛主席关于国军的一些说话，我是同意的。我知道他们所领取的贬值货币根本没有购买力，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人体必要的维他命尤其缺乏，而且他们的制服的质地甚差。我自己曾亲眼看过一些士兵走了短短一段路程之后，就倒下来死了。但是，我仍然以为，在会谈中过早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对他本身利益而言是一项错误，因为我感觉这种做法会使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党的运动产生偏见。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谈话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指出国军最近在缅甸北部和萨尔温江赢得几次重大胜利，为此目的不得不在事前由华中前线抽调兵员物资，结果在华中地区战事失利。他说，他感觉主席所说关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话，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分

裂的人所说的。赫尔利对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话作出反应之后，我感到毛有些震惊。但是，他犹豫片刻之后，就进行有力的反击。他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是罗斯福总统、邱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

毛否认他的言论有如中国之敌人的言论后，赫尔利将军的回答在我看来表现了充分的谈判技巧。显然他感到继续争辩毛对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抨击并没有好处。或者，他大概承认这位中共领袖的回答是有力的，于是他改变了语调。他说，他误解了主席谈话的意思，而且，他回答毛的一项具体询问，承认国民政府确有些贪污现象。

赫尔利将军明确表示承认毛真诚希望中国和平并且继续有效进行抗战之后，气氛澄清了不少。赫尔利将军接着声称，蒋委员长愿意在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立刻嘲笑这个建议，断然声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进一步说，它至少让中共一只脚踏进门来。毛加以反驳，说如果双手给人绑在背后，一只脚踏进门户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又说，中共在国民军事委员会占有一席，就能了解所有重要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毛再嘲笑这个建议，指出许多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军事行动毫不知情，而且整个委员会好久没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于是采取一个我认为是明智的步骤。他说：“主席，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邀请你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不公平，那么你在甚么条件下才愿意参加呢？”

赫尔利将军要求毛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毛表示他需要花一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和党的其他领袖讨论。他较早时已经在会议中声明，在不破坏抗日基地军队与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分歧。他建议下一次会议在次日下午举行，那时他会提出达成协议的建议。

9日早晨，我和赫尔利将军作了一次愉快的谈话，并且驾驶观察团的吉普车带他参观延安和郊外地区。下午我们再度会面时，中共代表把他们的建议递交赫尔利将军。

赫尔利将军念完了条件，接着这么说：“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以为它们还不足够。如果毛主席不反对的话，我想要加以详细研究，并且在明天早上提出一些建议。”中共代表听说赫尔利将军要研究各项建议以便扩大其范围，似乎吃了一惊，但是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宣布休会，并订次日早上开最后一次会议。

于是赫尔利把建议书带回寓所，重新加以修改，在11月10日早晨的最后会议上，才把经过修改的建议提出来。

这些条件后来称为中共之五点建议，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以便立即打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目前之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党与中立政治团体代表，实施新的民主政策，有效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之改革，同时国民军事委员会亦应改组成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包括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

三、联合国民政府将按照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国民政府将执行进步与民主之政策，确立公理、信仰自由、出

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向政府申诉之权利、申请人身保护令之权利与居住权利。联合国民政府之政策亦将保证免于恐惧之自由及不虞匮乏之自由。

四、所有抗日军队皆必须遵守并执行联合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将受到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承认。外国供应之物资将予以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政党之合法地位。

当赫尔利将军把以上条文拿给中共代表看时，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他们非常高兴。由于他们知道赫尔利将军在来延安之前曾与蒋委员长举行冗长的商讨，因此他们预料他会力求削弱他们的条件，却料想不到他居然会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在内。经过修改的条件在 11 月 10 日早上递交中共领袖之后，余下的会议好像联谊宴会，在座者皆大欢喜。只有观察团的一位指挥官讲了一句不开心的话，他说现在遗留下来的全部工作就是争取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件。

在会议上提出条件和接着下来的喜气洋洋的聚会花了很长的时间。时候不早了，我们来不及吃午餐，就准备去飞机场。正当我们要离开会议场所时，赫尔利将军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我们站在会堂外的美丽的灿烂的秋天阳光下，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和我应该签名，表示我们承认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以为这样做才妥当。”于是，他们把几份有关文件摆在一块不高不矮的扁平石头上，在上面签名。我清楚记得毛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文件上还特意留下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上蒋介石的姓名。如果蒋介石日后同意的话，就可以在文件上签名。

为了对赫尔利将军表示公平起见，我要在此提起一件事。正当他和毛准备签名的时候，他说：“毛主席，你当然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不能保证蒋委员长会接受它。”这时，周恩来提出一点警告，我认为是明智的警告，大意是说应该先把条件直接递交给蒋委员长，“不能先让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阅读。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将军所提的毛主席应亲自飞往重庆与蒋委员长讨论条件的建议，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陈家康（他曾担任与观察团联络的工作）将飞赴重庆。在赫尔利将军的建议之下，我也要随机前往重庆。后来蒋介石没有签字。

两次见到毛泽东

布 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前总统。1974年9月至1975年底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本文摘编自《布什自传》一书。

基辛格又来了。这位国务卿带着极为重要的使命，于1975年10月19日抵达北京，旨在为福特总统年底访华铺平道路。

10月21日的午餐上，毛的侄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蓉有所指地提到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恩在最近的访问中见到了毛。她接着说，那次会见是希恩特别要求的。基辛格心领神会，说道：“如果这是在问我是否想见主席的话，那么我要说，是。”

几小时之后，基辛格正在人民大会堂同邓、乔进行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会谈。我看到邓拿出一张上面写着几个中文大字的纸条看了一下，然后中断讨论，宣布道：“请你6点30分去见主席。”

毛住在一个环境幽静、专为高级官员设置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离人民大会堂不远。我们穿过一座精制的大门，驱车绕过一个湖，再经过几个院子便进入了他的住处。一个中国的电视摄制组正等在那里，他们随我们通过这座别墅的几个房间，一直走到毛的起居室。

毛当时81岁，坐在扶椅上。两位女服务员搀扶着他站了起来。这是我到中国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主席。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到他这种身体状况，我感到震惊。按等级顺序，基辛格最先被引见给毛。毛张开嘴巴，说欢迎他，但发出来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喉音而已。

我第二个被引见。从近处看，这位主席的身体状况似乎还好一些。他身材高大，面孔晒得黝黑，仍显得很强健，握手时非常有劲。他身着一套做工精致的、其式样以他名字命名的服装。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成千上万普通百姓穿的那种白塑料底的黑布鞋。

基辛格问他身体如何。毛用手指着他的头答道：“这个部分还灵。我能吃能睡。”他拍拍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停顿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总之，我感到不行了。”然后，他笑着说，“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

我坐在基辛格的左边，而他坐在毛的左边。环视四周，我发现墙上装有电视灯光。我们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法册子。房间另一头有几张桌子，上面放着形状各异的药瓶和一只小型氧气罐。

毛用一种哲学家的语气说道：“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说出这种话，真使人大吃一惊。

基辛格微笑着说：“别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无法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只好吃力地在一本便笺簿上写字，以让别人理解他的意思。他写完后，坐在边上的两位女士仔细看他写的字，设法理解他想说的话。毛写道：“我服从Doc-tor的命令。”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基辛格有博士头衔，而在英文中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

基辛格点点头，然后转了话题：“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毛的反应是，举起一只拳头，伸出另一只手的小指。他指着拳头说：“你们是这个。”又伸出小指说，“我们是这个。你们有原子弹，而我们没有。”由于

中国 10 多年前已有核武器，毛显然指美国在军事上比中国强大。

基辛格说：“但是中国说军事力量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毛把他的回答写在纸上，然后他的一位助手拿给我们看。写的是英文字：“yes”。

主席和国务卿还就台湾问题交换了意见。毛说这个问题可能要用“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我断定，中国人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让外国人知道他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在与急躁的西方人打交道时，他们把时间和耐心作为一种工具。

像邓和其他许多革命领导人一样，毛也来自农村，在外交会谈的正常进程中，经常用一些粗话。比如在谈论另一个话题时，他把美中关系中的某个特殊问题说成是比“放狗屁”还无关紧要。他的一位尽责的女翻译照译不误。这个词甚至在哈里·杜鲁门的粗话词汇中也找不到。

会谈还在继续，毛好像越来越健谈活跃。他频繁地做手势，头从这边转到那边，谈话使他变得兴奋激动起来。

当毛把温斯顿和我引入谈话时，会谈就要结束了。他对着我说：“这位大使的处境不佳，你为什么不来我这儿呢？”

我答道：“那我感到太荣幸了，但我担心您太忙。”

毛说：“嗨，我不忙。我不管国内的事，我只看国际新闻。你真的应该来看我。”

5 个星期之后，当福特总统正式访问北京时，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毛。那时，我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新职务已经公布。后来，我曾对联络处的专家们提到毛要我访问一事，我说自己想试一试，接受他的邀请。但他们认为主席的话仅仅是外交辞令而已，因此我没有再坚持。一年之后，毛去世了，巴巴拉和我再次访问中国。我对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提起了毛对我讲的那番话。

他对我说，“你应该按你的直觉行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主席无意的话，决不会发出这样的邀请。”

据布什在本书的另一处回忆，他在陪同福特总统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曾对布什说：“你高升了。”然后对福特说：“我们不希望他走。”

毛泽东使历史显得渺小

布 托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巴基斯坦前总统。本文是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所发表的声明。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还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毛泽东为日中复交作出伟大决断

田中角荣

接到具有数千年友好历史的邻国——中国的代表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感到不胜悲痛。

为结束日中两国间数十年的不幸历史，我曾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访问北京。日中复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业并不是事务性地就能解决的。为揭开日中永远和平的帷幕作出决断的，是新中国的八亿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我认为这是为日本、为中国、也是为全人类作出的伟大决断。

田中角荣，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本文是1976年9月9日田中角荣就毛泽东逝世向报界发表的谈话，选自《人民日报》。

毛泽东是谦逊善良的天才

卡尔森

卡尔森，美国前海军参赞。本文摘编自《毛泽东会见记》一书。

1938年一个晚上，王同志带我去见毛泽东，著名的中共领袖。毛氏白天睡觉，晚上工作。

在他的工作室里点着一根蜡烛，我一进去，就面对面碰上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的狮子般的头颅长在魁伟的身体上，巨大的头颅上的黑压压的头发从中间分开，蓬松地梳向后面，和善的眼睛仔细端详着我，他的容貌使人觉得他是个梦想者。

他脸上浮现微笑，和我热烈地紧紧地握手，以低沉的声调说：“我听说你随我们的军队到处走动，欢迎你来。”

暗淡的烛光映着室内极为简朴的陈设，全部家具就是一个炕、一张木桌、几只书架，毛本人的若有所思的神态，特别给室内增添一种超脱世俗的气氛。我们在桌子两旁坐下，毛氏低声呼唤窗外的卫兵端上茶和花生。

正是这位人物的思想为中国现代自由思想提供了根据，而他的组织才干也奠定今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础。他和朱德一道率领队伍走过六千英哩的艰险路途，终于抵达这较为安全的黄土山岳地区。而且，正是他的非凡的深思远见所创造的抗战方法，目前正在山西与河北卓有成效地抵销了日本所拥有的现代化战争武器的优势。

我们攀谈至深夜，谈到战争、欧美政治形势，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成功的世界机构的要素等等。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有稳健的实际的一面。

他说：“只要我们人民有忍受艰难困苦的意志，有继续抗战的决心，中国就不会打败。人民唯有对自己的领袖有信心，而且对比较美好的生活抱着希望，才能建立和维持战斗的意志。我们正努力提供这种必要的条件，训练领导者生活简朴、办事公正，认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我们相信，应该发扬民主，教育群众自己管理自己，才能过比较好的日子。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该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共产主义不是我们当前的目标，它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在这之前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他把一些细长的辛辣的中国黄烟丝塞进一只陈旧的烟斗里，于是我在脑中记下一件事：日后送他一支新的烟斗和一些美国烟草。

他继续说：“中国好比一加仑的水壶，日本好像倒进水壶的半品脱的水。日本军队走到一处，我们就走到另一处；当他们追逐我们，我们就跑回来。日本军队没有足够力量占领全中国，而且只要人民决心抗战下去，日本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控制中国。”

他补充说，日本在中国的战役缺少主攻方向。他们在这里进攻一下，又在那里进攻一下，一开始并没有集中强大的军力，后来的增援也是零零碎碎的。但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他们的军队对中国人民采取的态度。他们焚烧房屋，奸淫妇女，屠杀百姓，只能激起人民的公愤，加强人民抗战的决心。”

我问道：“中国共产党对于战后时期有甚么计划吗？”

毛的眼睛凝视空中，好像要穿透遮盖未来的云雾。他缓慢地回答：“我

们希望继续保持目前与国民党的和解关系，并且期望建立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主张由国家经营银行、矿山和交通事业，发展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我们也赞成鼓励私人企业。最后，我们觉得中国应该和那些愿意平等待我的国家建立和维持友好关系。”

这些的确都不是很激进的观点。中国政府已经全盘或局部拥有银行、矿山和交通事业，美国也有许多人觉得合作方法才是解决日益严重的劳资冲突的途径。至于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种思想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在美国官方各界中流传了。

我提起我曾听说的有关国际医院的纠纷，并且征询他的意见。

他缓和地微笑。“我们欢迎这些医院，也欢迎前来帮助我们的外国人，但许多外国人的毛病是很快就想要指挥别人。他们应该记住这是中国，虽然我们渴望接受他们的意见，但应该由我们来决定是否利用和怎样利用它。就以那些医院来说，外国医生要给其中的病人比较我们自己医院中的病人更好的治疗，这等于待遇不平等，这个问题一定要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是能够按照我们的方法解决的。”

毛氏偶而站起来，一面讲话，一面在室内踱方步，抽着烟斗或香烟。他的动作很文雅，即使从嘴里抽出烟斗的姿势也很优美。

谈到欧洲局势，我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

“不会”。毛氏断然说：“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她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

次年10月，毛氏的预见在慕尼黑得到证实。

他再谈到抗日问题，一面沉思一面说：“日本把我们包围在五台山，我们在这里受到包围。日本和中国都使用突出阵地战术、好像孙连仲在台儿庄所采用的一样。但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驻军来说吧！”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驻军的位置，其他四件东西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

“太原府东北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下的我军部队，西北有贺龙，西南有林彪，东南有朱德。”他调皮地笑着说：“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会受到我们其中“一支部队的打击。”

接着他补充说：“山西是华北的战略枢纽，五台山是山西的战略枢纽，只要我们占有五台山，日本就没法控制这个省份。”

他眼睛闪耀着光芒，发挥他的奇思异想，作出以下的结论：“另外一种包围方式就是美国、苏联与中同联合起来包围日本，那是一种国际的包围。”

我和毛道别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我在出发北上之前，再次和他见面，因为他曾答应考虑我提议的旅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谦逊的、善良的、孤独的天才的形象，他在这茫茫的黑夜中奋斗，为他的人民争取太平的日子与平等的生活。

毛泽东有一扇未开启的灵魂之窗

史沫特莱

在我 1937 年抵达延安并且会见朱德的同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我拜访了毛泽东。由于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在午夜去访问他。掀开一个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间一张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根长蜡烛，照耀着成堆的书籍和纸张，也照耀着上面的低矮的泥土天花板。隐约可见一个男人站立的身影，他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脸孔朝着门口，给阴影遮着。我看到一团黑色的衣物上覆盖着一件摊开的棉袄大衣。他站在泥土地面上的一块隆起地方，身材显得更高大。黑暗的洞窟中只点燃一根孤零零的蜡烛，使这里的景象具有一种阴沉的美，好像一张经久褪了色的古书。

那颀长的令人生畏的身影向我们蹒跚走来，用尖锐的声音欢迎我们。接着他的手紧握我的手，他的手像女性的手一般修长和灵敏。我们沉默地互相望着。他有黧黑的、讳莫如深的长形脸孔，宽阔高大的前额，和女性一般的嘴。不论他有甚么其他特点，他是个重视美感的人。我对他的女性气质和周围的阴暗气氛实在感到不悦，我力图克服这种感觉，连他接着讲甚么都听不清楚了。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作家。1929 年踏上中国土地。本文摘编自《毛泽东会见记》一书。

我现在铭记着毛泽东和我在以后几个月间所建立的珍贵友谊，它既证实了也否定了他的不可测知的个性。我起初强烈感到他身上所有的阴沉性格证明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独感。朱德受人爱戴，而毛泽东受人尊敬。最了解他的几个人都喜爱他，但他的精神是内向的，孤独的。

关于毛泽东有许多流传的故事，而且他和朱德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一样，多年来头颅上都悬着重赏。他没有朱德所有的谦卑。虽然他带着女子的气质，他却像骡子一样地顽强，在他的性格中贯穿着钢杆一般的自豪与决心。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会等待和观察多年，但最终达到目的。

……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却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多数中国共产党员的思想都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些人因懂得引经据典并且滔滔不绝讲三、四个钟头的理论而洋洋得意。毛氏也懂得这一套，却很少这么做。他在抗大的讲课以及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是根据中国的生活和历史。成百上千的奔赴延安的学生向来只从苏联或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几位作家吸取精神粮食，但毛氏对他们谈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祖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证《红楼梦》、《水浒传》这一类小说。他熟悉古代的诗，而他自己就是一位才气纵横的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伟大诗人的品质，但其中奔流着社会与个人思想的清泉。

他著了许多书和小册子，因此已经置身历史上伟大的革命政论家之列。他的《论持久战》、《战争的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里程碑，我在后来的岁月中曾在穷乡僻壤看到他的著作。

毛氏时常来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我们三人吃了简单的晚餐，就花几个钟头谈天说地。他未曾离开中国，因此问了成千个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学，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曾经爱上甚么男人，原因是甚么，爱情对我有甚么意义。有时他吟一段中国古诗，或者朗诵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是纪念他的第一位夫人。她因为是毛氏的夫人，被国民党杀害了。

他的幽默常常是讥讽严厉的，好像从精神孤独的深渊中发出来的。我的印象是有一扇通向他的灵魂的门户，但从未向谁启开过。

在会话方面，他和我一样糟。为了补助他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他也学唱英文歌，但他的嗓子是平板单调的，因此毫无成绩。由于自尊的关系，他不学跳舞，他身上也缺乏节奏感。

毛泽东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尼克松

1972年，在周恩来陪同我走进陈设着大批书籍的毛泽东的书房时，我想起了动身来北京之前几天在白宫一次晚餐上，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曾对我说：“您将与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面对死神的巨人。”毛泽东和我见面之后，我和他没有进行谈判，他是在试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试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观点是否和他的观点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国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国人变得软弱无力，以及我们在越南遇到的麻烦是否已使我们元气大伤。

他的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在我进屋时，他的秘书扶他站立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的话不能说得很清楚。后来周恩来告诉我，这是由于他患支气管炎之故。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病的后遗症。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但病容使他脸呈蜡色。他的脸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锐敏的。他的手看起来不像老人的手，并不僵硬，而且皮肤柔软。然而，由于年岁已高，他的精力显然不济了。原先中国方面安排我和毛泽东的会见仅约十五分钟。后来由于毛泽东被我们讨论的话题吸引住了，一直谈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由于毛泽东开始感到疲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美国前总统。曾于1972年首次访问中国。本文摘编自《领袖们》一书。倦，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看表。

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很明显的。周恩来的外貌、言行和举止，表现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养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泽东则是一位健壮的、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国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认为领袖。周恩来则是最高的行政官员。

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赅，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要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小型的会议上会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说家这样做，那只能招致失败。

即使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他开怀大笑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站在右的一边，还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随便说出了戴高乐的名字。毛泽东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另外一回事。”他接着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的。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在谈到我们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时，我把话题扭了回来，说：“我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点是：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说说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常用自谦之词来委婉他说明他的观点。我和毛泽东开始会谈之前，当摄影师在拍照时，我们进行着轻松的交谈。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他的学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回答说，“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我说：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道：“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

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我们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必须牢记：他们是对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坚信不疑、并愿意为之而战斗甚至牺牲的革命者。假如我在回答毛泽东时强调需要和平和友谊，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认为我们是一群傻瓜。最后，他们会说：如果和平是你们的唯一目的，那好吧，只要你们什么时候投降，什么时候就可以得到和平。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人重申：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利益而斗争。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邱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毛泽东比西方领导人更平等待人 西哈努克

当我 1956 年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同毛主席会见了好几次，而从那以后的每次访问都是如此。他总有时间接见我，而且我们每次的谈话从未少过一个小时。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我认为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接见我，而且每次会见时间又如此之长，恰好是中国对较小的国家感兴趣并且对它们尊重的象征。这总使我感到，具有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比社会背景和形式上的思想标签重要得多。我很快就对毛主席有了好感，他对我也这样，这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慢慢感到他对我有了比较深的感情，就像我对他那样。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见我时就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重点讲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的问题。他说，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毛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一直履行了它的诺言。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我到达后不久就在主席官邸接见了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亲王。前国家元首。本文摘编自《西哈努克回忆录》一书。我。那时北京天气很热，我们第二天就在游泳池旁边搭的一个帐篷下继续我们的谈话。后来又沿海滨避暑胜地继续我们的会谈。赫鲁晓夫几个星期之前也访问了北京。毛主席的一个侍从人员对我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我是唯一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主席见过那么多次面的政治家。周恩来总理亲自陪送我到海滨避暑地。

难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洗我的脑筋？对这类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毛主席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同邻国的关系、我们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是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他也很想了解我这个人性格和动机。很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爱国的亲王的形象引起了他的兴趣。不过，从我们一开始有交往起他就很认真地对待我。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

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我们保持中立作了对比，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让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把这些人当作炮灰……

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咄咄逼人。他们从未说过：独立嘛当然可以，不过它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嘛当然也可以，但它必须是“左派的”中立。只要独立和中立就行了，不用附带任何条件，对柬埔寨是这样，对整个东南亚也是这样。毛主席或周总理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

“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西方领导人及其在亚洲的仆从们则总要对我来这一套。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并且通常先加上这么一段话：“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可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我们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更有效的帮助。”

我们得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施加这类压力。我们经常从西方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而中国领导人则从来不主动地这样做。要是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时加上以下的保留：“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种办法对你们也适用。”

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柯西金总理那热情支持的表示声犹在耳，我曾天真地设想抵抗政府可以在国外有两个中心。如果中国人同意的话，一个中心设在北京，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距离我国比较近并与北越接壤，而我们又必须依赖北越来转运供应品。另一个中心设在莫斯科，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由于莫斯科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接触比较多，所以它在这方面是个很理想的地点。我则打算在这两个首都各住一半时间。可是后来莫斯科不愿意再见到我。苏联政府宁可同朗诺保持关系。……

那么，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的手段，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樣的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

当我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记记账。可是军火除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援助，也同物质援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

中国政府把整个外交部腾了出来——该部原来设在那个漂亮且宽敞的前法国大使馆里——把它移交给一个“被废黜了”的国家元首和他的随行人员作为住宅，还说，只要我住在那里，它就是柬埔寨王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甚至在我们组织起一支抵抗部队之前就把另外一个新建的重要建筑群的一翼拨给我们的抵抗政府使用。一切便利与设备，从临时的文书工作人员（在我们能从国外争取到支持我们事业的爱国人士来充任之前）到一支汽车队和日用必需品都是他们提供的，而且总使我们感到我们接受它们是帮了他们忙似的。

在1970年5月1日与毛主席会见时，我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他回答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从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向我们多要求一些”。“让我们为你

多做点事”。“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那么坦率，那么豪爽，而巨总是想得出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毛主席在同我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有一次他曾说：“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不怕把你所想的都讲出来。”在我们友谊的很早阶段，我就清楚地认识到，他喜欢同反对他的某些想法的人谈话。在一次闲谈之后，他曾经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

他大笑说，“你很聪明”，他又说，“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我说，“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

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的确，对我来说这些著作要比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容易懂一些。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读过马克思的某些选集，读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太武断，而且事物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写的东西总是会站得住的。他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他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的哲学味道比政治味道更浓，同佛教人性理论的最精华部分没有什么矛盾。我觉得他的思想在日后好几代人里还会是适用的。

我还发现毛的军事思想非常有意思。就像希诺芬和其他希腊经典战略家所写的东西至今还站得住一样，我相信毛的著作也同样会站得住，因为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他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

像戴高乐一样，毛的记忆力是非凡的。在我们1970年5月1日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我1956年、1958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所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我的原话，并且问我当时的看法如何。谈话都一一记在他脑子里了，随时他都可以引用。他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到了使我吃惊的程度。

我感到十分惊奇地听到他说起，“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他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就是5月1日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而这时大家都在等候毛主席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后来我才知道，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们当时都在纷纷揣测，以为推迟放焰火可能是由于毛主席的健康情况所致。

他重复说道，“他们因为你开了一家赌场为国家筹款而谴责你。看看朗诺从尼克松那里拿到了成亿的美元，他又在那里干些什么！他手里美元可多啦，可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在受苦。开家赌场说什么也比接受美国援助强。”他对于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真使我感到惊讶。这原本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那些大喊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凶的人，恰恰都是

些腐化透顶的家伙。但是毛主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那是为了把赌博和腐化的部分不义之财交给国库。

有个官员走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主席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他继续问我有关柬埔寨的问题，问起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人品如何等等。虽然施里玛达当过驻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七个月之前也会见过朗诺，但毛主席对这两个3月18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之久。而在二十四小时之前，美国和西贡军队正好大举入侵柬埔寨。在不到三个星期之后，毛主席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询问我这么久啊！

按原定时间，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破例地等候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面情况，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

除夕夜晚见到毛泽东

朱 莉

一位态度安详而健谈的老人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本文原载《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1975年12月31日，即除夕的那个夜晚，在中国九亿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跟前，我和我的丈夫看着时钟走过十二点，迎来了1976年。我们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标志着他生命中的最后的一个新年，也标志着我们所经历的最不平凡的时刻之一。在紫禁城的深处，在他的书房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神明般的人物，而是一位态度安详而健谈的老人。那天夜间特别冷，戴维和我两个人坐在一辆中国造的大型黑色轿车的后座上，我们从一个有人民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检查站进入紫禁城。突然间，我们在黑暗中看到面前有一个巨大的深红色的标语牌，大约六英尺高，被灯光照得通亮。标语牌上用毛主席的书法写着他的指示：“为人民服务”。我们迅速向左转到通向毛主席的住所的那条蜿蜒的湖边道路上。后来，当我们看到一份关于我们同毛谈话的中国报纸的剪报时，我才认识到那块标语牌被灯光照得通亮是为了让电视摄影机把我们的汽车到达时的情景拍下来。主席屋前也被照得通亮，以便拍电视。从夜晚的黑暗中走进强烈的灯光下的时候，我感到晕头转向，只能依稀辨认出这所占地面积不大的住所的轮廓。

但是我之所以感到晕头转向，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已经夜深和突然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来到强烈的灯光下，还由于我对这个微妙的、有双重意义的世界感到陌生，我对即将会见这样一位人物的确肃然生畏，因为据人民共和国发给旅游者的“正式的”历史材料中说，这位人物曾使中国人“在各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

走上前来正式把我们迎接到毛的住宅的是中国礼宾司的官员。他连忙把我们从入口处的小小的接待区引进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的光线的唯一来源是前边的一个敞开的门。这间光线很暗的屋子有几把椅子和一张乒乓球台子。我们通过门口可以看到毛的书房。当我们跨过门槛时，我们看到主席在屋子的那一头。他坐在一把大安乐椅上，其他六把同样的椅子以这把安乐椅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圆形。在两位穿着同样灰色毛式服装的年轻女服务员的搀扶下，他费力地站了起来。他身子摇晃了一下，然后那两位女服务员便退到后边去了，他独自站着。

礼宾司官员向我示意，让我坐在主席旁边的一个位子上。在这次会见之前，两天来，接连听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以及党的干部和外交部人员长篇大论的讲话之后，我预料毛主席也会向我说教，当然不会进行一次交谈。因此，我思想上是轻松的，我开始全神贯注地看那间陈设简单的屋子里的一切摆设——高达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书和卷轴；奇特的六英尺高的落地灯，灯光强烈到足以拍电视；装在听筒里的熊猫牌香烟；盛着绿茶的精致的茶杯；摆在大安乐椅之间的桌子上的热毛巾。我对每张桌子底下放的白痰盂最感兴趣。我聚精会神地看这些摆设，并等着听他讲话，因为尽管我渴望会见他，可又不好意思仔细去端详他。一来到他的面前，我就感到去凝视这位

82岁有着那样一番经历的老人，是对他的不恭。

在我们会晤前的两天，我们曾同毛的翻译唐闻生呆在一起。这时她坐在主席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显得泰然自若。为了弄清毛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她常常同坐在她后边的直背椅子上的其他两位翻译交换意见。在她们迅速交换意见之后，她还把主席的话再向他重复一遍。如果把他的想法的确切含意领会错了，毛会显得失望，然后咕咕哝哝地加以纠正，并用手指头敲唐闻生的笔记本。

“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直到我父亲的信译出后，我才认识到毛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局势，尽管看来患过的中风已使他的嘴有一部分麻痹了。看来他对我父亲以个人名义写给他的信感到很高兴。他对我说：“欢迎尼克松先生到中国来。”然后，他从唐闻生的手中把信拿过去。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上端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在信译出之后，毛对我说，当时我坐着的椅子正是大约四年前我父亲访问中国时所坐的那把。于是，我从扶手椅站起来并对主席说，我想同戴维交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他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当我们迅速掉换座位的时候，主席爽朗地大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于是戴维大谈起静脉曲张造成的影响。当我看到毛凝视前方而不是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感到局促不安，以为戴维可能讲的太冗长烦琐了。但是随着会见继续进行下去，我发现毛很少朝我们这边看，他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他翻译的人身上。

房间里的气氛是热烈、友好的。我把黄大使的夫人当天晚上赠给我的一枚上面有主席侧面像的小圆像章拿给主席看。虽然毛见过千百万男男女女佩戴类似的像章，但是他的反应却是像孩子般地高兴，并且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也许是由于年迈，并且身体有病，起居上大多需要依靠旁人照顾，所以毛的举止出人意料的温和。他不装腔作势。他在谈到将于新年发表的一首讲斗争的诗的时候非常谦虚。他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在一九六五年写的。”我禁不住把他的态度同我见过的其他权力很大的独裁者的态度相比。我特别想到了俄国的勃列日涅夫和希腊的帕帕佐普洛斯。勃列日涅夫往往傲慢地、像搞阴谋似地低声说话，听者不得不仔细倾听每个字；他还喜欢在听到人们说起什么时报以微笑。帕帕佐普洛斯则总是在一间长六十英尺、宽三十英尺的房间里接见客人，他自己坐在一张堡垒般的硕大无比的桌子后面，让客人坐在一些矮小的椅子上，以便他们能够毕恭毕敬地听他讲话，此情此景很像电影里的一个带有夸张味道的场面。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毛和唐闻生之间的关系犹如祖父和孙女。黄镇大使看来很轻松。

到了将近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我两次起身准备告辞，因为我不能不理睬坐在房间另一边的外交部长作出的表示。他轻轻地叩叩他的手表，提醒我时间很不早了。但是主席两次提出异议，他向我们摆摆双手，要我们再坐一阵。

“很可能要斗二三十年”

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位不伪称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完美社会的人。实际上，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听出，他对他本国人民、尤其是没有受过考验的青年一代，抱着怀疑态度，并感到失望。

“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

这位主席对我们说：“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自从我们进入他的房间以来，他第一次变得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使劲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然后他突然问道：“你们怎么看？”

这番交谈是这样出人预料地开始的，以致我和戴维都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是的……”我们俩的声音深沉地此应彼合。接着是一片沉寂，毛等着我们再说下去。最后主席又说话了。“很可能要斗二三十年。”

在毛泽东谈到斗争时，我坚决相信，尽管这位主席经过 82 年的艰苦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仿佛是在回答他经常在自己心里提出的一个问题似的，讲了他是如何处理过去反对过他的革命斗争的人的。“我们并不可怕。我们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如果他们认识了错误，就可以官复原职。”接着，仿佛是要来自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国家的两位美国人同意他的话似的，他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不杀人”。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又说：“前几天我们刚赦免了一些国民党人员。”他指的是释放了几名在内战期间同共产党作战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人。我们认识到，毛热切地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

当我们打算同毛告辞的时候，他把双臂用力地放在座椅的扶手上，强调地对我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口气坚定而有决心。

毛在晚年也许开始意识到历史以及他在其中的位置。我们觉得他是这样的。在深夜同他会见，不可避免地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他是一个在离群独处的时候也安静不下来的人。他并没有向我们说出他在生命的尽头所感到的种种憾事和视为满意的事情。尽管如此，他那羸弱的体质的痛苦表现使我们沉痛地回想起我们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临终之前和他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们坐在他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的病床旁边的时候，使我们强烈地想到我们的青春年华，我们前面的种种机会以及我们还要行走的路程。这也使我们想到我们是在何等漫不经心地生活，并且想到这么随随便便地过活可能失掉和浪费多少时光。

我们在毛的面前也体验到同样的感情。毛主席被疾病折磨得眉蹙嘴歪，而且是精疲力尽了。然而，每当我们作出要告辞的表示，他都要我们留下来。最后，在外交部长领我们走向门口的时候，毛同我们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在两年多来没有对任何来宾作出的一种姿态——我们一行人感到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种姿态。

我在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感到悲伤。他说：“你们是年青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十年以后它将是不起飞的。”他不再对我们微笑了。两个护士站在他的两旁搀扶着他。当我们消逝在另一个房间的黑影之中的时候，他两次向我们挥手。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巨大的动乱和变化、死亡和天翻地覆。但是，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我总是觉得，当我们向毛告别的时候，他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向我们赠言，就像老年人向青年人提出劝告一样。如果他真的惠以赠言的话，我相信他的话将是他所不断重复的、的确已成了他的一生的节奏的言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泽东大惑不解：“对称何以那么重要？”

李政道

“对称何以那么重要？”毛泽东主席非常认真地问。那是1974年5月30日，当时正是“四人帮”权力鼎盛时期，中国大地陷在“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我生在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并受到了大部分教育。面对当时的形势，我满怀忧伤，渴望有一种力量能改观它，尽管多么微不足道。

那天清晨6点左右，我正在北京饭店，房中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有人告诉我，一个小时后，毛泽东主席希望在中南海见到我。令我惊讶的是，毛泽东一见到我，竟直言问起物理学上的对称问题。

根据韦伯氏大辞典，对称指“平衡的各个部分”，或者指平衡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形式美。在中文中，对称的涵义几乎相同。对称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社会进化是以革命（变化）为基础的，它是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这才是唯一根本的因素。毛泽东坚信他的思想在自然界也是绝对真理，但对称却在物理学上占据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毛因此大惑不解。李政道，华裔美籍物理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本文原载1988年《科学博览》。解。

在会晤中，我是唯一的客人。我们之间摆着一张小平台桌，上面放着一叠纸、几根铅笔和两杯绿茶。我拿起一根铅笔放到纸上，用手指朝毛的方向弹去，随即再把铅笔往回弹了一下。铅笔滚向一端，又滚了回来。接着，我指出这个过程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在整体上它具有对称性。毛泽东很欣赏这个实验演示，于是他想知道对称的深层意义，仅以对称原理为基础，真的能够表达宇宙法则吗？我解释了一下广义相对论的结果，它是爱因斯坦用平衡原理为必要条件，以对称为基础而创立的。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的对称，以及由此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对称的美如此简单，其结果又具有极其深远的普遍性，毛泽东似乎陷入沉思。他说非常遗憾，没有时间去研究科学。但毛泽东仍回忆起年轻时读过的一些科学书籍，如生物学家J·亚瑟·托马斯的著作，当时他入了迷。

我们的话题由自然界转到了人类社会。我强调教育、创造性和社会昌盛是不可分割的，最后毛泽东接受了我的提议，认为中国应加强教育。这次会谈直接导致4年后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这是为早慧少年直接入大学深造的项目。

面对“文化革命”造成的混乱世局，尽管这次会晤起到安定的作用微不足道。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或许点明了一种相关性，即人类探索自然界对称的内在冲动和建设一个美好的、稳定的社会的欲望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天，在机场上，我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一份告别礼：一套1922年出版的J·亚瑟·托马斯的原著——《科学概论》。

与毛泽东的会见

希 尔

我曾应毛泽东先生的邀请偕同我夫人访问过中国。我们在中国过了两个月，看到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进步。

我曾两次见过这位伟人。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作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发行。

第二次会见是在他的家里，我是上午十一点整到达的。当我下汽车时他就上前来迎接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您夫人怎么没有来？我回答说：她早晨起来时觉得有点感冒，天又在下雨，我让她留在饭店里了。

这次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他亲手递茶和递面包。

后来他问我有关墨西哥和墨西哥革命的一些问题，我对他说，我们的革命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以完全墨西哥的哲学为指导的。

我对他说，我们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几乎三千公里的边界，我们遭受过三次入侵，在第一次入侵中失去了我们一半以上的领土。

埃米略·波尔特斯·希尔，墨西哥前总统，本文原载 1976 年《墨西哥先驱报》。

美国政府企图使我们不在宪法中写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最进步的原则。但是它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们继续进行会谈，他给我描述了如何开始反对英国、日本、法国和其他强占中国的帝国主义的斗争。

我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题为《中国》的书，这本书广为发行，包括在中国本土上。

当我回到饭店时，我看到有位医生在那里，他是毛先生派来给我夫人看病的。

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毛泽东处在中国一切事务的中心

希 思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成立以来，毛泽东一直处在一切事务的中心。亿万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他和周恩来在同一年去世，必将在全中国留下深切的若有所失之感。

令人愉快的人

当我 1974 年 6 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

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

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

那一次，以及 1975 年 9 月的那一次，我们都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英国前首相。本文原载 1976 年英国《每日电讯报》。阅的文件。

谈话是从不停顿的，因为他的两名译员几乎是在同声翻译。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民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他们对他的忠心正是由此产生的。

从我同他进行过的两次长谈中，我感到他对中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的。和我与之进行过讨论或谈判的许多世界性人物不同，他的看法极为明确，表达看法也直截了当。

他从不生硬地顶回我问的问题，也不回避任何问题。如果我问他一个他不想谈及的问题，他就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不想谈。

当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发生分歧时，他就说，现在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并要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考虑进去。

深思熟虑

关于我们讨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以及同我们两国中的一国有有关的问题——我觉得他都是表达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与同事们进行磋商之后产生的看法。

我感到，他们是成夜成夜地坐在桌旁，把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辩论清楚。

确实，一位官员曾对我说，中国领导人在长征期间就养成了夜间辩论的习惯，现在简直无法使他们改掉这个习惯。

由于部长们常常是在深夜作出决定，官员们就只好在白天工作了。

这种把每个问题都讨论透彻直到取得一致的过程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在讨论中表现了一种别的国家少有的做法上的一致。

不仅如此，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那种把领导人同外宾会谈的记录拿来

传阅的制度是我在各地所遇到过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每个人都充分了解到最新情况。对于中国国内问题，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八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十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

这些都是基本生活需要，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能否取得成功——实际上是政权能否延续下去——取决于能否比在他所废除的封建主义制度下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

“这种进步太慢了”

可是他对这一点也是抱现实态度的。一年前，我周游了那个国家——先是到西部，然后到南方接近缅甸边界的地方，最后是到东海岸——以后，把我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说：“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你一定不要全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能骗的就骗。”

“我们有了进步，但实事求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

这确实是他的问题，也将是他的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这种势头继续下去。

毛泽东的红书里的思想为的是使全国人民产生一种心情去作出更大的努力，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农业生产，因为中国的前途有赖于此。

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

他担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终将发生冲突。他唯恐赫尔辛基会议表明西方在苏联的力量面前软了下来，并问及美国是否继续具有保住它自己的地位和西方的地位所必需的意志。

称赞英国人

在他的世界战略的见解中，他赞成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欧洲，这显然是因为这是合乎中国的利益的，但也因为他不希望看到苏联的影响扩大到我们欧洲。

他在许多方面称赞英国人。我上次见到他时他说，如果发生冲突，当然英国人会再次坚持到底的。

他很高兴的是，在我当首相的时候，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也很高兴我使英国参加了欧洲共同体。

他还认为，保守党政府对苏联是坚定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表明，英国人不会听任何人的摆布。

毛泽东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

孚尔

在会见毛泽东主席之前，总有连续多次的预先通知，使我联想起法国内阁危机之际受召前往爱丽舍宫的情形。星期三晚上，吴茅山先生（译音）邀请我们进晚餐，他告诉我说，主席一定会在次日接见我。我立即询问，把原本安排在次日的游览长城节目加以取消，是否比较恰当。同桌的客人听了，都坦然觉得好笑。主席其实不会在早晨接见我，也不会下午接见我。他是惯于夜间工作的人。法兰克·哈里斯曾在清晨六时受克鲁格总统召见，而我这次决不会碰上这种难堪的情形。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安排早上游览长城，晚上会见主席，这是再恰当不过了。

下午5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见我们的证实消息，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为准备周全起见，当晚本来要在旅馆外吃晚餐，我们决定改为在旅馆内进餐。我们在晚餐时又遇见优秀的法文通译员罗大康先生（译音）和他的担任法文教师的夫人。罗大康夫妇两人曾在法国蒙巴纳斯区居住多年，两人都全心全意献身中国社会，政府允许罗大康先生解除教师职务，专心从事翻译法国名著工作。

晚上9时，贾先生正式来到小餐厅，请我们在9时50分准孚尔，法国前总理。1955年曾访问中国。本文摘编自《毛泽东会见记》一书。备出发。时间到了，我们在大厅里集合，吴茅山先生不断看着手表，说再过几分钟就要出发了。为甚么需要这么准确地遵守时间，过一会儿我就明白了。

我们再次进入主席居住的地区，这次我们经过一道美丽的红色城门，它实际上常称为“新华门”。我只看到两名卫兵站岗。

汽车在南海边沿的垂柳夹道的路上行驶。

中国式的小院子，两棵紫荆，还有盛开的山楂花……主席走上前来在石阶下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我当时明白了严格遵守约会时间的理由，主席因此才能够对我们表示这么细致的礼貌。

毛泽东的容貌不若他最近一张照片那样年轻，那样丰满，那样柔和。他的身材魁伟，精力充沛，（他在63岁时游过长江，全程超过12哩）。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写到这里，就想起前几天某报有一位主要专栏作家，形容毛泽东年老体衰，患上某种怪疾，简直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想到这些话就觉得可笑。

住宅一半像小宫殿，一半像平房。我们走进一间偌大的客厅，霓虹泛光灯和中国式吊灯一齐照耀，木雕装饰物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客厅一旁有一张铺着红布的会议桌，另一旁是排成半圆形的一列扶手椅，我们就在这里坐下来。周恩来总理亦在座，还有张奚若先生、吴茅山先生，自然还有董先生（担任翻译员）。茶几上摆着绘上蓝色中文字的美丽瓷茶壶，所斟的茶不是普通的茉莉花茶，而是杭州的特产的一种长叶茶。

毛笑着说：“你们的代表团很小，只有两个人，意见比较容易一致。”

接着，他特地为了我曾接见中国青年代表团而亲自向我道谢。

周恩来总理和主席比较起来，神情比过去显得更加调皮。他能够比别人先听明白我的说话，而且显然对此感觉有趣，同时他也很注意董先生的翻译

有甚么错误，以便纠正它。他已经预先知道我的谈话题目，有了这个有利条件，他就能协助我说明我的一些观点，但同时却很清楚表明他并不同意。

毛主席以抑制的感情谈起中国，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心。

“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

我提起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

“是，没错，但比较起来成绩还是很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他稍微垂着头，好像是承受着命运的沉重力量。他合拢着双手。有人曾说毛泽东身上兼有军人和农民的气质。

我说，由于他没有教条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因此而得益，他的一些灵活的方式，例如混合经济的方法，应该是有前途的吧？

“这大概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主席一向对农业经济很关注，他要求我对他说明法国的农产品合作社制度。我强调在这项制度下取得了非常优越的成绩。他摇摇头，同时表示赞同和否定。

“它在此行不通，农民的土地太少了，不可能划分为合作社经营和私人经营。”

你们预期“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有甚么结果呢？我告诉主席，我们对这些运动深感兴趣，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些运动从一个很不同的角度上表现出了“自由化”倾向。

“是，一定要容许批评；否则，就会造成对问题不理解和愤愤不平的聚点。应该允许人们说出他们心中的话。”

他证实两个运动是互相联系的，而且受同一个思想倾向引导。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必须遵守一定的限制。”

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和语调，使我自己早已持有的见解更为深信不疑。这两个运动的确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如果从西方的角度出发，把它们视为重大的转折点，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并未超越共产制度的诸种限制，但我们再次回到毛泽东一向主张的中间路线：谨慎处理党外人士，把全国各阶层都容纳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之下，教育共产党员并使他们也明白这种目标。

主席又一次提到“洗脑”，但这个名词并没有我们西方人士所赋予的轻蔑含意。这个名词暗示，目前的运动对于共产党员是一个教育运动，而对于一些其他人士（也许我们可称之为实际上的反对派）则是为了“治病救人”。

问题主要是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士倾吐他们的不满，让他们畅所欲言。

这种做法本身就可视为一种成绩，一种对病人的良好治疗，而且通过这种做法可以进行鉴别，无论意见是如何的强烈，都可以从不满和保留的意见之中区分出甚么是合理的，甚么是可以容许的。反之，倘若出现真正的偏差——不属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预料它很容易就会被孤立，而且通过目前已经展开的反击，把它有力地镇压下去。

毛泽东喜欢讲寓言，他引用了一则寓言说明最近的外交事态。

“中国有一则《鹬蚌相争》的寓言。鹬在海滩上啄起一只蚌，但是蚌也紧夹住鹬的嘴。他们开始争论不休。蚌对鹬说，你会在三天之内死去。鹬也对蚌说，你没水喝，也会在三天之内死去。双方都不肯让步，这时渔夫经过，就把鹬蚌都捕捉去了。”

“他是俄国渔夫或者美国渔夫？”

他微笑作出我意料之中的回答：

“在我看来，他可能多半是美国渔夫。”正是美国人使中国感到不安。

“他们为甚么要在我国领土邻近建立基地？我们并没有在美洲附近建立中国基地。”

“你的确认为美国人想要战争吗？”

“美国人民当然不要战争。”

我说：“美国领袖也不要战争。”我告诉他，1955年举行日内瓦会议的一星期内，我每天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见面，因此对他的深切和平愿望深信不疑。我曾经承蒙中国领袖承认我个人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因此我希望他们注意这个证据。

我补充说，如果和缓的政策过去曾有一些进展，而目前已受到阻碍，那么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是不能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领袖的。我设法使他了解法国人民对匈牙利事件的情绪和反感。我的见解似乎触痛了主席的情感。

他立即问我：“你是否说，法国人民由于这些事件而对中国怀恨在心？”

“当然不是，中国不牵涉在内，但人们总是喜欢按照集团、集团政策和‘共产集团’的概念思考问题。”

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对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之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全部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毫无疑问，“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苏联表同情”，但主席拒绝接受“共产集团”的概念。

他说：“你们不能和纳赛尔取得谅解，而他并非社会主义者。那么，你们还担心甚么呢？只有四分之一人类属于社会主义，其他的四分之三，包括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实行你们的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进行和平的竞争和比较。”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应对未来绝望。毛泽东主席在谈话中附带提起我对禁止核子试验的态度，于是我再一次对着周恩来说明我对裁军的见解，即把裁减军备所得款项拨为援助落后国家基金。

毛泽东说：“法国可以再负起调解的任务……法国有光荣的历史，她一定会克服目前的困难。这个任务属于法国而不属于中国，因为法国较有资格担当这个任务。”

他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的礼貌，这是带着自豪感的一种礼貌。正因为中国已经取得了如此惊人的进步，她才能强调她的缺点，她的落后和陈旧的一面。

我们在离开以前，和主席谈起他的诗。

“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党的教条和辩证法的词藻所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

解的，也是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主席陪伴我们走向等待我们的汽车。他扶着我的手，指出黑暗中的一道石级。我透过车窗，最后一次看他的容貌——在哗叽紧身服装的紧扣颈领上，是他的为人熟悉的脸庞，他举起手来表现一种慰问的姿态，给我留下力量、自然和威严的印象。

毛泽东的业绩铭刻在朝鲜人民心里

金日成

金日成，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前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主席。本文摘自 1976 年 9 月 9 日金日成悼念毛泽东的唁电，原载 1976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从早期走上革命斗争道路起一直到今天，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伟大的业绩。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整个斗争历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同志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积极支持和声援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自由、解放、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同志一向把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斗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诚心诚意地支援我们，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

在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阻挠，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用鲜血援助了我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毛泽东同志为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的心里。

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 施拉姆

斯图尔特·R·施拉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本文根据编者 1989 年 5 月访问施拉姆的座谈记录整理。

编者：施拉姆教授，您的《毛泽东》一书，自 1987 年在中国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发行了几十万册，成为外国人研究毛泽东在中国的第一本畅销书。

施拉姆：我的《毛泽东》那本书是二十年前写的，不一定代表我现在的观点。我现在的观点并非与以前的完全不同，但确有些区别。《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现正在翻译，准备出版。这本书我修改了四次，比较地能够反映我现在的观点。我现在写了一篇文章，叫《党的领袖或者君主》，谈到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你们要了解我最近关于毛泽东个人的观点，也应该看这一篇。我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毛泽东个人的权威，领导作风及其结果，写的比较具体，都谈到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性格、行为等。最近也准备在中国翻译出版。

编者：《毛泽东》是您过去二十年前的观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党的领袖或者君主》都没有翻译过来，所以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现在对毛泽东是如何评价的。

施拉姆：我最近的观点是：毛泽东这个人是不容易评价的。有一个湖南人给我写信说，他好几年研究毛泽东（我不晓得他在长沙是干什么的），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是一个既伟大又很复杂的人物。这句话我认为很对。毛泽东确实伟大，他领导你们党、领导你们人民胜利了，建了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的后半生，特别是最后二十年左右，很复杂，这个问题现在不容易一下子谈清楚。你们中国人了解毛泽东，比美国人了解的多，不过完全了解这个人恐怕也很不容易。

编者：我们认为，毛泽东不仅在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世界也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请问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施拉姆：二十年前，在美国有一股毛泽东热，学生要造反，他们认为请他们造反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领袖，是最伟大的人。在学者当中，有一批人认为苏联不行，斯大林不行，毛泽东是真正的民族的有创造性的革命者，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但后来他们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乱子那么大，打死的人那么多，大跃进饿死的人也很多，他们对毛泽东的热情就不那么高了。还有一大批人认为，毛泽东不完全是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以为他和斯大林一样，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是一个可怕而又不可爱的伟大人物。当然，毛泽东请尼克松到中国，并且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认为这是晚年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做的一件好事，在美国有大批人也持这种观点。

1979 年以后，毛泽东的活动在美国影响不太大。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学生、学者、舆论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尤其是邓小平。

编者：我们国内有人说，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相对来讲有三多，即研究毛泽东的多，孙中山的多，康有为的多。在这三人当中又属研究毛泽东的最多。

施拉姆：不能说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人最多。研究梁启超的书比康有为的书多三倍，比较重要的有五六本。关于康有为，比较重要的有一两本。他们

也研究严复。严复是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改革派，对西方了解的比较多。研究谭嗣同，所见的有两本书。关于蒋介石的有几本，阎锡山的有两三本，冯玉祥的有一两本。另外，也有研究梁漱溟的。西方学者并不以为写中国历史就是写一本毛泽东传，或者写一本孙中山传就完了。对毛泽东的评价，现在在学者里面否定毛的多一点，他们都知道大跃进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后果等。

40年代以来，一般地说，美国学者对蒋介石评价并不高，认为国民党是腐朽的、无用的。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美国舆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毛泽东历来提倡中国不做苏联的傀儡，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是美国舆论所肯定的。不能说现在苏联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戈尔巴乔夫要来华，美国就要反对。这说明国际关系进入新的时代（中东问题除外）。现在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也比较好。

毛泽东是中国的核心和发动机

施特劳斯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任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本文原载1976年西德《巴伐利亚信使报》。

如果人们把他看作是新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缔造者，那么这种评价不算太高。毛泽东把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动乱不安、饱尝最严酷战争、灾难深重的中国引进了新的时代。

他是一位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和诗人，他的著作已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实践。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样一位伟人，必须强调指出他的三大功绩。毛泽东成功地把他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为外国列强所左右的国家，不仅从政治上统一了起来，而且还使它摆脱了饥饿。我在1975年1月访问中国时就能断定这一点。人们都有房子住，丰衣足食。如果人们把这些情况同过去的情况作一比较，这确实是一项很大的成就；尽管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我们自由的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但也必须承认这一成就。

毛泽东的第二大功绩是通过按照他的设想改造中国的政策消灭了瘟疫和流行病——如果人们回想一下以前几十年的痛苦情景，那么这同样也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而他最大的功绩无疑是，他通过以他本人为象征的政策和学说，使八亿人民又获得了在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

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可以输入欧洲的商品；反之，我们欧洲世界也不是可向今天有着许多问题要解决的中国输出的货物。但可以肯定地说，毛的逝世在八亿人中之所以引起震惊，尤其是因为那里的人们不光是意识到这位重要人物的思想所赋予他们的使命，而且他们知道，在他领导下，他们的个人生活比以往那种兵荒马乱时期都要好。

我今天之所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人格，首先是因为北京领导人关于德意志是一个民族的主张现在还使我记忆犹新，北京领导人还提醒和警告我们要克服欧洲的分裂，提醒欧洲人要从最切身的利益出发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欧洲组织，这些提醒和警告同样使我难忘。

当我在1975年1月16日那个值得纪念的下午在一个保密的地点会见毛泽东时，我看到，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他的生活绝对简朴，正如他所教导的那样。在一间高大的不进阳光的屋子里，毛泽东站着接见我，这间屋子十分实用地布置着沙发椅，在沙发之间安放着小桌子。在我们进行的谈话中，他精神集中的能力和机敏表现得很突出。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当代世界的变化。毛泽东对我讲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要继续迫切地警惕欧洲“芬兰化”的日益逼近的危险。他明白地说出了对于我们危险的事情。

毛泽东曾是中国的核心和发动机。这就使他享有我们对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尊敬，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看法上的原则分歧。

毛泽东有深切的责任感

班威廉

班威廉，英同著名物理学家。抗战前后曾在中国生活十多年。本文摘编自《新西行漫记》一书。

毛泽东在整个秋季里都非常忙。一直等到我们准备就绪要到重庆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们可以日内见到他。假如我们有什么问题要问，那么最好预先通知他。因此我们把几个主要问题写了出来，同时预备了一些进一步的问题，以便临时讨论。毛氏在公开场合出现是很少的。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显然不大高兴当众演说。他一直要工作到下半夜，一面不断地吸着烟，以集中精神，他便是这样处理他的行政工作和写作的，他的精力至少要比普通人加上一倍。我们听到要会见毛氏，通常总要先等他秘书的一个电话，然后立刻赶到他办公的所在地。毛氏一向不出外访人，只在自己的地方接见别人，保持他地位的尊严。除非去访问资格比他老的党员，或是会见军官阶级比他高的来访的国民党要人。

1944年1月4日，张金才——他已在招待所里正式当职员——到我们房间里来，他的孩子气的脸上非常兴奋，他说：

“毛主席来了！他就要在我们食堂里和你们喝茶！”

“已到了这里吗？”我们惊异地问着。读者们可以想像我们是怎样地震惊。

“对呀！现在正在办公室和秦主任谈话。马上就要会见你们黄华跟他一起来，充正式的翻译。

大约在半小时内，茶摆起来了。我们向毛氏道谢，因为他是一个忙人，居然亲自来访问我们。他回答说，他把我们列入新年拜客的名单中，中共元老如林祖涵、徐特立都在内。他说我们到延安已有三个月，一直到现在他才有机会来访晤，很是抱歉。关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没有预备答复的时间，也很抱歉，他只想在喝茶时和我们随便谈谈。他并不只是自己说话，而是让我们说话——大部分讲中国话——关于我们这次旅行，我们在河北教授学生无线电技术，我们战前在北京的生活，关于英国，关于中国的将来等等。他自己简直一点也不表示意见。

他又似乎疲劳过分的样子，一只手不住地抚摩着他半秃的头，好像患有失眠症。但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锐敏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恩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热狂是完全没有的。

茶后，他向我们告别，他坐的是一辆篷车，上面髹着这样几个字：

“纽约华侨洗衣工人救国会谨赠。”

大约有10多名青年士兵，是他的私人卫队。他爬进篷车时，似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回转头来，要求我们不要把他所讲的话发表出去。

我们感激毛泽东 班达拉奈克夫人

班达拉奈克夫人，西丽玛沃·拉特瓦泰·迪亚斯，斯里兰卡前总理。本文摘编自班达拉奈克夫人，1976年在追悼毛泽东会上的讲话。

我不打算谈毛泽东主席的生平了。因为这是你们都知道的。我们是感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不论何时，只要我们遇到困难，他们从不袖手旁观，总是帮助我们。

我两次会晤过他。第一次是在1962年，那次我负有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和平使命。我感到很吃惊的是他对国际事务有深刻了解，更不用说对他自己的国家了。他的谦虚使我感动。在1972年，我第二次会见了。他当时是非常忙的，我只要求会见五分钟，但是，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以上，他对我们的问题非常了解。他和周恩来总理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对这些我是绝不会忘记的。人们很难有机会会见这样的伟大领袖。我很珍视这样一些会见，认为这些会见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大事。

像斯里兰卡这样一些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都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援助和同情。

他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人类历史上，从世界各国政府领导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伟大形象。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

特里尔

R·特里尔，美国人，是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本文摘编自《毛泽东传》一书。

抗日战争结束了，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却随着日本的投降到来了。国共两党相互竞争接受日本的投降，因为从日本人手里收过了枪几乎等于掌握了对未来的控制。关于这一问题，相互责骂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当时蒋介石占有明显的优势，毛不得不暂时屈服。国际的力量和美国的后勤援助都使蒋在接受日本投降时走在了毛的前面。莫斯科与蒋的政府签订的条约使毛担心与国民党的内战将会是长期的、艰苦的。

因此，毛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鄙人非常乐意去重庆与兄共商和平与建设事宜。”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发了电报，“小弟恭候回音。”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的重庆之行。没有美国对毛的安全作出的保证，毛不应该前往蒋的领地。

1945年8月，仍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安接毛泽东。毛平生第一次爬上飞机，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旅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局势发表看法，毛写了一首诗。

这是毛平生第一次戴有边儿的帽了，他戴着太阳盔从飞机里走出，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他的面部表情显得小心翼翼，同时也带有几分冷淡。

自1927年他以合法身分在武汉出现后，时隔十八年，这是他第一次不以“土匪”的身份住进城市。许多人来访，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没有诬蔑之词。

他见到了老朋友和过去的敌人，他对见到的每个人都表现出慷慨大度和爱同热情，相互交换一点儿自己的习作。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他的词《雪》（这是他在主要刊物上发表的第一首诗词）。整个重庆都看到了他对中国山河的热爱，也看到了他自己的使命感。

蒋介石和毛泽东已有二十多年不见，他们握手问好。

一个像普鲁士式的，一个看上去像波希米亚人式的。蒋介石的服装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毫无装饰。好像是从一百件服装里任意拣来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蒋介石看上去像根铁柱子，而毛像一根竹子。

有人曾说当时蒋很紧张而毛则是镇静自若，这不一定准确。没有哪一个接连抽烟的人——毛正是如此——是完全镇静自若的，尽管毛尽可能慢地呼吸。

毛之所以能保持镇静，因为他知道他能智胜蒋介石，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个性除外）将会战胜蒋。部分地因为这种因素，毛是坦率耿直的，而蒋则遮遮掩掩。

四十五天以后，签订了一纸协定。

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国共两党真的能够共同分享政权吗？如果有联合政府存在的话，红军难道就会遣散吗？但是，安排召开全民代表

大会的事宜被小心翼翼地提上了日程，一些领土边界的划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当两位对手叮当地碰杯时，都有点过分地笑了起来，宴会上的其他人注意到这种靠不住的场面，简直笑不起来。

回延安的前一天晚上，毛作为蒋的客人同去看中国古装戏。戏演到中间，一张纸条递给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极其不安地离开了座位。

毛泽东的一位随行人员乘坐的汽车挨了子弹的袭击，这位随行人员中弹，已经丧命。周恩来脸色煞白，他找来蒋的首席谈判官，表达了自己的极度愤慨。

毛仍然呆在座位上，他很喜欢中国古装戏——尽管取得政权后他进行了压制——他要享受这种时刻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后，双方领导人参加了一个饕餮宴会。毛已注意了它的随行人员受到袭击了吗？他宽宏大量地笑着，举起杯建议道：“为蒋介石先生的长寿，干杯！”

自那天晚上看戏之后，毛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毛和蒋怎么能彼此信任？毛没有相信蒋，“世上没有一条笔直的路。”他回到延安后对几位助手说。他的重庆之行就是曲折的，他并没有认为与蒋介石的谈判会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争斗。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毛不得不对蒋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发生内战，毛不愿自己被人看成是破坏和平的人。

他去重庆的目的也在于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都更加重要。它及时地向中国和世界暗示，蒋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统治了一亿人口，并拥有一百万的军队听从他的指挥。

“天不能有两个太阳。”蒋对他的助手们说。但是毛认为，中国的天空对这两个太阳作出了选择。

毛鄙视蒋，“蒋介石已丧失了他的灵魂，”他总结道：“只有一具朽尸，没有人还会相信他。”然而，毛在重庆时掩盖了这种感情。

有些共产党人实在没有兴趣与蒋谈判，因为自1927——1937年这个人一直与他们作战，现在更是如此。有些人已经厌恶战争，他们相信与蒋的谈判会取得成功。

毛巧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世界是在不停地变动之中，他坚持认为，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作出判断。现在的形势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将来的形势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的话，间接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其后的三年对毛是有利的。他的军事计划产生了效果，他们的政治预言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奇妙的魔术师。

1946年，国民党占据了整个中国南部和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共产党的力量在北方很强大。毛泽东的军队只有蒋介石军队的三分之一，枪支弹药也只有他的五分之一。

第一年毛选择了防御战术，蒋介石四处出击，到1947年早期，世人已经相信，共产党像过时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

特别是在3月份，毛放弃了延安，他的一些同僚希望坚守下来决一死战。

莫斯科也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共产党的失败会就此到来。

毛泽东并不伤感。“不就是几座窑洞吗？”毛说延安。他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丢掉一座空城没有关系，目的是粉碎敌人的军队。”

蒋得意地飞到延安，毁坏了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就可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三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这是他在这座空城叫喊时没有预料到的。

1947年底，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进攻战。

“人民是我们的铁壁铜墙。”毛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辞，但结果正是如此。

在东北，蒋介石上了惨痛的一课，只占建筑物而不占有人民的心是没有用的，他乘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扔进山里。蒋只占据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结局。毛已经获胜。

1948年春天展开的几次战役充分体现了毛的灵活机智。他从未反对过这种正面冲突，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弱，没有把握取胜。现在，他的力量变得强大了，突然之间，战斗不是在毛的领地之内进行，而是在蒋所管辖的地区展开。

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预言了他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现在，中国这块屏幕上的画面以不寻常的速度交替出现。每一个画面都显示了蒋的国民党受到重创。毛的胜利已经可能摸得到。

蒋介石变成了一个急于讲和的人，一封充满温和的言辞的信从南京发出。但现在毛的言辞就像一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的刺刀一样坚硬。人民解放军从绿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这座漂亮的城市，这是毛给蒋的真正答复。

使世界发生沧桑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抓住这个机会。

毛把他的胜利投掷到蒋的脸上。

毛泽东获胜了吗？蒋介石失败了吗？两者同时发生了。1948年，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大会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全力以赴，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好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中国的经济在蒋介石的手里已变得支离破碎。

两个失败是统一的，蒋介石的支持者太少。

毛之所以能战胜蒋介石，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的群山绿野之中，而蒋介石并不知道这一点。如果赢得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那么就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征兵征粮，引起人民的反对。他的部下也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用一半的时间来建造自己的巢穴。他没有依赖外国的支援，像蒋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价值三十亿美元的援助，而毛的军队一点外援都没有得到。）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们发现，蒋一边宣布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一边减少自由的空气。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感到他们的国家在蒋的统治之下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正在走向崩溃。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都会对这种社会现实产生公然的不满。

蒋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鼠目寸光。作为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毛有着更长远的打算。

蒋是一个自负而愚蠢的人，常受一些琐事的牵制。毛（在四十年代）是一位不受别人偏见影响的人，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目标的实质。

蒋只是一位军人，而毛是一位思想家，对他来说，枪只是一种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的时候，蒋完全可以与毛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他不了解战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却深谙其重要性。蒋只知道寻求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其结果既丢了军队，又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

毛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不同。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这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斗争方法。毛从未丢掉过他的军队——像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而蒋却因丢了宝玉而常处恐惧之中。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特鲁多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加拿大前总理。本文是他在毛泽东逝世后所作的声明。

我认为毛泽东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他使得好几十年来和好几世纪来一直处于封建状态的国家实现了统一，在他的组织下，他确实结束了一种周期性的饥馑和水灾。他是他的国家的一位伟大的领袖。虽然我们不同意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等等。但是，他的国家是一个曾经陷于混乱的而且被进行了数十年的内战搞得四分五裂的有七亿到九亿人口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 爱泼斯坦

1·爱泼斯坦，美国著名记者。1944年曾代表《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参加外国记者团到延安。本文原载1945年9月2日纽约《下午报》。

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

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记者相处的方法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就是干脆不见你，要就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

这人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和风度是沉静的。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为有力。在1924年——1927年，当中共其他的人正在辩论抽象的理论并犯了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使国民党把他们的运动浸在血泊里的时候，毛花了很多工夫，很有耐性地调查华中农村情况，并且在农民的直接痛苦之上组织农民。

他自己是农家子弟。他永远不忘记中国人民之中有百分之八十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农民与士兵身上所花的时间，依然比花在较高级的人身上的时间多。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蠹，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于五里以外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他的领导之下，党里知识上骄傲的知识分子们被他派到乡村里去“向人民学习”，而土生土长、从斗争中成长的、能干、然而常常是不识字的领袖们，则被派到延安，以获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论。

在中国革命最初大失败的时候，他一方面反对愿意放下武器的人们，另一方面反对主张在中国主要城市中心进行拼死的暴动。代替这两个办法，他把运动的中心移到了遥远的乡村中。

在著名的“长征”的时候，红军中有些精疲力竭的部队，打算在富足的四川安居下来，不再前行。另有一些人打算冲向苏联的边境，以求至少能在一个侧翼上有一个友区，以便整顿自己的部队，但是毛辩论说，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族敌人，人民就会抛弃谁。

在总司令朱德的支助之下，他把红色部队领到极其贫困的陕北，再进入山西，而在那边，他们被夹在一个似乎绝望的包围袋中，被夹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

可是正因为他们在移动着对抗日本，同时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对付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蒋所派去打击他们的部队自己反叛了，反而把蒋扣了起来。其时，当毛可以随意处置他的旧敌的时候，他却坚持说必须把蒋释放，因为他相信蒋的经验已经使蒋明白内战是不可能的，并认为释放了蒋，国共合作反抗侵略者的基础，就能够奠定。

同样的对于原则性的坚持，规定了毛对于国民党封锁的反应。1939年后国民党的封锁，使共产党人有完全饿死的危险。八路军当时是能够以武力冲破封锁的，但是毛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会使中国内部发生全面冲突，这

是日本人久已求之不得的事。

相反的，他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主持了一次经济资源的充分调查，并且使每一个人都为发展资源而工作。政府官员和军队从事垦荒、纺纱、织布，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他们教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之中，以节省劳力，增加生产力，获取抗战的人力，而不必扰乱后方的经济。

到 1944 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那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和兵士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正确的。在 1935 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战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生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

今年 4 月间，他说如果中国在战争中没有组成联合政府，而中国的盟国并不坚持要和双方作军事合作，这样来使任何一方投外国援助之机，以拒却和另一方成立协议的话，那么胜利之后，可能马上发生内战。

在今天和蒋的谈判中，他的立场也不是什么新的。早在上述四月间的演讲中，他曾说：

“在抗战胜利之后，应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民大会，以成立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代表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将来有了民主的选举制度之后，不论共产党是国民大会中的多数党或是少数党，政府都应该是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

“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毛泽东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

海伦·斯诺

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本文摘编自《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书。

1937年5月，我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当我的新警卫员通知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已在院子里，将对我作迎接的拜访时，我还是由于乘卡车来延安的艰苦旅行而东倒西歪。我不能决定是重新涂上口红——我的西方文化生命线之一——还是完全擦掉，结果两者都没有做。

我们握了手。

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对等的部分，以致在中国有些人把“朱毛”当成一个人了。毛是头脑，理论家，“主席”。朱德是心脏，军队，完全出于本能成为人们的领袖，是人类材料做成的。两个人都是由优等材料做成的，这使他们在80岁和90岁时仍然居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位置。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秘密的统治权。

朱德谦虚地坐在歪斜的方桌后面，两只手笼在袖子里，剃光的头上戴着帽子。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们完全不像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没有什么可损害毛泽东的。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抗力，是坚韧的材料制成的——这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的子弹的那种材料。

史沫特莱和卡尔森对毛泽东很少了解是有些原因的。埃文斯把他写成“谦卑的，和善的，孤独的天才，在这里长夜的黑暗中奋斗着，……为人民寻求一个和平的生活之路。”

毛泽东除了是个天才以外，埃文斯在上面所提到的其他方面都不是。这每个人都清楚，或许毛和他的朋友们从他孩提时代就看清了。埃文斯用基督徒的标尺衡量人，这就妨碍了他的洞察力。在他看，谦逊是美德，特别是一位总司令。

很可能除了我丈夫以外，对于毛泽东的生活，我已经比旁人知道得多——因为毛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的生活。我告诉毛：“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他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于是我决定我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以他习惯的方式轻轻地笑着，和蔼地点点头。

由于毛泽东在一年前已经对埃德加·斯诺开放了，对我也就完全敞开了所有的门。朱德在5月党代会的几天里领着他的将军们来看望我。（只有一个重要的领袖没有来过——林彪，他明显地比其余的人更排外。）为了我的

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我收集了34个简短的自传，进行了多次访问——这都是因为毛已经做出了榜样。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泽东是每件事的主宰。

那个夏天我和毛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关系，虽然还不像一年前埃德加所建立的那样亲近。我给他送了一个提问的长单子，进行几次访问。他对我提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许多是请求解释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他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我：“你的意见是什么？”这使我不安。后来我懂得他真的是要知道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这个夏天，毛泽东形成了并修改了一些重要的新论点，在延安抗大的讲演中试讲。他知道我曾经学过黑格尔，但没有真正的解释，我是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的。他是愿意为我澄清事情的——他欣赏智力的挑战——并且同意和我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他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让我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的第一次采访，以表示好感。但是，日本在7月7日进攻了中国，毛就把我转给他的得力的助手吴亮平和官方历史学家洛甫，去完成其余部分。

1937年夏，毛泽东在抗大第一次公开讲了他的《矛盾论》；这是他看了我的长问题单子，并同意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之后而作的。他给我的主要答案是：通过形式逻辑你不能懂得中国的革命，只能用矛盾论。虽然我不喜欢这个术语，但我准备接受这个观点。它要把古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贴在完全不同的中国内容上。我肯定那个德国人李德和苏联永远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也不理解它的逻辑。虽然那时李德和毛是对立的，我却不曾料想1937年使我困惑的矛盾，实际上导致了1970年中国和苏联及其卫星国之间的武装对抗。

智慧的开始是承认存在矛盾，这是真理的本质，永远是两面性的。问题是要能在矛盾的转变点上看得清——并按正确的方向去行动。这是毛泽东特有的天才。直到他至少是42岁时（长征中1935年在遵义，由于需要他取得最高领导权的时候）他一直试图理解并追随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论点。1937年他仍热衷于支持苏联的地位，甚至达到释放他的宿敌蒋介石的地步，作为取得外国支持以抵抗日本和轴心国家的振作点。

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曾经是，那么中国很多事就会不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直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共产党代表会从1937年5月1日开到5月15日，当中央委员会在8月集会时，毛泽东的终生统治权就永久地确立了，除了1966年以前一度中断。在1937年8月13日，我访问毛时，他告诉我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特别是把中国从日本现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给人民以爱国活动的自由，和武装他们自己的自由。”

为了避免软弱的和吓坏了的国民党抵制，十点要求中没有包括经济纲领；联合阵线是这样脆弱，不能提出什么永久性的东西，连简单的全民经济总动员也没有。

在访问的结尾，毛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里闪烁着光亮。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十点得到承认，“我们

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我站起来点点头，“我也这样看”，“中国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动员起来，否则中国就将灭亡。任何种类的组织都比没有组织好。”

这就是我的延安之夏期间的主要结论：群众必须动员起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行动——这就是讲“民主”的一种方式。（毛后来用了个关键的短语“新民主主义”，而埃德加和我希望我们曾经把这个小而重要的词加在我们杂志的名称上）。我了解共产党人能够把人民组织起来——不必在物质上给他们什么，仅仅一个精神上的友爱，或者像他们所说的“生死与共”。十几岁的青少年的队伍是自发的——所有红色士兵都是无偿的志愿军。他们会被摧毁，但是新的军队又会起来。在延安的黄土上，虽然蔬菜和动物的生命只能勉强生存，但人类的生命却活下来了，因为出现了由饥寒和危险哺育出来的精神力量的觉醒。中国的青年在反抗着所有可怕的疾病和往昔的绝望。毛泽东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一场青年运动，它的生命冲动总是包括妇女的。

毛泽东年老时被神化是有各种原因的。他把“新中国”人格化了，既有他的灵机，又有它的限制，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有一个辩证的头脑。西方除了冒险去蒙蔽多于澄清以外，并不描写他和他的事业。在他的整个时代，他是最乐观的人，可他也是愤世嫉俗的人，对于愚人，即使他相信，也不是愉快的。他比中国任何一个像他那样年纪的人，对外来的影响都更为开放——可是他又能用漂亮的技巧和鉴别真实价值的本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毛泽东作为平民是高大的，作为中国是微小的。他提高了占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地位。其余百分之二十的人惧怕他，但在最后承认了他的权威，也或多或少地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神化。同外国人相比，毛更像林肯，连他那高大的魁梧的身材，天然单纯性的伟大，也都相似。他有同样的填不满的求知欲望；七十年代他还在学习英语给人们作榜样。

对毛泽东用的词是大——各个方面都大。他总是建立政策和理论的广泛的大纲，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是琐细的，不是平庸的，也不是爱报复的，这在中国是革命性的。他是一个胜利者，他欣赏取得胜利的过程，他的成功大多由于赢得了别人的心。据迄今所知，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仇人，这是高于法国和苏联的革命，向着文明行为前进了一大步。在1937年，当老布尔什维克们互相杀戮的时候，他允许给他的两个死敌以自由——他们继续破坏他，直到最终。一个是第三国际代表李德，另一个是张国焘。我在延安时，张在抗大教书；他被允许离开延安，跑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去欢呼蒋是唯一的“真正领袖”。

毛主义是变革和革命的方法；是课题，而不是一组建设用的蓝图。它是一座桥，通过它，亚洲和非洲非工业化国家可以轻快地越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抓住社会主义这个武器去发展，变得强大。在长沙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毛就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的有力武器和工具。他的方法是不坐等新工具和机器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进行武装革命。他的武装起来的当地农民，保护着其他的农民，他们按照自觉的愿望去改造经济和社会，而不等待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条件从外面来。

毛泽东有压倒一切的魅力 基辛格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本文摘编自《白宫岁月》一书。

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里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能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见面。”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周恩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他将把他的讲话稿事先给我一份。最后我说我就去请总统。

这样，总统和我坐上了中国轿车前往紫禁城，同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巨人进行第一次会晤。

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球桌。

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

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住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在我 1975 年 10 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 12 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蓉和其他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她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而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被领去晋见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视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他用两只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摄影记者面前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至少对当时在场的中国人来说是如此。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

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但是他一再重复这个说法来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的细节。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见有生动而准确的记述。毛泽东谈话中,开玩笑地提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样利用她们作掩护安排一些秘密旅行。还开玩笑地谈到台北和北京领导人对骂时给对方戴的帽子。毛泽东还作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表示:他更喜欢态度可以预测的保守派领导人,而不喜欢那些情绪摇摆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对尼克松说:“你们选举时,我是投你的票的。”这使尼克松吃了一惊。他接着说:“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较高兴。”

毛泽东利用大家在取笑着谈论尼克松的政治前途的机会,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他说: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为了怕我没听出这是指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解释说,这架飞机后来在外蒙古坠毁了。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程(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话),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同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的保证,似乎他只是在尼克松说话时才想起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后来,我慢慢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把它抓住。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的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例如,毛泽东在表示他决定要扩大和我们的贸易和交流时,用的就是省略语。他的方法是向我们解释中国在前两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对美方的主动行动作出反应。他说,中国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在解决了大问题以后才能处理贸易和民间往来这类小问题。“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这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这意味着在最高级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所有的中方官员似乎都毫不困难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原来不懂的一些话,被他们引用来指明方向。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反复地追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一些主题,而那次谈话总共只延续了六十五分钟,其中翻译还花去了一半时间。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致于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驻军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政治意义的话,只是那一次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就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谈到国共双方在20年代的合作时,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和他(蒋介石)的交情要比你们和他的交情历史长得多。”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

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毛泽东跟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在会谈中很少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怀有深厚感情 萨普坦特里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和见到的最重要的情景是什么，我现在的答复和直到我生命结束时作的答复都将是完全一样的。我经常感到纳闷，当一个人见到另一个人时，是否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会的，我认为，由于一位伟人对人类采取极为同情的态度，这样一种热爱是可能产生的。

1966年7月17日是我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我亲眼见到了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他的确是这样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见到他都会感到自豪。有来自五十四个国家的二百多名亚非作家参加的紧急会议在无锡的太湖附近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我同其他人一道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边拍手，边走到我们当中来。我欣喜非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我没有把由于高兴而流到面颊上的眼泪揩掉，泪流到了脖子上。只有我一个人内心里产生这种感情吗？我看了看其他的人。这里有两百多名作家，其中一些直接来自前线，他们一直在那里手持武器。我看到一些体格强壮的非洲作家同志们在擦眼泪。这的确令人感动。看到这位当代最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斯里兰卡著名作家。本文原载1976年斯里兰卡《宝石》周刊。伟大的人物，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表达的感情。

在北京的革命博物馆，我曾看到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同志们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有时吃的树叶和树皮，我看到他所绑在脚下的破木片和轮胎。我凝视着这仿为了民族解放，跋涉于丛林中的人物，我凝视着这位表现出不屈不挠精神，现在又以这种精神领导无产阶级世界的伟人。

中国和毛泽东主席是分不开的。他给人们上了无产阶级斗争和世界解放斗争的课。他写了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四卷伟大著作，毛泽东思想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毛泽东是不会失败的

盖 恩

我跟毛泽东见过几次面，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中国西北他住的窑洞里。地点是在延安市郊一个山岭中，时间是1947年2月。当时，国民党军队距延安只有60哩。毛泽东在当时是五十四岁。

毛泽东在延安有十年之久，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他在那里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早在二十年前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游击根据地时便已有了雏形。

我在延安与中国革命领导人的会谈，经常长达十至十二小时，有时甚至更长。我和毛泽东那次谈话，从午后不久便开始，一直到翌日凌晨才结束。我记得，那天晚上回来时十分寒冷，引路的灯笼若明若暗，而我则一路上盘思着这个刚刚离开的人。当时我想，一个有意志忍受延安这种困难和危险的人，是不会失败的。突然间，我感觉到，一个巨人就在我的面前。

在延安的年代里，毛泽东就意识到他是中国历史这个剧中的一个重要的演员。他熟知中国的帝王和哲学家，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同时他又熟知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但对毛泽东来说，历史是农民起义，不是帝王王朝。他谈到马克·盖恩，加拿大著名记者。赤眉、黄巾、义和团，也知道为甚么每一个农民起义最后都失败了。毛泽东在侃侃谈论过去的社会革命时，都反复强调他领导的这场革命不会失败，因为这场革命有好的领袖、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和英明的政策。他使人相信毛泽东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农民起义者，因为当他击败敌人建立一个公正的国家时，便不再会有农民暴动。

那天谈到晚上，天色黑得很快。我们一道进餐。但吃不多久，我们又一道分析国际形势。他预料美国的工农劳动群众会起来革“华尔街帝国主义”的命，成立一个民主政府。

延安那台残旧的收音机，每天都把美国的广播送来，包括华尔街股票市场行情等等。毛泽东研究了股市行情后，便预见美国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将有助于美国人民觉醒过来。

在我抵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问我是否愿意同一些领导人讨论日本问题，特别是原子弹投在广岛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我来华前曾在日本工作了15个月。除毛泽东外，所有高级领导人都在那里，我告诉他们广岛的可怕情景：在一刻之间，数以千计的人死于一个炸弹。一些领导人担心现在美国会用一两个原子弹来毁灭延安共产党根据地。

几天以后，毛泽东会见了党的高级干部，问他们：“原子弹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的同志为甚么把原子弹看得那么神奇呢？是资产阶级影响。武器决定一切的想法，是资产阶级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当我见到毛泽东时，他知道我的讲话，指出我的说法错了。他说，帝国主义者发明这个武器来唬吓意志薄弱的人，但共产党人的意志是坚强的。他说：“原子弹只不过是纸老虎。美国可以在中国投下一万颗原子弹，但我们还会剩下足够的人民作战到底，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对核武器的弱点的看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他教导人民说，只要他们同心协力，他们就

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作为一个记者，我见过不少成为伟人的人物。但只有一次我感觉到自己是跟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物在一起——在那严寒、荒凉的窑洞里。

毛泽东不躲闪我的任何一个问题 斯坦因

根瑟·斯坦因，美国著名记者。曾在延安访问过毛泽东。本文摘编自《毛泽东印象记》一书。

毛泽东给予我充分的提问问他的时间。我从来未遇见过我的访问对象像他这样耐心。

我们第一次会面从下午3点到夜里3点。我们在郊外他的四个窑洞“房间”的接待室里谈话。是一个小的高度拱形的窑洞，四壁被粉过，布置简单，往外可看到一个农民的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旧椅子上，接连不断地吸着香烟，吸吮着烟气的时候，像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一样，发出一种奇异的响声。我坐在一张钉有强力弹簧的沙发上，我的笔记本放在一张动摇的小桌上，像美国训练的自由日报(LiberationDaily)的助编一样，将他所说的话全部记下。毛泽东不时地在窑内外来回走动，有时高而巨大的身躯站在我的前面一会，他眼睛几分钟盯视着我，以一种安静的态度，缓慢地有条不紊地谈着。

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略进餐食之后，我们在室内续谈。有两枝蜡烛放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巨大的影子被映到窑洞拱形的顶上。他看到我在摇摆的桌子上写字不方便，跑到花园里，捡了一块平的石块回来，将桌子的一条腿垫平。我们不时地喝着葡萄酒，我们谈话期间一盒盒的土造香烟都给吸完了。

一入夜，我几次提议告别，虽然我是急于要问他许多问题的。但他都不听。他将给我更多的访问次数，他说，但为什么不在今夜继续下去尽可能多谈一些呢？直到早上3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谈吐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

毛泽东不躲闪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他的信念因为是忠诚的，就感动了我。他辩论的逻辑，强烈地对照着我在边区五个月来天天见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生活。

我访问的记录，又重拿给他，以便弄清里面有无弄错的地方。有一星期没有还给我，忽然有一天我碰到毛泽东了，他解释迟迟未还来的理由，“我得将我对你所谈的全部和朱德、周恩来同志商讨一下。他们同意。”我的笔记本原样被还回来。

毛泽东的思想遨游全世界

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女记者，曾多次访问中国。1958年定居中国。本文摘编自《斯特朗在中国》一书。

在国际会议上，如果让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出讥讽的才智，使辩论更力生动。

毛的机智时常使我措手不及。某次我谈到延安平静的生活，他略带玩笑地要我注意蒋介石和朱德的差别，说：“两个人都刚庆祝过六十寿辰。蒋的头发全白了而朱德才有几根灰发。”

我把他的话当真了，“但是朱德在战场上过的是一种艰苦的生活，蒋却安逸地坐在南京。”

“我并不认为他坐得那么安逸。”毛眨眨眼睛反驳我。

另一次我赞扬毛说，他挑的这个地方气候好，我喜欢天气干燥。他立即答道：“我们并没有挑选。”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共产党经过闻名的长征，“发动全中国起来抗日”之后，是在一种胜利的情况下来到延安的。但毛反倒指出他们是因为被赶出南方生长稻米的好地方，才到延安来的；由于这个地方很穷，又十分遥远，所以他们才能站住脚。

毛和在延安的其他人一样住在窑洞里。他经常变动住处，也许是为了就近研究问题；也许是由于他是中国头号的共产党人，有可能遇到危险。1946年8月，在我访问的初期，蒋的首批炸弹正落在两周前毛曾居住过的窑洞不远处。延安有许多人认为轰炸的目标是主席。除去随时迁居外，毛无忧无虑地四处随便走动。

我同他的第一次会晤由于一阵晨雨，延河水上涨而被推迟了。次日河水下降，我和翻译乘卡车前往毛家。车子滑下陡峭的河岸，冲撞着河中的大块圆石颠簸而过，从一个危险的角度爬上对岸，驶进杨家岭的大门，党中央就坐落在这个狭窄的峡谷里。我们在不远处下车，走上一条两旁长着玉米秆和番茄藤的陡峭小路，来到一个山壁，上面挖了二十来个窑洞。

紧挨着周围邻居的四个窑洞，就是毛主席的家。看到陆定一来做我们谈话的正式翻译，我很高兴。

毛泽东身材魁梧，毫不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缓慢、有力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就变得生动而幽默了。在乱蓬蓬的浓密黑发下，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一种高深而又具有灵活性的理智支配着他，使他生气勃勃。

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蓝色布制服，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

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地过去了，落日给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者，好奇心战胜了羞怯。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陆定一翻译得既快又谨慎，使我感觉不到语言上的隔阂。毛的思想轻快地遨游了全世界。他看到了许多国家和许多时代。他首先询问我有关美国的情况。我发觉有许多事情他比我更了解。这是出人意外

的，因为二十年来，他连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邮局也没有一个。

毛认为谈论美国同苏联之间的战争——当时是 1946 年末，冷战已进行了一年——主要是“反动派放出的一种烟幕，用以掩盖更为直接的许多矛盾”。战争或许终究会发生，但是他认为可以加以制止。因为苏联不要战争；只有“美国垄断资本的右翼”才要战争。有关战争的议论，以及煽动反苏的恐惧心理都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因为这样就给了它一个借口来控制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公民权利，也给了它一种武器去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毛说，但是要同苏联作战却不是那么容易。不可能直接发动这一类邮争。“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法和中国来发动”。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毛笑着把茶杯和白色小酒杯放在桌子上，表明“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不但有“美国人民”的障碍，而且在它和苏联中间还隔着一长串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被拖入战争。他把火柴盒和香烟放进长长一串的行列里，风趣他说着它们代表什么国家。他说，如果很好地唤醒人民，“各国人民的合作”是会强大得足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他认为这种合作能够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发生第三次大战。

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一般的比喻，使他的谈话成为一次我所经历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如此鲜明而又充满诗意的比喻。

谈到从蒋的部队缴获的美国武器时，他称这些武器是“输血——从美国到蒋，从蒋到我们”。说到“美帝国主义”时，他讲：“它变得孤单了。它有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或病了，连盘尼西林也不能治好他们。”说起“反动统治者”时，他说：“他们是纸老虎。看样子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

“纸老虎”几个字似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来了，问我是否体会到它真正的含意。陆定一最初把它译成“稻草人”。毛让他停下来，请我解释什么是稻草人。他听后拒绝使用这个词。他说纸老虎不是插在一块田里的死东西，它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人们把它做得像只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只是用纸压出来的，一遇潮就软了。

毛解释后就接着说下去，用英文讲“纸老虎”，并且对自己的发音感到好笑。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上去强大而可怕，但是一阵二月的雨就把他冲跑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

毛笑着用英语说：“蒋介石——纸老虎。”

“等一下，我是记者。我能够报道说毛泽东称蒋是一只纸老虎么？”我插话问。

毛答道：“不仅仅是这几个字。”他还在笑，然后又像一个要把话说得十分准确而恰当的孩子一样，慢吞吞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并向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他就是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掉。”（以后在毛的文章里出现了“纸老虎”的比喻。我的感觉是有许多这样的比喻先出现于他的谈话之中，然后才加以发表使用。）

尽管毛泽东对蒋一笑置之，他却不愿预测自己的胜利。许多别的共产党人已经在估计需要多久能得胜。毛说：“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仗；如果需要，我们能再打上二十年。”1946 年他在延安就已考虑到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外国武装干涉。推翻蒋并不太困难，但是在蒋的背后，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许多

其他的势力。自从英国通过鸦片战争于 1842 年把洋货强加于中国后，这些势力就一直在阻止中国取得完全的独立。因此，他不能说要多久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取决于许多国家，取决于世界范围的“民主力量”的发展。

“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对于这些人还有待进行教育。”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在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最后将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比蒋的飞机加大炮还要强些。”

我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答道，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炸毁灭了自己。世界人民反对它。”“归根到底原子弹不会毁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毁灭原子弹。”

当主席和夫人用煤油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我走下山坡时，已接近午夜了。我们来到卡车等候着的小路旁，相互道了别。他们站在小山上，注视着车子颠簸着往下开入延河的河床，溅起了浪花。在荒凉漆黑的延安山丘的上空，星星显得非常明亮。

毛泽东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

斯 诺

1936年，我终于到达保安，找到了同蒋介石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寥寥数百个字是不能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写清楚的。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在这里主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1936年到延安，是最早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事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西方人。本文摘编自《西行漫记》一书。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则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

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1937）44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1934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二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人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

——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28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的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做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

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

—译博洽德（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

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毛泽东是名扬世界的政治人物

葛罗米柯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曾任苏联外交部部长、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本文摘编自《回首往事》一书。

毛泽东是名扬世界的政治人物。

我不打算分析他的世界观和他对社会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已基本上对此观点作了评价，并将此观点同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形势产生强大影响的实践活动一样，摆在恰当的位置上。苏共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兄弟党对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观点也给予了明确的评价。

在历史文献中，很少谈到毛泽东是一位对国际形势发展也产生过影响的活动家。须知，他的思想、他的哲学观点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几十年。因此，我想，有我在场或直接同我交谈时，毛泽东说的一些话可能是相当有趣的。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49年12月他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国已经取得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从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夺取了政权。蒋介石的军队被消灭了，举国欢腾，因为可以建设一个独立的、沿着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前进的国家了。

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位领导人表示欢迎，从而也就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的各个阶段一直得到苏联人民同情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表达了崇敬之情。1917年10月，红旗在俄罗斯的上空升起，这一事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规模日益壮大。而在击败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以后，这一运动的力量更加壮大了，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极其友好的欢迎。除了表达彼此的友好感情外，宾主双方还准备通过用政治条约把两国之间的友谊固定下来。

1950年2月14日，在“大都会”饭店为毛泽东访苏举行的宴会进行得非常热烈，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出席了宴会。宴会的气氛是隆重的。

同时，我作为这些谈话和会见的参加者，而且不仅是我，明显地看到两位领导人——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交谈，可以说进行得不很妥当。他们两人交谈几句（自然是通过翻译）就停一停，而且这种停顿绝不只是一分钟。在午宴上两位领导人并排坐着，也是这种情况。

我坐在桌子对面，我试图促使他们继续谈话。但是，没有多大效果，因为这一切都要通过翻译，太麻烦了。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两人都明显缺少某种有助于他们建立必要的接触的个人素质。

看来，只有精明的心理学家，对这个场面做一番观察，才会对两位领导人的心境作出某种接近实情的判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尽然，因为这里被观察的对象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以，任何普通的心理学模式都无助于弄清细微之处，当然也就一无所获。

这次会晤之后，我产生一种感觉，斯大林和毛泽东彼此还“没有消除隔阂”。不过，这种想法我未曾跟我们任何同志说过，因为我认为也可能是我错了。时间或许会弄清楚某些情况。

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大厅门口低声对我说：

“为什么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很少交谈。”

要知道她当时坐在他们的旁边，因而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回答说：

“我也有这个印象。”

次日，我听别的同志说，他们认为，午宴上“两巨头”不够亲切。过了好几天，总的看来气氛也没有变化。

尽管如此，事先拟好的条约还是在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签署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同盟国的关系，它们的共同利益在条约中得到了反映。

毛泽东第二次来莫斯科是在1957年11月。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被告知，中国领袖想同我会晤，谈谈国际政治问题。这次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担任这次谈话译员的是精通汉语的罗满宁，他当时已经是中国问题专家和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

从今天的观点看，毛泽东对苏中关系的评价，无疑是这次谈话的最重要的部分。在谈话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代表中国人民主动地声明：

“我对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对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保证说：

“中国永远不会做那种有害于同苏联的关系的事，并将同你们共同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毛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

“能否确定美国的政策，具体地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政策？”

“美国的经济实力真的强大到已经很难同它进行斗争的程度？”

无论是第一个问题，还是第二个问题，我们都谈得相当详细。

我在回答时谈了这样一些思想：

“北大西洋军事联盟的成立，以及遍布全世界的众多军事基地，绝不表明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华盛顿政府拒绝苏联关于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一切建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接着说，谈到美国的经济条件和它的经济潜力，应当考虑到，在战争年代，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工业设备，从西德运走了“第三帝国”时代在康采恩和工业企业中建立的许多试验室。当然，这就更加增强了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但是，这种情况绝不说明美国是不可超越的，同它竞赛是不会成功的。社会主义恰恰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这些潜力是会被发掘出来的，这一天必将到来。

毛泽东总的来说也谈了类似想法。不过，他是按自己的方式讲的。他很喜欢“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句名言，他津津乐道地重复这句话。我根据交谈的情况说：

“美国人在谈论自己的经济潜力时总不免吹吹牛皮，但是，当经济危机这类严酷而又常来的宾客光顾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吹牛就要收敛了。”

毛兴致勃勃地接过这个话题，讲起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总之，从各方面给人的感觉是，他读过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的章节，而且想让我知道，他读过这一部分。

在具体谈到中国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冶金工业的可能性时，他是这样说的：

“在今后几年内中国就能每年炼出3,000至5,000万吨钢。”

谈话结束后，我像平常那样自问：

“毛谈话的重点是什么？他想借此向我们表明什么？”

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主要是想让人听听他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实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实力的估量。他还想了解一下是否有可能使美帝国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首先是不强加于中国。

由此可见，他同我谈话的目的，是想使我们苏联人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1958年8月，我在北京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使我个人对评价他在战争与和平、国际局势、美帝国主义的政策等问题上的观点有了最可靠的材料。苏联领导作出决定，要我作为部长前往中国首都，并同毛泽东就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就当前美中关系中因中国沿海诸岛引起的紧张局势进行会谈。中国领导欣然同意了这次访问。我当时是秘密去北京的，也就是说没有通过舆论工具宣布这件事。

1958年8至9月，远东政治局势严重尖锐化。美国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赤裸裸的威胁。杜勒斯在9月4日的声明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远东局势有了变化，为了保障美国的“安全”，美国总统“决心”采取“及时和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蒋介石以至美国在台湾和沿海诸岛的地位。

美国大肆鼓吹默武主义情绪。在各种声明中强调美国军人不惜使用原子武器进行讹诈，直到用原子弹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上的目标，并决心一如既往地在中国领水内为船只护航。

凡此种都是为了进行军事讹诈，吓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使美国居民对美国采取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所准备。

在苏联政府首脑9月7日致美国总统的信中曾明确警告说，华盛顿的举动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认为这些举动是干涉中国内政，从国际法的观点看是不正当的。同时苏联还表示愿意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我在北京同毛泽东的谈话中，重点是讨论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同围绕沿海诸岛形成的局势，以及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苏中两国在政治方面协调行动等有关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谈话的基调是，不应向美国人让步，要按“针锋相对”的原则行动。

他说，“不错，美国可能冒险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应当考虑到，并正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但是，中国不打算投降！”

毛泽东在发挥这个思想时，强调了苏联和中国作为盟国必须协调行动，他接着这样说：

“假如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军队应当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中国军队应诱敌深入，以便使美国军队在中国受到夹攻。”

接着毛泽东好像是建议苏联领导人应当怎样做似地说：

“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在战争开始阶段不必用自己的主要手段给美国人以军事反击，以便不去阻挠美国军队深入到辽阔的中国内地。只有等到美国军队深入到中国的中部地区之后，苏联才应当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打击美国军队。”

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就知道毛泽东的许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关于美

帝国主义的论述。但是，当我第一次直接听到这些言论时我感到极其惊讶，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言论“别出心裁”，而且还由于他在描述俨然一幅美国使用核武器侵略中国的图景，以及如何同这场侵略作斗争时，他的言论是那么“轻松”。

我以适当的方式向他表示：

“所描述的战争图景不可能得到我们的赞同。我可以肯定地这样说。”
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到此结束了。

1957年在兄弟党莫斯科国际会议上，毛泽东也讲过类似的话，使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吃惊。总之，在那里他也是坚持己见。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同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缔约国以及绝大多数兄弟党在观点和政策上的距离有多么大。

1959年10月，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代表团成员包括苏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尼古拉耶娃、作为外交部长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同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这一事实。

对于毛泽东这个人，我还要补充几句。假如撇开他的理论观点，撇开他的世界观和特殊的政治观点，那么，你就会看到他是一个大体上可亲的、甚至很和气的人。毛懂得笑话，自己也爱说笑话。他把中国古代哲学看作是自己的财富，系统地研究它，也经常谈到这一点。他很善于引经据典。

毛泽东尊重能够在讨论问题中同他争论的交谈者。但是，当谈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时，他便会换上另一种面孔。毛顿时判若两人。我在北京亲眼看到，在整个宴会上，他一直同自己的主宾——赫鲁晓夫并排坐着，却没有说上10句客套话，我的努力和中国部长陈毅所作的某种努力都没有打破这种局面。

毛泽东有十足的自信心

韩 丁

韩丁，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1945年他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本文原载美国《中国和我们》双月刊和《新中国》季刊。

1945年在重庆，记得毛泽东是在一个小房间里会见我们的。房间里除一张木头方桌和几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我们在桌旁坐下来。毛泽东和我是对面坐着，格里·坦纳鲍姆坐在他的左边，周恩来的助手、担任翻译的龚澎坐在他的右边。毛态度友好，但精神严肃安详。他有十足的自信心，但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他是那样的安详自若，自然从容，即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问题，又专心致志地听取别人的意见。

一方面，他心里想着许多问题，因为当时他是在重庆，规划战后中国之前途。那时，避免内战的可能性甚微，这无疑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大家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所谈的情况很感兴趣，并善于听取。毛一贯地设法同抱有各种见解的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直接接触，来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阶情况，他同我们的会见便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很大一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

我们本来准备要问他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的未来等问题的；但是，毛却把问题倒了个个儿，反而问了我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的情况。格里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我以前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毛向我们两个询问了有关美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问题能提供些什么样的见解。他提的问题表明，他非常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情况，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入思考。

他问我们：“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会主张对农民和工人采取什么政策？”对于这些问题是不能够毫无准备、简单地作出回答的。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回答都是很不够的。然而，即令是在这样的时候，毛也是耐心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

我离开时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听别人谈话的人。我当时对此感到意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应该这样的。因为，毛早期就教育所有革命干部要进行调查研究，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及往后一段时间里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各地转，坐下来或蹲着同人们交谈。他每到一处，就开调查会，通过这些会，他获得了能够据以进行分析和领导的广泛的实际知识。毛泽东乐于向所有的人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所具有的第一手知识。他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很明显。格里和我都不是什么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而是美国的两名各有自己的社会经历的好心的青年。对毛来说，这就够了。他把我们看作是提供有价值的材料的来源，用了大半个下午同我们友好地交谈。

1948年11月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大约四点钟前后，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郊外横跨一条河流的废铁路桥上，我从叶剑英将军的司令部走出来，司令部在正定城的西边，北方大学在城的东边，中间相隔15英里。我坐在没有轨道的桥上休息，从口袋里掏出第一本英文版的毛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略问题》。这本书是一个朋友刚送给我的，我是想休息几分钟，看几段。

几小时以后，太阳落到太行山下，我发现自己还坐在同一个地方，看得像着迷了似的，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书上闪耀的字字句句使我越看越激动。尽管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但是由于我心潮澎湃，急切追求光明，整个世界好像越来越明亮了。我所体验到的思想和感情的奔放很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毛的话在当时的作用是揭示了形势的全部真相，我和我的同事们近几个月来一直在研究这种形势，但对形势却只是似懂非懂。我是北方大学的英语教师。九月，国民党傅作义将军命令一支骑兵突然从北京南下。如果不加以阻挡的话，它可能在一、两天内踏平我们的校园。一天下午，在通知下达后3个小时，整个学校悄悄地撤走了。在以后的几周内，五千名师生一直在路上走着，夜里行军，白天睡觉，逃过傅作义厉害的骑兵，避开为他们打掩护的军用飞机。这些飞机像招来的一群黄蜂似的，天天在华北上空盘旋。

当我们在黑暗中急速南下时，在朦胧中和一支人民武装插过，他们以一系列纵队向相反方向走去，他们数千人、数万人通宵寂静地行军。忽然传出话来傅作义的部队回去了，这些人为了保命向北疾驰，庆幸能活着逃离这块平原上的突出地带。当时，我们整个大学聚在一起，回正定去。

这是一次典型的反“围剿”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但是，在这里，在这本书里，不仅把“围剿”和反“围剿”叙述得连儿童都能理解，而且在事先就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描述了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在我阅读毛的著作的时候，以下各点都找到了答案：敌人的骑兵迅速南下，人民解放军后撤、等待时机，没有自卫能力的单位，如学校和医院，迅速地到离得很远的安全地区，武装的人民像汹涌的潮流一样涌现出来，在毛泽东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歼灭战。这样，傅将军的骑兵夹着尾巴逃跑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围剿”、反“围剿”，“围剿”、反“围剿”——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运动规律。敌人逐渐削弱，人民的力量逐渐壮大。然后，壮丽的一天来到了，整个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量变引起质变，运动战代替了游击战，包围城市，解放城市，北方取得胜利，南方取得胜利，最后的胜利！

毫无疑问，这是真理。毛把零星星的具体现实集合起来，拼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说明过去和现在，而且也说明未来。

现在我有一种大大解放和力量无穷的感觉。当我最后看完这本书，重新踏上回家的路途时，我似乎没有花多大劲就轻松地穿过了高粱地。我走完剩下的六英里就像只走了几百米似的。

我较详细地描述这些，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成百万、成千万中国人民在阅读毛的这本或那本著作时所共有的感受。在学习毛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我看到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这次讲话是1948年华北土改运动的转折点。我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山西东南潞城县朗博村的土改，并出席过全县号召学习和应用毛的这篇新文章的会议。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感受到它的巨大影响。

他们作为工作队的成员，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解决分配给他们的那些村庄的问题，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的工作受到了挫折，而原因仍不清楚。看来，主要的问题似乎是群众态度冷淡，农民对整个土改问题没有兴趣，可是，他们是到那里为农民服务的，他们的工作没有其他目的。毛的

讲话拨开了迷雾，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对当地的形势进行了不现实的估计和对整个土改问题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当毛指出，首要的目标是摧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不是使每户农民马上就富裕起来时，绝大多数人几乎立刻认识到，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他们强烈地感到如释重负，同样强烈地感到个人对毛的感激的心情，因为毛那样清楚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本质。

我了解其他干部的心情，因为我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并且希望工作顺利，我有同样的感觉。好似毛从我们背上搬走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我们能够直立起来了，远望整个地平线，追溯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接着的是我们现在必须大踏步走的笔直的康庄大道。毛不是把我们看成不称职的笨蛋、不能进行有效工作的人而摒弃我们，他鞭策我们承担更大的任务和像他所能做到的那样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一种令人深受感动的体会，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无法忘怀。

毛泽东以永恒的激情从事工作

韩素音

韩素音，英国著名女作家。本文摘编自《早晨的洪流》一书。

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毛自己一向深知这一点。他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又经常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他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决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时，他决不坐失一分一秒！

到了1935年，毛的生活和中国革命已经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开了。毛已经和他的事业结成一体，他的思想和行动就是革命。如果要把毛和革命分割开来，就会使历史失去原有的雄伟壮观；同时也会使这个人物无血无肉，剩下一个空架子。革命就是他的骨肉、心血，就是他生活的意志、力量和前提。斯诺早已注意到，不仅毛，其他革命家也都一样，谈起童年回忆时，讲的是“我”，但当满怀豪情谈革命时，讲的是“我们”。在充满生活（全部生活）激情的共同事业中，一般的思想感情和个人生活琐事都变得黯然失色，模糊不清，从脑海中消失了。有一位全心全意的革命家曾经说过：“我们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了革命。”白求恩在会见了毛泽东之后说道：“这是一位盖世的天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毛善于感染别人，使别人的眼界也像他一样开阔。这是他作为领袖的超凡的魅力。

他那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不过，在1940年以后，他的头发看起来剪短多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增加体重。他长了一副大眼睛，炯炯逼人——这是他最大的特征——还有一副非常机智的知识分子的面容。毛的一生经历是整整一代人丰富多彩生活的横断面，对于了解中国各种事件的根源十分重要。

虽然毛非常耐心，他却会毫不留情地讥讽党内骄傲自大，用口号吓唬对党忠心耿耿的干部、“小人物”，并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那些“领导者”。对同一件事他可能会感到愤怒而骂人，但也还是耐心地作再次的解释。他从不容忍思想路线的错误倾向，但他也会和他的论敌长年累月一起共事，直到在论战中战胜他们为止。

毛的照片很多。有的照片上毛穿着带补钉的裤子，破旧肥大的上衣，口袋总是被书报塞得变了形。关于会见毛的回忆录也很多，有的记载会见的时间很长——有时是彻夜长谈。有的谈到毛对讲解孜孜不倦的热情，连细微末节也不放过。他常常参加晚会，凑个热闹，看戏时不时发出笑声，照相时他总是不愿站在正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说毛跳舞时如何按他自己的拍子跳——他不太善于跳舞，还说毛工作时，孩子们如何从他的窑洞里跑进跑出。毛具有孩子似的欢畅性格，但是顷刻之间，他又可以变得非常严肃。

埃德加·斯诺写道，毛的政治才能可以说明他为什么能够领导共产党，但还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士兵和农民对他那么亲。毛讲话时，有办法把一个复

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就连没有文化的人听起来也不难懂。他从来不会使他的听众感到莫测高深；但他也从不会瞧不起听众而故意简单化。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到了1940年，毛胖了一些（伙食不那么差了），他的头发也留得短一些。但他还是兼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性，难能可贵地将政治上的多谋善断和土生土长的常识结合在一起。他有很丰富的成语和典故，能在灵感闪现时立即写出古体诗词。他仍然研究世界大事，分析政治形势，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他讲话时，往往隔不了几句就用一句俏皮话或警句。他的领导艺术在于以理服人。他读书极多，他是一个擅长辩论的辩证法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战术。他很少正面攻击对方，而是这里打一拳，那里打一拳，从侧翼包围对方的论点，逐个打垮对方的论证，直至把对手完全包围起来，最后再来一句俏皮话，或者在逻辑上指出一个致命的破绽，对方就倒了。他的想像力十分生动。

毛的幽默感来自辩证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对立面。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语言的特色，也是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特色。他的幽默有时真是锋芒逼人。他虽极不喜欢杀人，可如要嘲讽起人来，却是入骨三分。由于他常愿意把反对他的人留在身边发挥作用，担任有益的工作（甚至冒着被这些人破坏的危险），这样，对一些深受旧传统影响、死爱面子、宁死也不受辱的人来说，日子当然不好过。可这就是毛性格上的农民因素在起作用。农村就是这样构成的：每一个村庄，就像一出戏需要各类人物扮演不同角色一样，也都具备一定类型的人物。对毛来说，一定要有“反面角色”，他们的失败和错误可以使人们不会忘记“错误路线”。毛不怕别人讨厌他，甚至恨他。尽管他很敏感，容易激动，而且非常注重朋友情谊；可是只要他鄙视某个人的话，他就会从始至终在一切场合表现出来。

毛就没有缺点吗？从来不犯错误吗？他的优秀品质也带有消极的一面。他因为自己对革命无限忠诚而绝对地铁面无私。他绝对地有信心可以用逻辑使人信服，然而事实上有时行不通。他也犯过错误。他自己就说在井冈山时他订的土地法太严厉了，后来不得不修改。又说他有时讲话考虑不够周到，虽则他从来不背后议论人。他还说他可能时常会轻信别人，把别人也看作像他自己一样是出于单纯的热情。但是不管我们怎样挑毛病，在他宏伟的规划上是挑不出什么错的。既然他那宏伟的规划几乎就是他自己，那么，可以挑错的余地也就不多了。

毛还是一位艺术家，或者在独特的意义上说，是一位艺术家，一位革命的艺术师。他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冲劲，一种艺术家的苛求，对己、对人毫不留情。正如一个雕刻家雕塑石头泥块那样，毛塑造了革命。他以一种永恒的激情从事工作。而这种达到忘我境界的激情就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美来。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词更加精美绝伦，清晰之极。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艺术创作。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就看到了文艺对舆论的重大影响。因而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革命家十分重视文学和艺术。在由毛在延安所开展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文学和艺术也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照抄“洋八股”。文艺不为革命事业服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传播文化的人必须服务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策。

毛的最主要的职责是一位导师。他在延安的领导作用正是体现在当导师上。他教育全党、全军、全民。导师这个词是他的身分最确切的说明。他最

突出的贡献就是把共产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际，运用在小米加步枪的国土上。1971年毛泽东对他的朋友美国作家斯诺说：“我历来是想当教员。我讨厌那些‘伟大’的字眼，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他尽了最大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他的“个人崇拜”。“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毛嘴边挂着他在开玩笑时惯有的一丝微笑，眼睛望着每个被领到他跟前的代表的前襟，这些代表个个都佩戴着毛的像章。毛对他们说道：“还我飞机！”——意思是指制作这种表忠心的像章所花费的金属原料太多了。说不定当人们挥动着红色封面的语录时，毛正在思考着要让他们好好受教育的问题。他也许正在想：在这些像章下面，有多少颗心是真正怀有毛自己为之献出了一切的那种伟大的激情的。正是这种激情促使他成了今天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惠特拉姆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澳大利亚前总理。本文原载 1976 年《澳大利亚人报》。

对于每一个访问中国的人说来，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始终是一起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不仅对客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中国人自己也是如此。

北京寒冷而萧瑟的一天。午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坐下来准备会谈，四周是官员和译员。

4 点 30 分时，电话铃响了。周恩来在隔壁的房间里接了电话，他当时已 75 岁。他回到桌子边说：“主席现在要见我们。”

“我们”，就是他所用的词。使人觉得，这对于周，跟对我一样是很大的荣誉。当时，我一无准备，就像对于他去世的消息，我们一无准备一样。

他的非凡的一生中所发生的事件，宛如一系列高大的里程碑矗立在过去的岁月和人们的记忆中：参加革命军，改信马克思主义，长征，反蒋介石，打日本人，大跃进，“文化革命”……半个世纪来，他一直是他国家的人民的领袖，四分之一世纪来，他一直是中国政府领导人，40 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

周恩来立刻把我带到我们的汽车旁，我们驶过不长一段距离，来到主席的住所。这是一座朝东的朴实无华的建筑物，前面是一个小湖，对面是紫禁城。

毛具有所有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气派。

我们在他的书房里会面。这是一间暖和而舒适的房间；如果再小一点的话，你可以把它叫做工作室。那里放着大的扶手椅；气氛表明，他是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我注意到了西方的一些百科全书；书架上放满了数不清的书匣和卷轴。

毛站起来迎接我，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比他的大多数同胞高大得多。他矍铄的精神，永不衰减的勃勃兴致，则是无疑的。我还记得他那有感染力的笑容和学者的优雅神态，好像他仍在思考着深奥的问题，虽说对他的客人优遇有加，礼貌周到。

我们开始了谈话。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谈话的特点是很热烈。毛从不感到无话可讲。他似乎跟我一样兴致很高。

我们曾对比了中国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工党的哲学。我说，他的党是一个革命党；我们的党是一个进化党。

“啊，达尔文主义的”，他笑着说。

“是的”，我回答说。

“达尔文港是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吗？”他问道。

我解释说，达尔文港原先是以帕默斯顿勋爵的名字命名的。我想，他认为，我们最北面的这个城市用来纪念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比用来纪念一位英国首相更为可取，但是，打动我的是他的反应之快。他不可能预料到我会提到进化，但是，他立即把这个词同澳大利亚的一座城市联系起来。这很说明他对西方哲学很关心，他对这个地区的地理和发展也很了解。

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他最后说，“跟我一起走出门吧”，好像要离开的是他，而不是我。我们握手，我朝引导中国摆脱混乱和奴役，并使它在世界上占有目前地位的这个人，看了最后一眼。

当天晚上，澳大利亚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我还要主持悉尼·诺兰壁画展览开幕。在祝酒之前，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一位年青妇女让大家都安静下来，静下来后，她宣布：

“总理会见了我们毛泽东主席。”

中国人的反应是令人惊讶的。房间里充满了掌声和不可能是虚假的欢呼声。在这一片笑脸中，我感受到极其强烈的友善情谊。

毛的存在和人格似乎已永远铭刻在他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之中。

我本人的看法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他是当代和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一切证据表明，他不仅为他的人民所钦佩和追随，而且真正为他们所爱戴。他的政府是简朴的，但却是诚实而有效的；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受到国际的尊重，国内实现了多少世纪所没有过的稳定。

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压倒一切的信念，是他一生的指导精神。

几乎没有毛泽东不感兴趣的题目

谢伟思

谢伟思，即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国务院“中国通”。曾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到过延安。本文原载 1976 年美国《纽约时报》。

我在 1944 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是 51 岁。四个月当中，我多次见到他，一星期内肯定有两三次：在各种正式的和不受拘束的场合，总共也许见过五十次，其中有私下的谈话，集体的讨论，一起吃饭，看戏和参加其他文娱活动，听他发表公开讲话，甚至还在炎热的夏日傍晚在一个挤满了人群的果园场地上举行的星期六舞会上见过他。

我当时是约瑟夫·史迪威中将部下的一名工作人员，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且同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直接接触的美国陆军观察员小组的成员。

我的任务是报道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看法和声明。毛的神态怎样，他的癖性习惯和给人留下的印象怎样，一般的谈吐如何——所有这些似乎都与正式的报道无关，所以当时大都省略不报了。但是，毛泽东不是一个容易被人忘却的人。

按中国人的身材来说，毛是高大的。他动作有点缓慢，有一种严肃和庄重的气派，然而并不是摆架子。他彬彬有礼，待人诚恳，神情间也许有一种腼腆含蓄，使人们有点感到，他是在打量着你。

当然，当人们跟他更熟悉一些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也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爱用中国古典譬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和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

他通常似乎都在带头谈话，我想这也是正常的。有时你会感到被采访的却是你自己。然而，这一点是做得很巧妙的。他并不垄断谈话，不“强加于人”，你不会感到受压抑。事实上，在讨论会上，他通常是很仔细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毛往往总结一下这次会议的主旨。每次我看到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总结总是极其公允、全面和简洁的。

当时，毛在党内明确而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还是不久之前才取得的。但是，当时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融洽而毫无拘束的气氛，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这些同重庆政府的领袖蒋介石有过接触而且见过他在他的所有下属之间所造成的那种紧张气氛的人来说，是感到惊异的。

毛的时间和思考主要用在政策方面：制定最能赢得日军战线后方游击区农民支持的政策；在必将来临的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夺权斗争中，如何运用农民的支持所产生的力量的政策；可能说服美国在中国这场内战中采取不偏不倚或中立态度的政策。这些问题，包括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后果，都是毛喜欢谈论的。他愿意把具体细节、日常工作和一般政务留给别人处理，像周恩来或朱德那样能干的同事是不乏其人的。

但是，如果我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是他不感兴趣或觉得提供不了的，他通常要我去问其他某些领导人。

在初期的一次会议散会而毛可以同我私下交谈时，他微带笑容地说，他

估计我希望同他谈一次，而他也希望同我谈一谈。然而，他接着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先有机会彼此熟悉一下，如果我们美国人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有些了解，那么我们的谈话就会对彼此更加有益。

接着，整整过了一个月，我才被请去同他单独进行第一次真正的交谈，一直谈了八个钟头，中间只在晚餐时停了一下。后来又谈过几次，但是时间都没有长得那么吃力，因为基础已经打好了。

那次谈话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毛所特有的那种坚强镇定和从容不迫并不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他绝对相信他的事业和共产党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种信心与那时延安窑洞里的实际环境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我们美国人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那种情况，又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最后得出结论，那就是毛主席的信心是正确的。

当我得以在 1971 年再次访问中国时，引人注目的是，1944 年毛在延安的那些谈话中所强调和反复强调的不少课题，看来仍然富有活生生的现实意义。

他当年说过，党必须为人民服务并且接受人民的批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干一些体力劳动，教育必须合乎实际。中国只有通过自力更生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农民发动起来以后，是可以有巨大的创造性和取得非凡的成就的。中国不应该畏惧任何艰难危险。精神胜于机械。只要有耐心并坚持不懈，一切事情都可以做到。

有些问题，例如同苏联的关系，他当年谈得不那么尖锐。他总是坚持说，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争取有友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发号施令。我们总是要自己作出决定，总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

当然，并不是毛主席想到的并且为之奋斗过的一切事情全都完成了。例如，自从 1944 年那些早先的探索以来，中美关系现在仍然处在不能令人满意的朦胧阶段。但是总的说来，有谁曾在一生中取得过更多的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个国家的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是代表二十世纪的英雄

福原亨一

福原亨一，70年代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本文原载1976年日本《熊本日日新闻》。

毛泽东主席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而自豪的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的半殖民地地位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新生，现在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夸耀享有现代文明的成果的西欧、日本进行较量，在世界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现代中国的历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总而言之，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期在历史的轨迹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那末，毛主席的确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二十世纪的世界英雄之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确定方向。

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必然结果，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色彩，充分掌握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为了使之奋起和团结而展开了有效的政治宣传。

中国，幅员非常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统治并未遍及全国。从这种现状出发，他制定了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借以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他怀着坚定的信念推行了这种战略。

中国革命历史的起伏，由于同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更加富于戏剧性；然而可以说，毛主席为抵抗日本侵略而创立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游击战的理论，确立了他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乃至是内战的胜利者的地位。

毛泽东主席不仅是成功地领导了革命的政治家、战略家，而且是绚丽多彩、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增添光辉的英雄。

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反复阐述了革命和文化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文艺讲话尖锐地提出了艺术的阶级性、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他断定，不变革群众的思想，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成功。

毛主席喜欢读《红楼梦》等中国古典作品，一贯采取把这些作品视为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予以尊重的态度。他在传统诗词——它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创作方面也显露了非凡的才能。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铸成他是具体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的形象。我要说的是，毛泽东具有英雄豪杰的风格。

中国的圣哲毛泽东

谭若思

谭若思，美国哈佛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 1976 年美国《新闻日报》。

毛在旧中国长大，创建了新中国，同时使中国保持自己的本色。

50 多年前，他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入侵者瓜分的封建的中国的弊病。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列宁，因为他带头造反，以农村像螃蟹一样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他利用抗日战争作为跳板，为了革命事业而激发人们的爱国心。1949 年以后，他有了第三种身份，成了中国的斯大林，他拿起泥刀和砖瓦，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是中国革命的把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人物。

毛的才能不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广阔无垠的。他是孜孜不倦地进行鼓动的农民组织者，点燃了中国各地的造反之火。他是哲学家，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东方的新的道义形式。他是军事指挥官，他说，他的肠胃只有在战斗时最好。他是诗人，写了一些古体诗词。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的首脑。

就是这位中国圣哲在当代世界政治斗争中放了反响最大的两炮。他在 1960 年同俄国决裂。10 年后，他向美国开了门。从此，两极世界变成了三角世界。

毛还担任了第三世界发言人的角色。中国虽然成了三足鼎立的力量的一部分，但是还领头为重新分配权力而奋斗。毛的中国已成了这样一个象征：一个像第三世界一样落后的国家怎样能变成一个拥有原子弹和在联合国内有否决权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强国。在毛的远大的眼光中，已经存在的事物不如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刚刚慢慢冒头的事物使他神往。

在思想领域，这位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使农民在社会主义学说中占中心位置。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世界政治斗争中的关键性事实。他用他最得意的观点，即一切事物都充满着矛盾的观点，代替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固定规律。如果说德国人作为一种科学发明了社会主义，那么，人们将由于毛把这种科学变成一种社会道德而铭记他。

他要求中国人民做的事情很多，因为他相信他们。

毛泽东是个哲学家

潘尼迦

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印度前驻中国大使。本文摘编自《毛泽东会见记》一书，文中所说呈递国书的时间是在1950年。

礼宾司司长到旅店来见我，告诉我毛泽东主席已安排在20日下午5时接受我呈递国书。在某种程度来说，这使我放心了，因为我听说毛主席已安排不出白天的时间，罗马尼亚和捷克的大使都在昨天晚上11点才呈交他们的国书。其实，后来我才发觉到中国新政权习惯在夜间接见外宾。这也许是因为白天的会议太长太多的缘故吧！至少，我有三次会见周恩来都是在夜里，两次是在10点之后，有一次很重要的会见却在半夜！

想到将与这样一位使亚洲历史起了巨大变化的人物会面使我非常激动。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像他这样一个在山沟和窑洞的恶劣环境下锻炼出来的英雄，与三亿五千万印度人的解放者甘地和尼赫鲁比较怎样呢？和他的政敌蒋介石比较又怎样呢？我看过一些记叙有关他的书，知道他的中国古文造诣很深。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充满了强有力的见解和分析。显然，他是个有独创有卓见的思想家。

呈递国书的仪式是在毛主席的官邸举行的。毛主席这个住所位于中南海湖边，是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小皇宫之一。据说是乾隆皇帝为他的爱妃香妃所建的。……毛主席并不住在这里，他和他的夫人住在西山的一所别墅。呈递国书的正式仪式时间很短但很隆重。我在讲话中强调中印两国牢固的友谊将会加强世界和平事业，而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不仅提到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而且提到了我们两国为恢复自由的共同斗争。

仪式过后，毛泽东带我到另一间较小的接待室。我们就中印两国的情况谈了半小时。在座的只有周恩来和一位翻译员。毛泽东主席首先打开话题，他说过去中国人曾经相信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行善，死之后就会在印度复活（即魂归西天）。我们谈到了亚洲的一般情况，以及欧洲人撤出亚洲大陆的问题。他还问到缅甸的情况，而且极表兴趣，我说缅甸政府和我们印度一样坚决保持完全独立。他还对佛教相当感兴趣，而且问我佛教对印度有怎样的影响。另一个使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印度与英国关系的状况，谈话气氛一直很友好，而且我们频频为中印友谊举杯。

毛泽东比一般人高一些，但和一般南方人比较，他算是高个子。他的体格魁梧，两肩很宽，脖子粗短，一双仁慈的眼睛，给人一种慈祥、亲切之感；他的容貌极其非凡，宽大的前额，配上那又黑又厚的头发，轮廓非常清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那威严而又不使人生畏的风度令人觉得亲切自然。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哲学家，富于想象，但又充满信心。从他早年他父亲的农民家庭开始，经历过一条艰苦、漫长的道路，才到达今天的崇高地位。在井冈山上他反抗蒋介石的屡次“围剿”，被迫带领他的伙伴，像新摩西奔向天国那样，爬过崇山峻岭，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艰苦，终于到达延安，住在窑洞里，继续抵抗着坚决要消灭他的国民党，同时组织游击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策划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取得了控制从满洲直到印度及印度支那的边界的辽阔土地的胜利。可以相信在毛泽东的光辉一生中，无疑受过极其艰苦的磨练，然而，过去的那些经历却没有在他

身上留下怨恨、残忍或忧伤的痕迹。

毛泽东讲话很慢，声音很低。他的讲话常常涉及许多历史问题，例如他曾问起蒙兀儿人和蒙古人的关系。他还从历史的角度提及西方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亚洲人民的种种不平等，并指出这一代的领导人担负着扭转这种局面的任务。

毛泽东虽然已经年近六旬，又是个经历许多艰难的人，但他却仍然精神充沛，非常健康。他来自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阶层，所以，尽管他作为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肩负着极其艰巨的重任，却完全胜任有余。

拿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恐怕有些不公平。蒋介石虽然也是个强人，有他自己的性格和意志，但是他无情、自傲、又残忍。因为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过他，他便把他一家三代都杀尽，连孩子也不放过，这种做法充分说明他是记仇极深的人。此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蒋介石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拿毛泽东和尼赫鲁比较也许更恰当。毛泽东和尼赫鲁两人都善于国际行动，而且都有富于理想和幻想的特点。从广义上说，他们两人都是人道主义者。但尼赫鲁的思想渊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他的社会思想；而毛泽东则是个完全靠自学出来的人，他的历史和经济知识几乎全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对西方那套个人自由主义也许他是很讨厌的。然而他是一个受中国文化抚养长大而且早年受过佛教熏陶的人，也许可以说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并不只是那些枯燥无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